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雷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社会达尔文主义

——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

[英]彼得·狄肯斯 著
涂 骏 译



*Social
Darwinism*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崔文辉

责任编辑：崔文辉、崔 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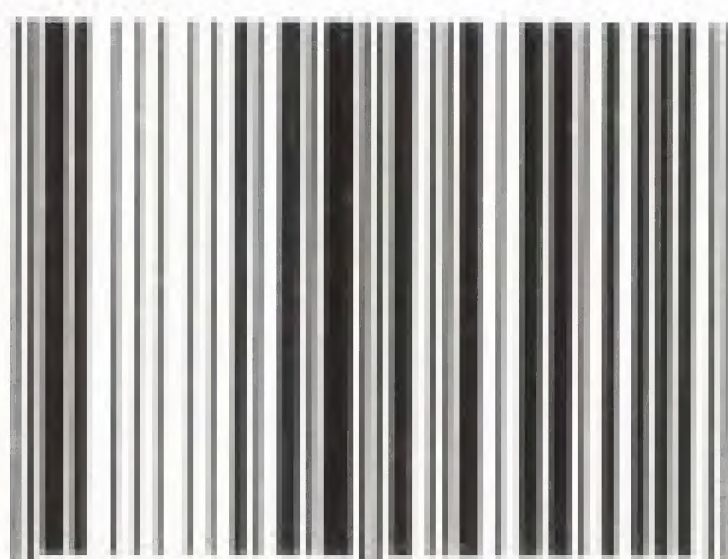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陈 东

Social

Danish

作者简介：彼得·狄肯斯，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他也是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社会与政治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主任。他的近著包括《社会与自然》（1992）以及《重构自然》（1996）。

ISBN 7-206-04591-X



9 787206 045912 >

ISBN 7-206-04591-X/D. 1401

定价：14.00元

社会达尔文主义

—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

[英]彼得·狄肯斯 著
涂 骏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英)狄肯斯著;涂骏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Social Darwinism

ISBN 7-206-04591-X

I. 社… II. ①桑… ②涂… III. 社会达尔文主义—研究 IV. Q98-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72 号

Dickens

Social Darwinism

(Original ISBN: 0-335-202187)

Copyright ©1995 Peter Dickens, 2000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社会达尔文主义

著 者:彼得·狄肯斯

责任编辑:崔文辉 崔 凯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赵秋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5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1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91-X/D·1401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最受诟病的恐怕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它因为和优生学等这样的伪科学的纠缠，几乎是身败名裂。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所开列的现代性的罪状里，它也首当其冲。

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有着糟糕的名声。可是正如作者在《导言》里坦言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本身，它本来是局限在一个有限层次内，可是在后来的延伸中，它被发展成一个神秘主义式的可怕的广泛适用原则，这种滥用其实只是一种荒唐的类比，并最终败坏了它。而且，即使发生了纳粹那样的种族清洗的可怕事件后，这类的滥用还在继续。尤其是在人们掌握了基因技术，而这类的资源往往又控制在有权力的人手里，情况显然更加严峻。所以，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清理谱系，重新解决进化思想和社会思想之间的连接问题。对于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乱概念进行整理，希望得到恰当的结论。

在书的结束部分，作者提出一些含义深远的问题：人类生物学如何和社会理论进行配合，社会科学面对基因技术的发展怎样进行调整，以为新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提供理论前提，等等。

当然，由于本书作者的局限性，他在一些方面存在误解和偏见。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化观点和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部分观点相提并论，这是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了解造成的。同时，作者对于社会组织强化对人类优生的控制持悲观的态度，并对进步理论也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指责。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总之，我们应该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保持一种理性态度，批评和拒绝错误的观点，吸收有价值的东西。

编者

导言：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指涉的是一个复杂的观念集合。弄清楚这些观念很重要。这些观念中，哪一些似乎对理解社会学观念和进化观念之间的关系有用，哪一些似乎没用？

首先，我们来考虑达尔文的生物学。众所周知，达尔文认为生物学规律影响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有机体在资源有限这一情形下的数量增长都将导致生存竞争。某些生理和心理特征使个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这些特征被选择出来，通过时间遗传下去，将在适当的时候导致新物种的出现，另一些物种的消亡。

然而，这些观念在延用于人类社会时却采取了多种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点，麻烦开始出现。大概争议得最少的延用观点是：我们不仅仅是动物，而是文化动物；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们的伦理和宗教，都是和我们的进化成长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性就算在所有方面都特殊，它也仍然和进化思想及其在人类身上的延用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确切为何仍

社会达尔文主义

有待讨论。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究竟是阻碍还是激励了人类能力的发展，在这方面存在一些极为困难的分析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进入这一成问题的领域。

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多大问题。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得比这个要远得多。例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有观点认为（在某些方面这一观点仍在继续），人类社会组织本身也是一种人类有机体。像其他自然有机体一样，可以认为它也经历着发展变化。例如，它似乎日益分化为不同但彼此相连的部分。似乎有一种超机体的力量适用于社会，就如同它适用于自然一样，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其结果是，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种神秘的类比，鲜有真知灼见。

但是，当从将人类以生物性为基础的行为看得过于简单的观念出发来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就遭遇了最严重的困难。正是由于这一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所应当地得到了坏名声。特别是它曾经通过优生计划和优生学联系紧密。像城镇规划一样（但要有害得多），优生计划这一概念被用来证明建构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的正当性。优生学作为自然选择的一种加速形式，试图产生一个更好的种族。那么，谁来建构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是社会精英，他们是血统最值得遗传给后代的那一类人。政治右派和左派都类似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参见表1）。这在今天得到了呼应，在恐怖的“种族清洗”中塞尔维亚精英驱逐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

表 1:

作为迫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我们必须能够更确切地剔除基因低劣的血统，反过来我们必须施加作用力，使优良血统能够更快地繁衍……除非变成另一种社会体系，否则这些不可能实现。

(朱廉·赫胥黎，引自布兰德和都恩，1998：198)

上天使万物无限丰饶，但除非它们自己努力，上天并没有将它们所需的全部食物放到它们手里。一切都非常公正，非常正确，因为正是生存竞争导致适者生存。

(阿道夫·希特勒，引自郝金斯 1997：274)

认为优生学这门伪科学由于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而最终已经名誉扫地的人将会惊讶或惊愕地得知，在瑞典这样一个社会民主的天堂，成千上万不称职者和社会偏离分子（男女性都有）的生育能力被剥夺了，为的是产生品种更优良的瑞典人，从而全体民众都具有社会责任感。

(《苏格兰人》，1997年9月3日)

一些评论者现在看到了西方社会出现新的更微妙的优生学的可能性，基因发现将被用来建构一个臆想的理想民族。例如，有钱的中产阶级父母可能试图生育“设计儿童”。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为携带容易导致某些疾病的基因的人提供服务。携带容易导致某些疾病的基因的人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所有这

社会达尔文主义

些干预不仅引起了许多种族问题，而且很有可能这些干预不会像预想的那样发挥作用。例如，人们的疾病既是某些特殊基因的产物，也同样多地是他们所在环境的产物。尽管如此，操纵生物学来生成一个完美的人种可能是优生学的未来形式。

但为什么还要进一步讨论这样一个名誉败坏的而且还危险的概念？一本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除了探讨达尔文的观念如何被重构，如何被社会的主宰群体用来、被曲解以用来控制其他人比如女人和“其他”种族，还能说些什么吗？例如，是否能够重新认为种族概念并无生物学上的实在性，这一概念像安史理·蒙太古（1997）的著名的话所说的那样，是“男人最危险的神话”？

但是，如果我们返回到这篇导言一开始所提出的那个意义的话，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就还包含着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需要探究达尔文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原初信条的涵义（以及他的某些高明的继承者所持信条的涵义）。换句话说，现在需要做的是透过对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最令人不满的、时而恐怖的应用，返回到接近达尔文本人出发点的地方。

第一章探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源头。比较了达尔文本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科学家们自己采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展现的图景是，社会科学家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常常被当作工具用来反对弱势人群以及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作辩护。本章还表明，“进步”、“方向”、“目的论”这些主题在从进化论汲取灵感的早期社会思想中常常是含蓄

的。这种对进化思想的运用并不怎么招致疑虑，和自然科学家理解的进化没有多大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受达尔文思想影响的早期著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建立重要联结，这一联结对我们今天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第二章论述说，从进化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许多不那么有用的主题持存在现代社会理论中。并且，这些主题仍常常基于对自然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所作的错误类比。这些类比中有许多都很成问题。从达尔文开始发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愈演愈烈的社会—自然二元论，即社会被放在一边，自然被放在另一边。除了这种类比关系，社会和自然少有关联。这种类比最终没有用处。但矛盾的是，这种类比却是当今号称“新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家们的核心特征。第三章继续将这一问题和当前对下等阶层及其被假定了的基因遗传特征的社会分析联系起来。这一工作提出了马克思所称的人的“类存在”、人的自然局限、倾向、潜能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这一工作同时也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因为它再生产了古老的社会—自然二元论：它没能把社会过程、社会关系和人通过生物遗传而得的能力联系起来。第四章讨论了这一问题，建议工作应如何进行以使进化思想和社会思想更令人满意地融合起来——这一融合将开始克服社会—自然二元论，回到达尔文本人所勾勒的一元化立场。这一融合思想认为，人类是创造文化的动物。他们是韦尔斯（1993）所谓的“知识海绵”，被设计用以理解彼此、理解自然，通过他们和社会世界、自然世界的互动。他们能够自我进化，有意识地发展

出新概念、新理解以利于新型互动。他们是一种自然物，是创造文化的一种自然物。这引向了第五章，讨论近来对“人性”的研究。人类个体的发展是残酷的竞争呢还是有着集体取向？还是如本章所认为的，这二者都不对。这一章在结束时认为，人性的本质是抽象能力以及将一般观念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能力。这引向了第六章，这一章将本书的多个主题拢集在一起。勾画了社会思想和进化思想得以结合的一条途径。这一结合可以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和更关注有机体而非基因的各种生物学融合起来得到。这些新近出现的学科对于理解人的“类存在”究竟是什么、人在其一生中的成长如何与更长期的进化过程相联系，非常有帮助。抽象能力的出现对人一生中的成长具有核心意义。但这一潜能可能被，实际上也已经被成长其中的环境背景和社会背景所实现或改变。这将我们引向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显然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尤其是给许多人带来了物质财富。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人类潜能的实现（包括长寿健康的潜能）很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影响。成长中的儿童所受到的影响尤其重要。对人类能力的控制可能会导致许多接受这些控制过程的人产生疾病。

因此，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融合既要关注人通过基因遗传而得的能力，又要关注有权力的人控制这些能力的许多不同的企图。同时，它要关注来自社会底层的想要实现同样能力的斗争。但是人类生物学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呢？对于这一联系我们还知之甚少，但是生命科学近来的发展认为社会权力的行使可能对人类生物学甚至人类进化本身

导言：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

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科幻电影银翼杀手构想了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群特殊的（暴动）奴隶被从基因上制造出来。也许这样一个未来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虽然不像电影中那样是由于一群恶意的生物技术学家所造成的。这里勾勒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提示出一个横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有趣的研究计划。和电影银翼杀手一样，它也被认为带有很多政治含意。

目 录

导言：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	1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1
第二章 当代社会学中的进化思想	32
第三章 自然—文化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53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71
第五章 人性是演化的吗？	94
第六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朝向一种新的综合	115
参考书目	138
译名对照表	164
译者后记	175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 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初版于 1859 年。这本书不仅深刻影响了自然科学，也深刻影响了对于人以及社会关系的研究。本章将首先简介达尔文的理论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然后勾画这一理论被达尔文本人以及其他许多古典社会理论家延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的种种方式。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方式中有一些比其余的要有益得多。

《物种起源》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比通常所设想得要复杂得多。探讨“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达尔文进化思想在人类社会领域内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在达尔文的书初版之前就已经相当成形了（郝金斯，1997）。类似地，进化思想的早期形式也在达尔文的书初版之前就已经形成并被讨论了。例如，拉马克的观念（包括如下命题：有机体获得的特

社会达尔文主义

征可以被其后代继承)和加法洛意的观念(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潜在的形态学)在19世纪早期就被广泛地讨论了。事实上,这些法国科学家当时已经成为伦敦抵制科学和宗教权威的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以及新一代科学家的意识形态会聚核心(戴斯蒙得,1989)。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物种起源》之前。甚至到达尔文直接影响社会理论的时候,他也只有部分思想被采用和发展了。指出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即《物种起源》中所包含的一些假设是达尔文自身所在社会的产物。

达尔文在书中说,大多数生物都会繁衍出比只是再生产自身数量多得多的后代。除非遇到所在环境中限制性因素的阻遏作用,这个数量将会以几何速度增长:

有一个无可辩驳的规律,那就是每个有机生物都会很自然地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增长,以至于如果它们不被毁灭的话,地球很快就会被某一对生物的后代所占满。即使人类这样繁衍较慢的生物在25年的时间内也已经翻了一番,按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几千年后,地球上确实就不再会有人类后代的立足之地了。

(达尔文,1968:117)

尽管如此,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任何一个物种的数量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并无多少差别。因此这意味着必然存在生存竞争。这一竞争不仅包括年幼生物争取成年的竞争,也还包括成功繁殖后代的竞争。而且,正如达尔文(1968:116)细心指出的,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这一竞争不仅包括直截了当的竞争，也还包括“生物间的寄生关系”。

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物种变异。没有哪两个生物是完全相同的，总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这些不自觉的、随机产生的，因而是偶然的差异给生存竞争带来了优势和劣势。那些有着优势的个体将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并留下后代。没有优势的个体将在这些方面遭到失败。总的情形是，某一对共同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进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异：

覆盖这个世界的有机生物的无数种、属、科都源自各自组群内的共同祖先，都在繁衍的过程中被改变了。

(达尔文，1968：434)

根据《物种起源》的观点，有机体器官的微小变异会通过繁殖而变大。不过达尔文也观察到了和这一核心机制结合在一起的某些作用过程。他认为，这其中包括性选择。达尔文相信动物的某些生理外貌以及行为倾向可以用诸如求爱表演和用生理特征来吸引异性这些作用过程很好地加以解释。达尔文还认为生理变异在较小的程度上是环境条件改变以及器官使用与否所造成的。这些特殊化的解释虽然在《物种起源》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但却很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来，因为这些解释表明达尔文拒绝只从一个因素出发来理解进化，这些解释后来也渐渐成为达尔文理论化过程中益加重要的部分。例如，关于器官使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与否的重要性，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结论部分是这样说的：

当器官由于生物习惯的改变或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再被使用，有时再加上自然选择的作用，常常会导致器官的退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基本器官的意义。

（达尔文，1968：451）

达尔文的书是一部科学论著。这一点需要牢记，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把科学仅仅当作一种社会构造物来看待，认为科学不能指涉真实的外部世界。达尔文宣布说他已经发现了自然界（也扩展到了人类世界）真正的因果律。达尔文的著作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格鲁，1974；郝金斯，1997；特里格，1998）。例如，他直接受到了马尔萨斯写于1798年的《人口论》的影响。马尔萨斯理论的提出是为了理解人类社会，这一理论说，除非被诸如饥荒、战争、疾病或者其他一些因素所阻遏，人口数量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供应却以代数级数增长。但是这一理论却是由一套特殊的、主导性的价值所给定的，这套价值对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很不注意。资源稀缺可能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脱离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问题来讨论资源限制却是误导性的（为了便于讨论，参见本顿，1991）。达尔文和维多利亚时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接受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仿佛他们自己从未受到社会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阻碍。

我们来看看阿尔弗雷德·卢索·华莱士，人们都知道华莱士是进化论的独立发现者，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框架曾经加速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即华莱士的原创性是否一向被低估了。也许因为他不善社交，以及他花了大量时间在亚马逊河印第安人区和马来亚搞研究，他的原创性一直没有被正确认识。也许比这些关于原创性的争论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倾向，特别是他对待他所熟悉的作者马尔萨斯的态度。华莱士的观点尤其受到他早年接触到的欧文社会主义的影响，导致他十分重视与人口增长、食物和资源短缺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他特别提出，两性间以及整个人口内的劳动分工以及权力关系分工是影响人口数量和物质财富的关键因素。不过他认识到，尽管劳动分工带来新的社会纷争，但同时也带来真实的物质便利。例如，他在亚马逊河区观察到的艰苦工作

本质上是每个人自己为自己做每件事的结果，很缓慢，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劳动，而不是去从事某种工业，用其产出交换自己所需的其他物品……结果每个人一星期的劳动所得只有六便士，于是在不费力就可以得到粮食的国家里，一个人倾其一生却都挣不到足够的衣服可穿。

（华莱士，1869，引自琼斯，1980）

社会达尔文主义

抛开华莱士和达尔文的不同（我们很快还会回到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们都指出了真实的因果过程，并且自然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自然选择理论是个好理论，尽管它是“社会构造物”。

达尔文和华莱士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他们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和上帝创世观念。对许多人而言，包括牧师们和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及其一切形式的科学家们，《物种起源》显然是一本渎神的书。生存竞争以及物种的形态是由很细微的变异造成的这些观念意味着没有神的介入空间。更有甚者，达尔文的著作直接提出人类和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物种起源》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虽然直到《人类的由来》这一点才得到了充分表述）。教会对达尔文的反应大概最恰当地浓缩在一位牧师的话中：“他是欧洲最危险的人”（引自欧弗瑞，1997：56）。

因为有这么多的反对意见，达尔文决定在他的书出版当天去离伦敦很远的伊尔克力去取饮用水，也就不那么奇怪了。自1838年他的理论有了雏形以来，他就预计到会有反对的声音，众所周知，这也正是他迟迟不肯出版其著作的原因。另一方面，虽然有来自宗教机构的反对声音，让人多少有些惊讶的是，《物种起源》初版的全部1250本书却在发行的第一天就全部售空。这作何解释呢？

这本著作立刻就被广大民众所阅读，原因并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即达尔文在写它的时候周密地考虑到了非专家读者群。开篇的第一章就讨论动植物饲养者对自然选择的家养形式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的影响，这当然是导入自然选择理论的一个好办法。但这本书的流行还归功于自然选择理论是“社会构造物”这一事实。它也相当契合于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想和主要倾向。特别地，著写进化问题的学者们在反思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商业人士的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观点，把《物种起源》一书当作一本科学著作，这本书中也仍然清楚地留有它的社会根源的痕迹。这些痕迹集中于三个不同的主题：进步，目的论，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三个概念不同，它们也以某些复杂的方式有所重叠，并且这三个概念也是变化着的。例如，以目的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就会用潜在的目的来解释结果。例如，自然的结构或者发展可被视为是对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的证明。直到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进化”一词的含义还意味着目的论或者是对一项既定计划的展开（威廉姆斯，1976a，1976b）。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和“进步”是有所重叠的。但是，“进步”需要有规范判断，除非它仅仅指（像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那样）事件的先后顺序，比如一种疾病的发展。进化可以有方向（比如朝向不断分化），但它是不是“进步”还有赖于一个规范判断。

达尔文的理论并不明确地依赖于这些主题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他的著作主要对这些假设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关于目的论的假设。尽管如此，《物种起源》对待这些主题的态度是有些矛盾的，甚至在一些地方含糊地接受了它们。这一点导致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却也赢得了大众和科学界相当程度的认可。例如，达尔文在书中有时说到，尽管存在着生存竞

社会达尔文主义

争，长时间的结果确实导致了某些进步：

地球上每一时期的居住者都在生存竞争中击败过它们的前辈，因此，它们在自然的等级上就更高，这或许可以解释许多古生物学者们所体会到的那种模糊的、定义得不正确的感情：从整体上来看，有机体进步了。

(卢斯，1996：152)

我们发现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生存竞争”中，将方向这一概念和时间上的进化概念以及进步概念结合起来了，意谓某种益处被获得了：

当我们考虑到这种竞争，我们可以满怀如下信念来安慰自己，即自然界的斗争从未中断过，无需害怕，死亡是被鼓励的，有力的、健康的、快乐的种类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

(达尔文，1968：129)

方向问题与朝向一个特定目标或预定目标紧密相连。这同样不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实际上，达尔文可以被视为是挑战这种思维的主要干将。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提出了一个困惑，这一困惑困扰着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科学家和牧师们（卢斯，1996）。19世纪中期的知名科学理论必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须解释为什么一个有机体恰好如此适应环境。自然选择理论对这一老问题给出了一个新的、理性的回答。从明显的目的论的观点来看，是进化“指导”着有机体的结构和机能。

因此，作为一个科学家，达尔文可以说是挑战了 19 世纪正统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他的理论也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同样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一理论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达尔文可以说是给了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以致命的一击。但是对上述许多主题都可以给出另外的解释。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创世论的一个新的、科学的翻版，而不是背弃了创世论。各种各样生物的“种、属、族”都有着“共同祖先”，这一观念不说有着明显的圣经意味。动植物实现或者展开其天生的潜能这一观念同样包含着强烈的目的论因素，即使不说它明显是基督教式的观念的话。进步（尽管有些粗糙）、朝向进化、进化有自己的方向，所有这些都很容易被看作是创世论的世俗版本，挑战了宗教观念却又微妙地复制了这些观念（布勒，1983）。进化的道德目的这一观念（这一观念在达尔文那里只有简单的暗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大大发展了它）使得进化变成了戈尔纳（1988：144）所谓的“上帝代理人”。

达尔文主义可被视为当今许多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构造物”，这一说法的意味是达尔文的理论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是一个社会构造物，但并不仅仅如此。它首先是一个描述了真实的因果过程的科学理论。

现在我们差不多要开始更详细地探讨确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关于人类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出场了。可以有三种

社会达尔文主义

做法：考察达尔文本人如何将他的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考察在达尔文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形式；考察达尔文主义对后来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影响。

达尔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将被照亮。

(达尔文, 1968: 458)

《物种起源》末尾这句反复被引用的话表明达尔文认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关系到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另外，从他19世纪30年代的日记可以清楚知道他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理解人性（达尔文, 1987a, 1987b, 1987c）。华莱士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前曾经问他是否计划在近著中探讨人类。从达尔文的回复上可以清楚地知道他预计这样的讨论会带来太多的麻烦。这只会转移他的主要注意力，即发展他的科学理论。

你问我是否会讨论“人”。我想我应该避开这个主题，它为太多的偏见所包围；虽然我完全承认这一主题是博物学家最高的、最有趣的问题。

(引自郝金斯, 1997: 20)

因此，直到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的出版，达尔文自己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才广为人知。对达尔文来说，事实上也是对任何想要从进化的观点理解人类的人来说，核心的、困难的任务就在于解释人类迥异他者的、高度发达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来说，人的抽象能力、语言能力、社会性、道德性、甚至有可能包括人的不断重现的宗教性或精神性，这些如何得到解释？如若这些禀赋不是来自上帝，那是来自哪里？华莱士是相信存在某些超自然的指引力量的。

在达尔文写作期间，一系列类似的问题围绕着关键的种族问题（表2）。如果白种“欧洲人”被认为和黑人在物种上并无差别，那如何解释不同种族之间在行为以及心智发展上的差异？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人类同源论者和多元发生论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琼斯，1980）。前者认为所有人种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人性并无差别。后者认为不同的人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前者认为，有些人种只是没有发展到欧洲或维多利亚意义上的充分的人而已。后者认为，当时的许多种族应该被视为是早期的、本质上较少发展的种族一直存活到了现在。表2中详细列出的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虽然可能显得极为可疑，但在当时达尔文却卷入了这些争论并深受影响。

表 2: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

在 19 世纪，种族问题是构建明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尝试所关注的核心。进化论开始关注社会变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关注工业的迅速变化所引发的压力以及民族的长期命运（斯蒂潘，1982；巴肯，1992；马里克，1996）。

约翰·鲁布克从小是达尔文的邻居，通常被视为第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特里格，1998）。他还因为发展了基于达尔文理念的最早的种族理论之一而知名（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他认为种族的文化发展和生物性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他写道，“强者、进步者将在数量上增长，并逐出弱者、低等的种族”（鲁布克，1875：3）。他认为，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现代欧洲人已经发展到了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已经经历了生存竞争，因此比“野蛮人”先进。原始人还处于迷信和非理性之中，不能掌握抽象概念。他们的行为和态度还停留在欧洲儿童的水平。“野蛮人的心智和儿童一样容易疲倦，所以会随便回答问题，使自己解除思考的烦恼”（鲁布克，1875：9）。鲁布克认为，这些特性导致了非欧洲种族不可避免的毁灭。

在上述引文中需要注意这样一个观念，即个人的生命发展历程相应于其种族的进化史。这就是著名的“进化再现理论”，这一概念在 19 世纪广为流传。

但是，鲁布克的理论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种族问题的形式之一。例如，赫伯特·斯宾塞认为（和某些宗教领袖相一致），原始民族可能是从更高级的状态退化下来的。和鲁布克不同，他认为不能把这些原始民族看作是欧洲民族曾经经历过的早期阶段。与此同时，进化论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相信（至少在他早期著作中是这样）人类本性的一致，认为早期人类是原始哲学家。

但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们大多将“科学种族主义”视为一门伪科学。一些关键性的思想家，例如生物学家朱廉·赫胥黎，改变了对“种族”范畴的理解，认为这一范畴不过是试图对流俗偏见给予科学证明。人们使用“种族”这个词，他在1931年写道，“常常好像这些‘种族’是确定的生物实体，彼此之间显著不同。这当然不是真的”（引自马里克，1996：125）。

那么，达尔文是如何把他的进化论发展到人类和人类社会上的呢？他公开的说法是，被视为是人类特殊能力和潜能的那些东西也能在其他物种中观察到，虽然在形式上要低等一些。无疑，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这并不能排除以下可能性，即我们拥有的东西是其他动物所拥有的东西的高级版本。因此，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人肯定是一种自然物种，我们的许多素质在其他生物中可以辨认得出。例如，达尔文（1901：193）写到人类的精神能力：

人和其他高等动物在精神上的差异虽然很大，但显然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别……感觉、直觉、各种情感以及才能，比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人引以自夸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低等动物身上找到雏形，有时甚至是处于较好地发展了的状况。

但是仅仅肯定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连续性并没有解释人类（以及其他动物）所拥有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可以预料，达尔文的答案是它们的进化史。它们的显著能力使得它们在由于生物数量增加和资源短缺而产生的压力下的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从即刻行动中退出来的能力，推理的能力，沟通复杂观念的能力，支持自己部落成员的能力都可以解释为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发展出的遗产。利他主义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也可能是在争夺资源的竞争中，包括和别的部落竞争，作为保护部落的一种方式而缓慢植入到个体身上去的。因此，拥有这些能力的人将会被选择出来，反之则不会。例如，关于社会性：

这些对低等动物而言重要性无可争议的品质，人类祖先无疑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获得的，即通过自然选择，再加上遗传而得的习性。

（达尔文，1901：199）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达尔文在此处提到的是“遗传而得的习性”。我们知道，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很少重视拉马克学说，即有机体适应环境并将某些自创的能力传给下一代，从而在遗传上发生了改变。但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却开始相当重视所获得的习性得以遗传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在进化科学中少有支持，虽然这一观点如今再次引起了少数几个博物学家的严肃关注。不过，拉马克学说是 19 世纪中期众多进化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

当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考虑种族问题时，他的理论有了发展。根据他的一般性理论，他相信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源自同一物种。进而，他接受了（根据鲁布克、摩尔根、泰勒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研究）以下观点：“所有的文明民族都曾经历野蛮阶段”而“有些野蛮民族近来在他们的某些简单工艺上提高了一些”（达尔文，1901：221）。（亦可参见特里格，1998）。这些观点不仅在暗暗论断人类的发展过程 and 方向，而且还可以被这样解读，即白种帝国主义民族的“文明化”形式代表着整个进化所趋向的某种终极目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达尔文的著作不乏种族主义色彩。比如，他接受了同时代颅相学家们的观点和测量，即认为脑的大小是智力水平的标志（布勒，1990）。尽管如此，对《人类的由来》更深入的阅读提醒我们还是应当努力把达尔文放置到他同时代论争的背景下来看待。他主要考虑的是挑战由宗教激发的理论，这些理论在达尔文看来缺乏经验支持。

最近阿盖尔郡的杜克以及先前魏特里大主教提出的观点，

社会达尔文主义

即倾向于认为人类一出现在世界上就已经是文明生物了，而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是经历了衰落过程而形成的，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与相反的观点相比显得无力。（达尔文，1901：221）

《人类的由来》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使得这本书不同于《物种起源》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性选择的特别强调。这一点达尔文在分析中采取了不止一种形式。达尔文认为，像其他物种雄性为争夺雌性而争斗一样，人类中男性也在为成为最勇敢的战士、最好的猎手而争斗，来赢得最多数量的妻子。达尔文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再加上拉马克的遗传假设，智力和肌肉力量在男性中得到了特别的发展。但性选择还被达尔文用来解释不同种族间的生理差异。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说自己“困扰”于如何解释“人类种族间的差异”。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某些身体器官的持续使用都无法独立解释全世界人类的肤色差异以及其他一些生理特征差异。不过，达尔文说，“还存在一个重要的机制，这就是性选择，对人类施加着强有力的影响，对其他动物也是如此”（达尔文，1901：307-8）。简而言之，变异不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类交配过程所选择出的不同生理特征的产物。

通过这一方式，达尔文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所强调的人类同源的观点，人类和动物之间存在着连续谱的观点，在《人和动物的表情》（达尔文，1998）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观点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辩驳。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论点和价值观（特别是意味着某种进步、方向甚至是某种潜在的进化目标的这类价值）必然是他所

在时代的产物。这些论点，其中有许多其源头出在达尔文之前，正是我们现在要着手进行讨论的。

社会进化理论：将社会类比于自然 还是把社会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赫伯特·斯宾塞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十多年前就提出了“适者生存”这一概念。实际上，据一位斯宾塞的崇拜者称，达尔文应该被视为一个“生物学斯宾塞主义者”而不是继续把斯宾塞称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特纳，1985）。但真实的情况却是，进化论思想的各种形式甚至早在斯宾塞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社会理论中了。在讨论斯宾塞之前，我们来简要概括一下进化论思想的某些形式，这些形式是早期社会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斯宾塞那个时代进化论的重要特征。进步、方向、目的论这些主题在这里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它们在达尔文著作中的重要性。但在面对这些社会进化理论时我们会遇到一个方法论上的大问题。我们应当认为这些理论仅仅是把自然世界用作类比——即，社会变迁在自然世界中有着相应过程，还是认为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在自然世界中起作用的各种力和过程同样也作用于人类社会？这一关键问题特别是由斯宾塞的著作而引起的，但我们还需要讨论把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进行类比的更早的思想家。

黑格尔（1770—1831）认为世界历史是人民不断增进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理解的过程（黑格尔，1975）。这种理解的第一

阶段仅仅基于感觉——看、嗅、触摸。后来，人民开始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可以进一步实现的潜能。但是这一点导致在人是什么和人可以是什么之间产生了冲突。黑格尔认为，社会变迁起因于人民不仅自觉认识到社会的主导理念或者“精神”，而且还通过行动成为这一精神的一部分。一旦人民完成了这样的融合，他们就成了发育充分的人。他们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也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他们成了分不开的种群，在其中他们被识认为人：“对神圣的、绝对的精神过程的最高形式的表达，对进步的表达，人藉此发现自己的本性并充分意识到这种本性”（黑格尔，1975：65）。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必然是一个确定的序列和进步的过程。它还强烈地意味着有一个顶点，世界历史一直瞄准着这个理想。早期法国社会学，特别是孔德的社会学，也有诸如进步、方向这类意味的概念。孔德的进化理论由三阶段规律组成。和黑格尔一样，这三个阶段由帮助人类理解周围环境的主导观念界定。第一个阶段是“神学阶段”，这一阶段为超自然的观念以及宗教观念所主宰。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大约从1300年持续到1800年，对事情大都通过抽象的力比如“自然”来加以解释。最后一个阶段大约从1800年持续到现在，在这一阶段里，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解释被抛弃了，而基于仔细的实验观察的科学定律开始成为理解世界的主导方式。孔德设想了一门新科学，即社会学（它奠基于旧的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它将在这一阶段发挥积极作用。同样，在这幅图景中，显然也存在方向、进步甚至智力进化的注定结果这些

概念。

像黑格尔、孔德以及我们在后文中会讨论的其他著作者一样，斯宾塞致力于寻求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试图模仿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但他在这个方面走得如此彻底，他之前之后的其他社会科学家无人能出其右。这是因为他不仅试图找到影响社会变迁的规律；他在许多著作中认为物理世界和自然世界的规律可以直接应用到人类事务上。斯宾塞著作的庞杂使得我们很难概括他的思想。实际上，一位研究者曾经指出，他的著作至少包括四种不同的社会进化理论（伯林，1976）。这一点使得他的著作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的目标，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其主题。首先，斯宾塞的进化思想既和物理学也和生物学相关。物理学和生物学都莫基于能量守恒原理或者他所称谓的“力的持续原理”（郝金斯，1997）。斯宾塞认为整个世界处在流动不息的状态中。这种变动不居的状态源于“均匀物质的不稳定性”。持续的力作用于均匀物质就会导致复杂结构的出现，各个部分在分化出来的同时，相互结合得更紧。这一原理适用于整个自然，包括人类社会。以有机自然界为例，有机体不断地为生存而斗争，在它们自身和环境之间建立关系。为了适应它们所受到的作用力，有机体会发生改变。由于努力要在自身和环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有机体就越来越分化，由各个相联的部分组成。伴随着这一“直接平衡”的就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版本中，他所称的“种族”（这个术语不仅仅指人种，而是在广泛的意义上指亚种或

社会达尔文主义

者变种)的最弱小者将会死去,最强壮者将会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而且,他们将倾向于把自身的特征遗传给下一代。

如果一个种族的病弱者习惯性地生存并繁衍后代,这个种族的平均精力将会衰退;而……如果由于不满足生存条件,这些病弱者死灭了,剩下来的是能够满足生存条件的,这样就会保持这个种族对生存条件的平均适应力。

(斯宾塞, 1898: 532-3, 引自郝金斯, 1997)

斯宾塞的这一分析思路还扩展到对妇女角色的看法上。一方面,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特别是精神能力)没有被认识,男性多注重女性的外表而不是她们的精神能力。同时,他又认为妻子做家庭主妇、丈夫从事工作,再加上孩子,这样组成的一夫一妻家庭是人类最有效、最进步的组织形式(狄豪斯, 1976)。任何想要对妇女进行广泛教育的努力都将被证明,也已经被证明,会毁掉这种进步。因为既然要靠妇女来养育后代,那么对妇女进行教育就会使她们偏离繁育种族这一根本任务。斯宾塞说,“她们生育能力的欠缺,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们用脑过度”(斯宾塞 1857, 引自狄豪斯, 1976: 43)。同样也可以持相反的观点,既然妇女负责养育后代,那对妇女进行教育就至关重要。但是斯宾塞这种“达尔文主义”是和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思想十分合拍的。简而言之,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一样,都很容易在将进化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时找到舒适的温

床。

因此，进步意味着尽可能保持人类的健康和多产。但在这个方面斯宾塞和达尔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像 19 世纪大多数“达尔文主义”著者一样，斯宾塞远比达尔文（特别是写作《物种起源》时期的达尔文）更为依赖以下观念，即获得习性会从生理上遗传给下一代（布勒，1988）。换句话说，斯宾塞并不知道自然选择这一过程会活跃地（也是随机地）产生变异，直到他阅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著作。这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缺陷，他后来在《自传》中（斯宾塞，1904：501-2）承认了这一点。

在社会结构方面，从无结构的同质体转变成结构化了的异质体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观的核心。透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物质、自然世界的进化和社会世界的进化之间所搭建的关键联系。他认为无论是对于物质、自然的世界，还是人类社会，同质性都是无条理的、不稳定的。不论是在社会还是在自然中，一个同质结构其结构和功能都不能胜任下去，例如当社会（有机体的一种）持续发展的时候。其趋势会朝向分化，被分化出来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会更加依赖彼此、加强联系。在斯宾塞看来，动物生命和社会生命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著的：

一个低等动物，或者一个高等动物的胚胎，很少有可以明显区分的身体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它形体的变大，它的身体组成部分增加了，同时开始分化。社会也是如此。一开始社会群体的异质性在数量和程度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上都不显著。但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多，分工和亚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

(斯宾塞, 1893: 437)

这一讨论也许预示了我们今天生态学上的一些观点，即认为生物分化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

于是，变化带来了复杂性的增加，社会像有机体一样，一开始是个小群体（结构简单，各部分之间较少相互依赖），然后开始高度分化成社会阶层，进行商品贸易。甚至在这里斯宾塞仍然进行生物学类比，将货物和道路的关系类比成血流和血管的关系。类似地，他还将政府的出现与哺乳动物（当然，尤其是人）的复杂脑体的出现相类比。通过这些方式，人类社会的变化就被“自然化了”，但却是一个更广大的自然和宇宙过程的一部分，这个更广大的自然和宇宙过程也影响着整个人类。

斯宾塞的分析中重要之处在于他对简单社会和复合社会所作的区分。所谓“简单”社会，指的是由单个的、自主的、同质的单元所组成的社会。所谓“复合”社会指的是出现了渐增的异质性的社会。比如，当今一个超级领导人有可能统治许多群体，它们通过强力或者相互协议聚合在一起。“双重复合”或者“三重复合”的社会指那些由原先非常独立的社会单元进一步整合而成的社会，最终出现的社会形式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以及某些古老的社会形式比如罗马帝国。

更具体地说，斯宾塞在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作了区

分，并倾向于认为前者会向后者过渡。根据他的类型学，军事社会的特征是极度的集权，这个社会，社会成员被压制、规训以支持这一权力。工业社会的特征则是民主、权力分化，政府的工作是为社会成员服务，而不是反过来。然而，斯宾塞看到了他那个时代有一种向古老的“军事”社会的要素回归的不良倾向。比如，英国国会宣称要扩大军事远征军，以及诸如地方政府管理委员会这种新型政府干预形式的增加，斯宾塞对这些感到深深的疑虑。这些使得现代社会重新集权化，通常由退役军人来实现这一点。

斯宾塞对完美的社会形式有一个清楚的设想。即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每个人都拥有充分实现自己潜能自由，前提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个人、家庭、种族会由于不适应而被淘汰的长期进化过程，经过长时段之后，将会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在一个预示了某些现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观点中，斯宾塞对他所称的“私人的善行”表示积极支持，这是个人或群体给予他者以福利的自发形式（奥福尔，1999）。这些都和他的进化思想相符合。他坚决认为政府干涉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过程是错误的，自我实现会正好找到个人身上。自由贸易、新闻自由以及普选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和达尔文不同的是，斯宾塞对人口增长后果并没有马尔萨斯式的恐惧。人类的一个显著能力便是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高出生率所导致的不仅是（这是受欢迎的）那些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形式的人的消亡，也导致了拥有新能力（包括与他者协作的能力）的新型人类的产生。

因此，像其他社会进化论者一样，斯宾塞的思想中包含着

社会达尔文主义

相当清晰的方向和进步概念。尽管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斯宾塞把他自己所在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视为历史发展所一直朝向的理想，但实际上，他确实曾简要提到过一个“更高”的社会形式，在该社会中智力和美学问题比他当时所在社会的唯物主义要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伯林，1976）。

斯宾塞的著作被广泛地梳理过、分析过。他的分析、他的政治观对不同社会 and 不同阶层的影响也被广泛地探讨过（例如，参见豪夫施达特，1959；班尼斯特，1979；郝金斯 1997）。人们可能会猜想，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保守版本或者自由市场版本在美国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家园会最大程度地被接受。但这一接受的程度和形式究竟如何，却还存在争论。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姆·萨姆纳常被视为是美国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人物。他最有名的观点是，生存竞争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如果有人在路边倒下了，这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人要和自然作斗争，需要忍受很大的艰辛。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要忍受这些而责难我们的同类。我的邻居和我一样要斗争，使自己摆脱这些困难。如果我的邻居在斗争中比我更加成功，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引自豪夫施达特，1959：56）

但另一方面，班尼斯特认为美国后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高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估了对斯宾塞和达尔文所作的保守阐释的意义。这一高估有助于强调后来自由主义者远离过分保守主义的程度，但班尼斯特提出，这对斯宾塞理论的本来面目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萨姆纳自己最终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社会需要变革而非意味社会以严格的“适者生存”方式延续。类似地，在欧洲国家，达尔文的“人类本质上是互助的、相互连带的动物”这一观点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一立场特别为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例如戈尔蒂耶所持，也为克鲁泡特金所持，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克鲁泡特金。

社会进化：方向，进步，退步

1858年11月斯宾塞寄给达尔文一份自己论文的抄本（见斯宾塞，1996）。这些论文中包含着他的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这一一般理论。论点仍然是说这一转变过程不仅适用于自然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世界。例如，在早期社会中，“每个人既是战士又是猎人、渔夫、造工具者、建筑者，每个妇女从事同样的艰苦劳动”（斯宾塞，1996：19）。达尔文对此的反应除了谨慎就没有别的了（见表3）。尽管他称赞了斯宾塞，但显然他并没有类似的想法，将他的理论从自然拓展到社会。

表 3:

达尔文写给斯宾塞的信，1858 年 11 月 25 日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您好心地把您的论文寄给我。我已经读了其中的几篇，很感兴趣……目前我正在准备一本关于物种变化的长篇著作的概要；但我仅仅是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而不是从更一般化的观点来处理这个主题；另外，在我看来，您的观点不可能得到改进，不过可能会很方便我加以引用……

请允许我保留/亲爱的先生/真心感谢您的/达尔文

资料来源：布克哈特（1996：196）。经剑桥大学出版社慨然应允得以复印。

但随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科学中进化思想的发展，它离达尔文的思想 and 自然科学越来越远。进化观念越来越被作为隐喻使用，和进化生物学没什么关系，也不追求斯宾塞对物理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进行的那种宏大的综合。而且，社会科学家以及类似的科学家渐渐提炼和发展了达尔文著作中为他们所熟悉的、易于接受的部分，丢弃余下的部分。具体来说，他们特别重视把进化视为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并且，如同拉马克所说，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将获得由他们的祖先发展而出的特征。布勒（1988：56）对自然科学家的评论甚至更加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适用于斯宾塞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不希望看到偶然突生之事，而希望看到包揽一切的规律性，以肯定他们自己的感觉：这个世界是理性计划好的创造的产物。”结果是，可以看到一长串“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些主题我们前面讨论过，留存了下来，其他主题融入了这些主题。特别是社会变迁的一般方向这一概念留存了下来。不过，关于这一方向究竟有利于社会秩序还是会损害社会秩序，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着前一种观点。他们在许多方面批评了达尔文。例如，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仅仅是将霍布斯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理论从社会嫁接到了有机自然上”（引自伍兹和格兰特，1995：321）。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达尔文的著作，并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最终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观念之上（伍兹和格兰特，1955）。但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将社会历史划分成了一系列进化“阶段”。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提出欧洲历史经历了四个时期：公社或部落时期；古代或古典时期；封建时期；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1970：39-57）。在《资本论》中补充了最早的“亚洲”模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 1973：47-514）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框架。每个社会自身中都包含着下一个社会的萌芽。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源头在它之前的社会构成中，或者，用恩格斯（1989：274）所使用的生物学隐喻来说，“封建的中世纪在它的坟墓中长出了注定要在未来提出平等这一现代要求的阶层：资产阶级”。类似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也包含有未

社会达尔文主义

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萌芽（艾尔森，1979；拉姆西和哈沃斯，1984）。这样一种观点和现代社会运动诸如“预想社会主义”有类似之处（罗伯萨姆等，1979）。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段论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有一个纲要式的讨论，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从自然中不断分离出来相关联这一事实的后果。社会的早期阶段是由土地的公社或集体所有制形式来表征的。这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否定了，结果是人类丧失了和自然的直接联系（狄肯斯，1996）。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和社会关系之间作了重要的连接，虽然这一连接并不很清楚。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阶段论令人生疑，他们却给出了连接进化思想和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线索。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宾塞有分歧之处。社会进化在不可避免地在朝向一个终极的、最高的、完美的状态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理论家都对最终的结果持乐观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初社会思想的一大主题就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瓦解了。因此，这意味着虽然可以识别一个长期方向，但这一方向并不很受欢迎。

滕尼斯（1955）大概是最明显地持这一观点的思想家。众所周知，他讨论说，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共同体单元到共同体协会，再到社会协会，最后到社会单元这一过程。他把家庭视为共同体的原型，通过家庭来思考建立在血缘、地缘、亲

第一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方向、目的、进步诸问题

属关系、邻里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最后一个阶段，即社会单元，代表着恢复共同体这一古老社会形式的企图。人际关系技术、社会安全、工作保险创造了新的人类集群，至少从表面上看，类似于古老的社会秩序。尽管这些新社会单元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但这种新社会秩序却存在无序化、个人主义化、分裂化过程这些核心问题。

因此，对滕尼斯以及其他许多关注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论家来说，社会进化有确定方向，但是这一进化方向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涂尔干是个例外。据坎顿（1998）的研究，涂尔干对达尔文的理论读的不准确，以为分化和物种的增加最终导致协作和互惠而不是竞争。从“机械团结”社会类型（基于传统和小型共同体）转向“有机团结”社会类型（基于劳动分工和社会成员个性的增长），会带来协作水平的提高。坎顿（1998：106）认为，涂尔干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解释，是因为他“热忱地想要相信，他的祖国法兰西所经历的困难乃是通向未来进步的一个序曲”。

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把进化用作隐喻的领域。这和达尔文以及生物学的科学进化理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滕尼斯间接提到过早期社会中人和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一论题。但是这些理论和关于人类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环境”的自然选择理论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少。

结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方法论上的问题

对斯宾塞影响的讨论少于对达尔文的讨论。斯宾塞和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

思想的进化概念常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方法论上非常成问题的地方，特别是在斯宾塞那里。在许多方面，包括他提出的影响地球上一切过程和一切有机体的宇宙进化过程这一概念，他都认为人类社会服从影响自然界的同样法则。他试图给出一门包揽一切的科学，这个雄心马克思也有过，在恩格斯那里则更有甚之。

然而，斯宾塞并未充分地细化人类社会、进化和生态过程、物理定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当今的现实主义认识论认为在以上每个领域内都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和因果过程（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柯里，1994）。物质世界有自己的因果力量，生物世界、生态世界、人类社会都运转在这些力量之下。同样地，自然世界有着不同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在这些过程中发展。最后，人类社会当然受这些过程和法则影响但并不为它们所决定。有仅属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变迁的真实因果机制和过程，例如阶级关系。但与这样对世界采取分层观点、认识到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因果机制在起作用的努力相反，斯宾塞采取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宇宙进化观，然后将整个人类社会挤放进去。这幅图景用一种简单的，也许是诱人的方式描绘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它太具误导性。

这里还有更重要的理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无论是关于斯宾塞的自然还是直接关于达尔文的自然的进化理论，都十足地是“社会构造物”。这些理论被用来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利益。达尔文的科学理论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已经说过，这是恩格斯的一个观点。马克思也这样说过，他在给恩格

斯的信中写道“令人惊异的是，达尔文如何从动植物中认识了他所在的英国社会的劳动分工、竞争、新市场的开放、‘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引自施密特，1971：46）。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恳切地说，虽然达尔文的理论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但它们大体上是正确的，最终会成为一般性社会理论的基础。

因此，虽然用现代词汇来说，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社会构造物”，但却远不止于此。达尔文的理论宣称要描述真实的过程，特别是那些看不见的变异和选择过程，这些（和性选择以及资源短缺一起）确实存在于真实的自然世界中。并且，就达尔文的理论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言，它也确实可以宣称已经发现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一些关键机制。但这些机制和人类社会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对社会理论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最大挑战。如何借鉴自然科学和物理学发展出一门社会科学，同时它又充分蕴含着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特点，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即便不说是雄心勃勃的话。我们将在后文中简要勾勒可能达致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

第二章 当代社会学中的进化思想

上一章指出了进化思想的三个紧密相连的主题，特别是当把进化思想应用于社会变迁时。这三个主题就是：进化过程中发生的进步、社会变迁的方向、社会变迁所内蕴的目的。这些主题继续留存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但是，正如本章所要指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成问题的。在达尔文的进化概念中并不带有这一假设：变化必然意味着进步或者方向。在达尔文那里，未来是敞开的，变化方向是偶然的。达尔文的理论也不暗示任何有关“方向”或者内蕴“目的”的概念，尽管达尔文偶尔有过这种提法。达尔文的整个理论莫基于有机物种所发生的自发变异这一观念。这就意味着并不必然会导致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增加。生物突变是随机的，环境变化也是如此。要使进化的方向朝向复杂性或者异质性，就意味着必然某种潜在的原因或神在操纵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而就人们所知，这样的因果机制或神并不存在（赫斯特，1976）。现代环境理论认为复杂性（例如，在“顶级群落”形式中）更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

“复杂性”就是进化的方向。

认为进化朝向更高的复杂性或异质性这个方向，这一设想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成问题的。例如，如果在分子水平上而不是脑、心脏、肺这种水平上来分析有机体，“渐增的复杂性”以及“渐增的异质性”这种概念将很难持存下去。

因此，无论是达尔文还是现代以遗传为基础的生物学都并没有为进步、方向、目的论这些概念提供真实的支持。但是这些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隐现于现代社会思想中。大量的这类思想使用了社会进化的某些概念。后文中有一些这样的例子。社会变迁是否会带来“进步”，社会发展是否存在方向，社会变迁是否内蕴着某种“目的”，这些争论都和进化思想合流了。换句话说，关于社会变迁及其是否展示了某些明显的模式，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余地。但这和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进化没有多少关系。不过，尽管有着这样的基本缺陷，古老的社会理论的一些遗产还是可以被用来构建更好的路径。

社会进化和进步的获得

和现代性相联系的突生进步的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现代化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工作现在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勒纳，1958；罗斯托，1960）。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有赖于一套特殊的现代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一套支持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以及一套“现代”教育体系、政治体系 and 法律体系。“传统”社会是指那些社会结构“在有限的生

社会达尔文主义

产职能内发展而出，基于前牛顿时代的科学技术以及前牛顿时代对待物质世界的态度”的社会（罗斯托，1960：4）。如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抛弃这些体系。以氏族为基础的统治形式或者专制统治形式对发展而言是障碍，某些教育形式、习俗形式、传统形式诸如上述“前牛顿时代的态度”也是障碍。因此，去除这些制度（或者说得更消极一些，“抛弃传统社会”）就被视为是“发展起飞”的根本先决条件。要达成这个目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文化、通过受过教育的精英来启动现代化**。发展起飞的先决条件还包括往传统社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上投入新技术和资本：

因此，要成功地实现转变，一个本质的条件就是**增加投资——更重要的是——将迄今为止没被开发利用的大量革新技术运用到土地和其他可以尽快提高产出的自然资源上。**

（罗斯托，1960：22）

几乎不可避免的是，通过把不同的社会放置在一个谱系上，一幅设想一系列发展阶段的图景得以形成。非洲部落以及澳洲土著被放置在谱系的一极，没有好运气得到投资，因此也就没能进步。尽管如此，这些社会总是存在经济兴起的可能性。同时，另外一些社会比如美国和西欧则被放置在另一极，最发达的一端。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和19世纪的进化思想相仿，只不过先前所称的“落后”社会现在被称做“传统”社会。

因此这种新进化思想遇到很多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首先，打算运用这一理论的人发现很难实施这一点。例如，在如何衡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这一方面就存在一些严重的困难。对一个“传统”社会所作的经济投资究竟服务于什么，我们知之甚少。它究竟是为了提高当地的生活条件呢，还是为了给更富裕的、已经现代化了的社会提供原材料和资源？而且，即使“传统”社会确实采用了现代制度（例如大规模科层制），这些革新是否一定会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发展也并非确切无疑。被认为是对这种观点的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兰克（1972）。他驳斥了这种社会进化思想的整个根基。他认为，“阶段”观念完全缺乏历史依据。他认为这一观念不可信，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顺序。例如，“第三世界”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现今发达国家所以发展的条件。他认为，未发展的第三世界社会常遭受欧洲和美国强化的殖民统治。一个社会究竟是“传统”还是“现代”和它的内在特征没什么关系，倒是和它是否处于发达社会的“卫星地位”有莫大的关系。

历史研究表明，现今的不发达状况很大程度上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家和发达的大都市国家之间过去以及一直延续的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历史产物。

（弗兰克，1972：3）

争论无休无止。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甚至还有一些马克思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主义者现在认为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太笼统、太不精细了。人们认为，亚洲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正是由于它向西方文化、技术以及工业方式敞开了大门。如今对殖民的看法是它既带来了不利也带来了好处。如同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的桑德斯（1955：34）所说的，“尽管有着粗糙和不公，……殖民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已被证明是利大于弊”。世界的生活标准提高了，全世界的健康水平也提高了。不过，这些争论并不是这一章的要点。在这类争论中，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进化”概念整个儿被彻底遗忘了。“阶段论”以及其他一些由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从自然科学中借用、改造了的进化观念不仅和进化论鲜有真实的关系，至少可以这样怀疑，进化思想在社会世界的运用已经混乱不明了。由于忽视了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这些观念加深了长久以来困扰着西方思想的文化——自然之间的鸿沟。在考虑如何使进化思想回到视野内之前，我们需要先看看社会科学中进化思想的另外两个核心主题。

社会进化有方向吗？

社会进化著作中另一个密切相关的主题就是这一观念：社会（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进步阶段或者进步次序。我们在许多社会学思想中都发现如下设想的转变：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或者从现代社会秩序向“晚期现代”社会秩序转变。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从19世纪

的社会思想中借来的。这种观念特别像是斯宾塞“结构分化”思想的姊妹篇。我们已经知道，他认为所有的进化（包括社会进化）都会引起从简单的同质结构向复杂的异质结构的转变，这一复杂的异质结构由渐增的分化水平来决定。社会思想中阶段论绵延不断，很诱人。我们也已经看到，阶段论也是马克思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滕尼斯理论的核心部分，滕尼斯的理论认为个人主义、竞争、非人格化会逐渐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古老的共同体形式的部分复归。

从当今的环境意识来看，“方向主义”这一主题最有意思的阐发来自人类学，特别是斯蒂沃德的“文化生态学”。这是生态学思考被系统纳入社会理论的少数例子之一。斯蒂沃德（1955：36，引自桑得森，1990）认为将环境考虑进来克服了“文化源自文化这一无用的假设”（参见桑得森，1994）。他给出了早期社会进化的相似方向。根据考古学的资料，他认为在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和秘鲁都有过类似进化过程，即从游牧——采集社会转向不断强化的农业社会，最终转向军事和帝国统治，并逐渐产生严格的阶层结构。在论证这些时，他认为在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为了建成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就需要广泛的政治控制力。而农业的加强又会造成人口的增长，从而在这些社会中引起冲突和战争。这些冲突又会引发进一步的镇压，建立帝国。结果是进一步的军事化，阶层权力进一步集中，再次引发通过灌溉系统来控制自然资源的努力。

生态学的思考从 20 世纪社会科学中最著名的进化论阐释

社会达尔文主义

者之一，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著作中吸收了某些思想。要理解帕森斯的社会进化路径，我们首先必须要理解的是，他认为所有的功能系统，其尺度大到社会系统，小到人格系统，都拥有某些潜在的属性。这些属性就是：

(A) 对环境的适应。例如，一个社会系统必须获得和分配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B) 定义目标，动员力量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例如，一个社会系统必须确定目标并动员其成员去实现这些目标。

(C) 各部分的整合与协调。例如，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必须要维持社会凝聚力。

(D) 潜在因素的维持或者模式维持。例如，一个社会必须存储、散布观念和符号。这些对于管理社会及其张力都具有根本重要性。

帕森斯还对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特别是生物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他认为“高信息”子系统控制“高能量”子系统。因此，有机体向人格系统（心理）系统提供能量，人格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能量，社会系统向文化价值系统提供能量（通过人们的活动）。文化系统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信息，社会系统向人格系统提供信息，人格系统向生物有机体提供信息。总而言之，这一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完全相反，是文化主宰着生物、人格、社会，而不是经济主宰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在帕森斯看来，社会进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

阶段通过书写来使文化在时间进程中稳固下来。“中间”阶段通过法律使观念制度化，使规范和习俗条文化。最后，“现代”阶段通过广泛的教育以及职业阶层的兴起来转变文化系统。这里仍然需要注意，文化主宰着社会变迁的所有方面。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变迁可能是由外在压力比如环境变化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由内在系统造成的，比如家庭“子系统”出现了紧张。

帕森斯提出了所有进化形式的一般法则，无论是社会进化还是生物进化。需要注意帕森斯在这一点上和斯宾塞的相似性。帕森斯认为，一般来说进化一方面导致各部分逐渐分化，另一方面导致新的整合形式的建立。因此，他认为，随着社会在时间中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系统的彼此分化。例如，扩大了的家庭从早期工业化中的经济功能退出来，专门负责孩子的社会化。家庭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分化。男人们走出去挣钱养家，女人们专门对孩子进行社会化并照顾孩子。每个不断分化的子系统（例如工厂和家）都提高了其适应能力或者说生存能力。

但每当新的分化产生，社会必须更具适应性，它必须能够更好地应付所面临的问题。随着分化过程的继续，帕森斯看到新的协调问题的出现。这需要新的技术和能力，需要使得更多的人发挥并实现潜能，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社会变迁必然引起社会的价值系统的变迁。一方面，不断的分化意味着难以找到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人的价值系统。要使一个社会不因为不断分化而分崩离析，就必须创造出一套新的、更普适的价值，以容纳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从中间阶段到现代阶段最重要的发

社会达尔文主义

展变化是产生了现代法律——帕森斯称之为“规范秩序的制度化符码”（帕森斯，1966：26）。

帕森斯的进化模型在许多方面都富有挑战性。他是严肃对待外在环境和有机体进化的少数现代社会学家之一。他认为系统的“适应功能”是社会和环境相联系的方式。而且，这一适应是通过（高度可塑的）人得以发生的。帕森斯连接生物系统、进化系统、社会系统的开创性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社会理论遗忘了。

对帕森斯的批评也相当之多。例如，他所谓的现代社会看起来很像是美国社会。这一点暗示美国社会是所有社会必然朝向的发展目标。“分化”形式似乎拒斥了中介形式。例如，近来女权主义者对家庭“子系统”内新近发生的“分化”做了许多研究。更一般地说，帕森斯著作的高度抽象使得他的思想中所涉及的机制迫切需要得到准确的阐明。例如，坚持说“子系统的属性”，他并没有使我们了解有机体究竟如何从环境中发展。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中的因果力量的实际互动方式的变化，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东西。简而言之，“系统”被神化了，被赋予了生命，其代价却是并未对其中涉及的真实机制给出真正的理解。因此，帕森斯开拓了连接进化论和社会思想的新领域，但他没有充分阐明这一连接的复杂性如何被概念化。

斯梅瑟尔（1959）和帕森斯一样是一个进化论者。他认为，传统社会中所有必需的功能都是由单个结构承担的，比如家庭、亲属圈或者部落。然而，社会进化产生了由专家结构承担的功能。例如，一个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工厂里

进行工作，在学校里进行教育，在医院治病。因此，和斯宾塞和帕森斯一样，斯梅瑟尔说的仍然是社会的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也带来了潜在的问题。不断的分化和专业化很好，但需要整合。不能很好整合的社会会遇到严重的问题。

不像许多别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斯梅瑟尔（1959）试图运用他的观念。他的理论呼应了斯宾塞和帕森斯的理论。但表4的引文指出，不断的分化是朝向社会“进步”的总体动向的一部分。斯梅瑟尔所描绘的“生长”、“提高”、“文明化”图景的一个因素就是所讨论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彼此分化。

帕森斯和斯梅瑟尔这样的学者，也和那些认为社会变迁会带来进步的学者一样，遭到了严厉的抨击。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关于社会变迁的普适的、潜在的进化概念，强烈暗示着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的终极发展形式。同样，也还是像弗兰克（1972）这样持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做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今天看来也有些过时了）最终导致了这类进化思想的垮台。斯梅瑟尔关于家庭瓦解、工厂兴起的经验著作显示了他的可贵洞察力，但他所考察的现象如果用诸如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无产阶级化这类概念而不是分化、功能、子系统等概念来理解则显得更容易些。（实际上，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重新解读斯梅瑟尔的经验著作，可能会非常有趣）。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类进化思想的反驳同样不是此处的关注的主题。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表 4:

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社会进化：斯梅瑟尔对早期工业化的研究

斯梅瑟尔使用了 18 世纪末工业化早期兰开夏州棉花工业的案例材料做研究。围绕着某些任务，工作开始不断地专业化。渐渐地，从前在“农舍工业”这种形式下所做的工作转移到了工厂中。但即使是在这些新的工作场所中，仍然出现了协调问题。对家庭的影响也非常大。随着工作在别的地方进行，就需要新的机构来替代原先紧密抱团的家庭。新型机构诸如银行、合作社、贸易联盟就发展起来了。同样，这幅图景仍然是一幅不断专业化的图景。并且，当需要新的法律机构来充分管理、联系这些新型机构的时候，这一专业化过程就深化了。斯梅瑟尔所给出的总图景分七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表达对社会系统的某种特征比如对资源使用的不满。接下来五个阶段处理这种不满。在最后一个阶段，“在经过一个突出的进步期后”（斯梅瑟尔，1959：402），社会被重新整合了，不过已经大大分化了，新的、更多的专业机构出现了，成为社会系统的确定组成部分。

首先是关于“分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当然也适用于斯宾塞和帕森斯。将自然世界的分化与社会世界的分化做类比，这种情形很普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生物世界中也难以确立一条分化规律。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用的是什

么分析尺度。类似地，在斯宾塞和帕森斯的著作中，社会结构的“分化”究竟发生在什么层次上也并不清楚。有时是在个人层次上，有时又在国家层次上，有时又在种族层次上。同样，弗兰克提出的对这类进化思想的驳斥又导致笼统地、完全不令人满意地否弃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之间的任何关联。必须找到一个改进的办法，既保留进化论者的有益眼光，又能够更好地说明社会发展和进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社会进化是目的论的？

进化思想用于人类社会时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进化朝向某种“目的”这一观念。现代著作中与此最接近的观念大概来自一些环境哲学家。例如，马修斯以及某些“深层环保主义者”认为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元素诸如生态系统、有机体（包括人类）甚至无机体都有内在价值（马修斯，1991；奈斯，1989）。只有当人类社会创造出一整套以环境为依据的新价值时，上述价值才会充分实现。然而，这类环境哲学家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既然人类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物种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也很复杂，如何能够实际设想出一套新的、以环境为依据的合理价值？（参见海沃德，1998）。什么是人和自然最终都趋向的发展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目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类环境哲学对社会和权力关系的深深忽视。但是，当我们转向社会理论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环境。

社会达尔文主义

如今少有社会理论家以类似宗教的方式认为社会在朝向一个不变的、计划好的目的前进了。这一观点的现代形式是：社会进化有着既定的、不变的逻辑，即使进化的目的从未被完全预料到。最近的观点和黑格尔的思想有某些紧密的联系，这就是福山(1992)的著名论断：自由资本主义几乎已被公认为是“历史的目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已经胜利成为历史的终点，因为它不仅给予了每个人以知识和价值，而且同时还提供了高物质财富水平。这段话的含义之一就是，历史(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一直在朝这个“目的”发展。不过，福山现在已经修正了他的一些论断，修正的方式和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有关。一方面，他认为人有一种“解决社会协调问题、发明规则来控制个人选择的天生能力”(福山, 1999a: 231)。从长时段来看，这种能力会抵制社会疾病、高犯罪水平和社会崩溃。因此，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相对和谐的“目的”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产物。但以一种对人类基因的重要性有着诸多混淆误解的方式，他又认为生物技术学很快就将使得人类可以掌控自己的进化。根据这一观点，现今的人类将通过基因控制将自己“废除”，一个新的“后人类”历史将会展开。福山无论是在理解长程社会发展时还是在“终结”人类时都在相当程度上求助于人类基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对基因以及“人性”的信仰是非常成问题的。

关于这一论题的较为陈旧的阐述是，社会方向是由技术革新所设定的，这是诸如科尔等人(1960)以及阿伦(1969)等著者的“会合”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工业化形式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与它们的相似之处，特别是与这些相似之处的潜在

原因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动员其人民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管理。特别地，工业主义对技术和科学的需求意味着“工业系统需要广泛分布在劳动力中的大量技术和专业能力”（科尔等，1960：34-5）。

类似地，扩展家庭的功能在削弱。教育由专门机构来负责，实际上，工业主义普遍需求流动性的一个结果是，扩展家庭分解了。工作伦理兴起了，引导政府和自愿组织提供先前由家庭承担的功能。这又产生了管理和连接这些新机构的法律。通过这些方式社会进行了重新整合。共产主义只被视为是工业化的一种形式，一种工业社会得以达成的方式。类似地，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或政治精英，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最终都会从思想上适应受技术驱动的工业社会的需要。

一个相关的论点来自所谓的“后工业”理论。同样，其含义是经济生产会对所有社会赋予潜在的、同样的秩序。这个论点至少有三种版本，每种版本都不仅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潜在机制这一概念，而且展示了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社会的明显的、普遍的进步。都兰等人（1965）和马里特（1975）提出了从以生产物品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生产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转变。他们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没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一边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组成的新阶层，另一边是旧式的工人阶层。他们认为这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在后文中我们还将遇到这一论题的新版本。

曼（1973）提出，社会进化典型地经历三个“阶段”，劳

社会达尔文主义

动过程中的技术和变化提供了变迁的潜在动力。虽然曼反对马克思的许多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革命潜能的信仰），但在人类异化（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柱）的阶段和机制方面，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某些很强的关联。如同后文要讨论的，这种分析在对进化思想和社会科学思想进行现代综合时是有用的。在曼的分析中，“阶段 A”基于小规模的手艺生产，其运作靠的是劳动者利用特殊技艺的能力。“阶段 B”基于标准化、大订单、相同的劳动力以及“本质上是异化的”工作（曼，1973：54）。“阶段 C”基于不断的“技术进步”、连续化的生产，工人被变成“纯粹的机器看护者”。尽管如此，根据曼的理论（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存在分歧），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有着解放的希望。通过引进集体工作这一因素，自由活动得到允许。并且，这里开始了一个再技术化的过程：“工人为了能够成功看护这些复杂而昂贵的机器就必须学习新技术，这样工作兴趣就重新生发出来”（曼，1973：55）。

另一个更乐观的“后工业”理论版本是贝尔（1973）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发达”西方社会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质变过程，或者说正步入一个新阶段。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机制。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变成关键资源的时代，这个时代尤为欢迎技术专家。这些专家正在取代老式工厂主，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是受过高等科学和技术知识教育的人，这些知识已经远不再受工业的引领。后工业前景的另一特征就是在生产商品的工业之外，服务业开始兴起，在蓝领劳工之外，白领工人开始出现。这是一个新型社会，其中知识取代

了物品成为消费者想要购买的关键事物。

因而，会合理论和“后工业”理论都暗含这样的意思：社会存在一个内在的技术逻辑；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及所有发展中的社会置下了基本的规范图式。在许多这类著作者看来，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到一个确定的方向上。这样一个方向很大程度上是产生自社会的内在机制——比如技术或者科学或者知识。相应地，这个社会的某个特殊阶层相比于其余的人而言，将被赋予极大的权力。

这种类型的社会科学思想如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思想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对进化问题不再有清晰的参考价值了。尽管如此，上帝之手的观念，把社会带到一个确定方向上的原动力概念，仍然萦绕在社会理论中。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或者“风险社会”的转变就是这样的例子（贝克，1992）。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内在方向这一概念在福山的著作中也存在。另一方面，有许多理由表明应当否弃这一观念。可以把社会进化的未来形式视作是敞开的、不可预知的，就像自然界的进化一样。例如，资本主义可能导向新的个人认知方式，即工人认识到他们能够为自己控制生产过程（齐蒂，1994）。这再次意味着，和其他事物一样，“目的主义”方向这类概念允许对人性进行各种各样的设想。如我们后文所说，人是积极的、有反思能力的、灵活的，单是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考虑长程历史趋势理论时要足够谨慎。将进化思想引入社会理论在某些方面是有益的（例如强调了社会变迁的突生形式），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则导致了混乱。这主要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未经批判

社会达尔文主义

地假定社会进化有方向、目的，带来进步。其次，忽视或熟视无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除极少数重要例外）。

社会进化：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出路

对社会科学中进化思想的批评已经导致进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理论冻结了（桑得森，1990）。这个问题延续到了今天。特别地，德国社会理论近来在进化思想上有了进展，有时是融合了帕森斯的要素和少许马克思主义。这群社会学家有思想上的差异，但他们都像帕森斯一样保留了社会是一种有机体形式这一观念。他们也都提出了社会是否有内在方向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社会系统需要他所谓的“反思中心”，通过自我理解过程聚集关于社会自身的知识。另一方面，他认为现代社会正日益分化为“专门子系统”。结果社会的内在趋向就是无序化：

在分层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子系统能够占据最高等级，以过去帝王统治帝国的方式代表社会整体。现代社会不再拥有可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指导的权威中心。

（哈贝马斯，1996：357）

类似地，埃德（1984，1987）认为现代社会是作为一个集体学习系统而发展的。不过他较少强调和社会分化为子系统这一分

裂过程相联系自我操控问题。他认为道德规范会慢慢发展起来，解决争议和阶层斗争。他认为我们是学习型社会的一部分，在学习型社会中，文化进化（包括人与人的沟通）独立于生物学进化。最近，他强调了人类学习和社会变迁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埃德，1999）。例如，现代社会所产生的风险引发了新的知识创造。学习型社会为社会变迁提供了背景（“社会可以从中选择它的走向”），但并不直接决定这一变迁的方向或者形式。

卢曼（1982，1989）是另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学家，在他那里，系统理论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是帕森斯的学生。卢曼也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持续地进行功能分化，分化成他所谓的“自我塑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拥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范和法则。这一分化过程有利有弊。一方面人们从集中化的专制权力中被解放出来了。至于外部环境：

复杂性更高的系统通常能够容纳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输入和输出可以分开），因此可以应对更复杂的环境。

（卢曼，1989：12）

另一方面，这一分化过程导致每个自我塑成系统会产生其他系统需要应对的外部不良影响。这样看来，社会很难有什么发展方向。现代社会在无准备、无计划的基础上同时产生和解决问

题。这还包括环境的恶化，各子系统之间的沟通变得紧张。这种分析和贝克（1992）的分析相关，贝克针对现代社会提出一个概念：“结构化的不负责任”。他也认为社会子系统根据自身的规则运行。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则是获利，政治系统的运行规则是赢得下一次选举，科学系统的运行规则是发现真理，这一真理独立于科学的应用，法律系统的运行规则是被过去所制定的法律的界限所阻碍。贝克认为，所有这些都导致“超级危险”或者“风险社会”，根源在于社会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结果造成社会没有能力应对产生的诸多问题。

进化思想在这些新近的理论家那里有时远不如在早期的社会理论家比如帕森斯那里来得清楚。而且，社会科学中进化思想的历史似乎显示了社会理论同生物学主义的日渐分离——即，不再认为可以直接利用生物学理论来解释社会。但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类比仍然有着很大影响，比如在卢曼和埃德的著作中。并且，在这些系统思想的现代形式中也存在许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社会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和有序或无序相关这一论题。这些思想带来了一个受欢迎的关注视角，即认为人和人群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进化能力，他们的心智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学习并适应新环境。

强调社会是一个互动系统，强调功能分化渐增，这表明这些晚近的德国思想家在许多方面都是从斯宾塞到帕森斯这一社会思想源流的继承者。这本身并不必然构成问题，但是必须要问的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之间的类比是否真的值得花费这么大的努力？例如，生物学的分化概念（不同于社会和技

术劳动分工这一概念) 如何真正帮助了我们对社会的理解? 这些理论家用作他们概念出发点的“系统”实际为何物? 例如, 是否真的有必要用系统理论和现代帕森斯主义或斯宾塞主义来探讨现代社会是变得更难还是更容易控制了?

运用这些概念的人会回答说, 要理解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运用系统思想。但是, 到实际连接各个部分的时候(例如, 生物进化过程, 这些过程和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 首先要考虑的仍必须是: 具体描述其中所涉及的实际因果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同内在自然力、外在自然力之间的关系。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知道, 比如, “超级危险”、“风险社会”甚至“系统”是不是只是社会学家的虚构。简而言之, 系统分析以及将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行类比可能确实带来了有价值的洞见, 但是, 所提出的问题最终能否在分析它们的系统框架中得到充分理解, 仍然是个疑问。

本章追溯了社会理论从社会变迁和自然进化的类比中分离出来的痕迹。不过, 进化思想的痕迹仍然存留在系统理论中。但是, 拒斥进化思想的代价就是越来越否定文化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这类问题中的某些, 特别是文化和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将在下文提出。

第三章 自然—文化 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本章试图在进化思想和社会思想之间建立新的连接。首先要讨论某些特定的、通常无所助益地将进化思想引入社会理论的方式。社会进化概念虽然有助于这些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更具内在连贯性，但却没有把人当作一种携带着进化史的自然物来充分理解。在生物学方面我们看到相反的问题：将社会理论奠基于遗传学，只导致了对社会和社会变迁的有限的、不充分的理解。要进行新的整合就需要探究社会和作为一种自然物的人之间的联系。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的关键联系是，在社会背景中人产生了自我认同。人有特别强的自我感。这种自我感是在社会中产生的，由社会形塑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形成。

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人和自然是分离的。这一二元论至少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传统的起始（卡普拉，1983；英古，1986）。到了17世纪由于笛卡儿、培根的出现以及工业社

第三章 自然—文化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会的产生，这一二元论更加显著。这时二元论中二者的关系是不对等的，“自然”被视为发展人类文化的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尽管对环境的关注正在增加，这一二元论在今天的社会思想和生物学思想中仍然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科学家们（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大都不注意甚至敌视自然科学的洞见（本顿，1991），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倾向于强迫社会或文化思想进入自己的分析范式。

以进化经济学为例。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进行类比。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和斯宾塞用生物学的隐喻来理解社会变迁，不过方式不同，他们给出的改革方案也不同。不仅如此，就像郝哲森（1993）经常表明的，进化观念对20世纪经济思想有着重要的、稳定的影响。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凡布伦、熊比特和哈耶克都以不同的方式依赖于进化思想的洞见。如今进化经济学这块领域发展势头显得很快。这些经济学家表明，在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大自然的造化之间可以合理地进行类比。

由于阿尔钦的开创性工作，进化经济学开始集中关注企业，将之视为分析单元（阿尔钦，1950；内尔森和文特，1982）。相互竞争的公司被视为是生产一定产品的机构，采用一定的技术形式、组织系统和管理准则。在这种观点看来，公司是以一种“盲目的”、不自觉的方式来试炼出一种技术革新和管理方式的结合，希望这种结合会使得公司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最具竞争优势。这一过程被视为是随机的，没有长期计划，不保证一定获得成功。根据这一观点，经济中的“自然选

择”所采取的形式是，那些不盈利的公司将会失败，与此同时，消费者们比较产品的质量 and 价格，然后购买。反过来，“经济上的适者”就是那些将技术和管理准则结合得很成功，扩大了市场份额，获得了最高利润的公司。显然，即使撇开随机性不谈，这一过程也可被看得更加复杂、更具动态性。一个企业可以观察另外一个成功的机构，照搬它的经验。一个企业可以观察、照搬它的竞争对手的创新手段，因此侵入其他公司的“地盘”。但是这一过程也蕴藏着它自己衰落的种子。从长久来看，经济进化过程将导致经济集中和垄断。如果造成了这种情况，并且没有新的进入者进入这一过程，创新的动力将会减弱，创新将难以为继，利润将会降低。

这样的类比是令人怀疑的，即便用的都是经济学自己的术语。这些都是经济层次上的表达，并没有说明企业是如何形塑其“环境”的，比如，通过广告或政治游说的方式。不过，这种类比帮助了经济学面向时间、信息、学习诸问题，从而使这门学科更加贴近真实世界。这种类比也帮助克服了传统经济学中的均衡假设，即认为汇集了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供求曲线是主要关注焦点。如同江格尔（1993：216）所写：

把经济视为一个由进化过程形塑的系统，其优势在于，与大多数均衡模型相比，这一视角能够抓住经济生活的更多要害。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优势的取得导致了经济学语言的模糊，但是这已经逐渐为旨在模拟经济进化随机过程的计算机模型的建立和检验所

弥补。

但是经济学对“语言模糊”的避免却又再次导致它看不到经济和自然世界之间真实、关键的联系。结果进化经济学仍然停留在类比上，进化本身被剔除了。进化经济学既没看到人是进化的产物，也没看到经济和他继续“进化”所需要的“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些模型中的“环境”只是由消费者和其他竞争者构成的“环境”。最终的结果是，文化和环境这一二元论未被触动，进化经济学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几乎没带来什么启示。

其他社会科学的情况更加复杂、更不清楚。目的论、进步、方向这些概念曾是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著者们的一个潜在特点，现在却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赞同它们了。反对这些概念的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安东尼·吉登斯（1984）的著作。他强烈认为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来理解是错误的。像当今许多别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他认为，“人类历史并没有一个进化的‘外形’，试图把人类历史挤缩进一个外形将带来切实的害处”（吉登斯，1984：236）。他的观点和前面讨论过的其他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在拒绝这种进化主义的同时，当代的社会理论却又经常含蓄地甚至是明显地带有进化思想的残留。单向这一概念就有着强烈含义——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它注定会成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吉登斯自己拒斥了“后现代性”这一概念，代之以“晚期现代性”这一概念——它会在现代社会

中出现，这一概念既包含着连续性（例如社会全球化）又包含着变化性（例如“人为危险”的产生）——以及“反思现代性”这一概念，其中的人们不断地制作自己的传记。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以及“晚期”（或“高级”）现代性之前，存在“前现代”社会，这些社会基于小规模共同体，人们之间的信任建立在每天面对面的接触之上。

此处无暇来弄清楚这些著者笔下的“后”现代性、“晚期”现代性或者“高级”现代性，也无暇讨论他们历史陈述的对错。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下矛盾，即一方面他们拒斥进化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继续设定一条单线序列（诸如前现代性、现代性、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如果说社会理论家需要周期性地宣布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的到来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那也太讽刺了。问题比这个更基本。诸如此类的序列模式思想没能认识到这些不同类型的“现代性”之间存在许多基本的连续之处和相似之处。特别是，这些设想出的新社会形式所依赖的基本方式都相似——阶层关系、工资系统、过剩产品由一个统治阶层来给定和使用。这些理论也未充分认识到所有这些社会中使用自然力来生产和复制这些假想的不同形式的“现代性”的劳动过程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但如果说相似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许多差异性也是如此。例如，单线图式排除了不同社会形式（以及不同的社会—自然关系）共存以及实际向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些方向部分是全球性公司的强制权力及其形塑和指引对立斗争的能力的产物。但也是和先在的社会关系相结合的经济关系的产物，例如基于种族、性别以及当地

自然资源的经济关系。

早期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潜在的灾难性遗产就是自然——文化这一分隔的延续以及强化。近来的相对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转向是（或大概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情形——急剧的过度社会学化倾向的另一个例子。与我们的讨论特别相关的是着重强调科学的社会构造的著作。这一倾向有多种不同形式，其中最极端的一个拒绝承认：虽然所有知识都是社会构造物，但这种构造物能够指涉外部实在。也许和我们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讨论相关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哈拉微（1992）对讲述“私人故事”的方式的分析。不像那些特别“强硬”的社会构造主义者，看起来她确实认识到存在一个外部的自然世界。尽管如此，她的观点的分量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所称的“种族、性别、科学的三重过滤”（哈拉微，1992）。她认为，“生物学和灵长类动物学”

本质上是政治话语，其主要知识对象例如有机体和生态系统，是文化中全部历史和政治的肖像（缩影），这些肖像被构造出来为谋划和操纵服务。

（哈拉微，1992：10）

因此，尽管哈拉微并不是那些认为一切知识都只是社会构造物的相对主义者中的一员，她对权力关系造就知识的方式的过分强调还是表明，她倾向于掩盖社会构造物有可能揭示（实际上确实揭示了！）某种实在这一事实。危险本质上在于混淆了构

社会达尔文主义

造 (construction) 和解释 (construal) 这两个概念。人们可以, 事实上也已经如此, 随心所欲地解释自然。就像哈拉微和其他人所指出的, 人们可以把黑人和女人等同于自然, 等同于猿猴。但是, 有必要将这些解释和事物实际如何构造区分开来。

但是这些错误决不只是社会科学的特征。比如, 社会—自然这一二元论也为许多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持有。另一方面, 卡瓦里-斯佛扎和费尔德曼 (1981)、卢姆斯登和韦尔森 (1981) 以及其他许多写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著作者都试图发现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互动 (要了解这一点可参见卢姆斯登和韦尔森, 1981)。一方面, 基因和遗传变异抑制或促进观念的产生和吸收。特别地, 卢姆斯登和韦尔森认为, 他们所谓的心灵的“移植”和个体的成功生殖紧密联系。他们认为, 遗传健康是知识和推理的产物。例如, 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土地所有制或一种亲戚间的交换系统, 在有利于个体的生殖成功方面会比另一种社会关系、另一种土地所有制、另一种亲戚间的交换系统更好。并且, “通过生命史上空前的神经结构进化和行为进化的加速过程” (卢姆斯登和韦尔森, 1981: 7), 文化已经有了长期的进化结果。但不幸的是, 这些著者却很少给出线索, 说明和这类行为变化以及人类进化形式相关联的确切机制。他们应当在讨论中把社会关系或者生产模式包括进来。

尽管有以上这些著作, 社会—自然二元论这一思维方式在生物学思考中仍占据统治地位。例如, 这在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中尤为明显, 这本书初版于 1976 年。它最广为人

第三章 自然—文化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知的观点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不是发生在个体或物种的水平上，而是发生在更为基本的基因水平上。这一广为流传的熟悉图景就是，有机体是其基因的“生存机器”。作者认为，通过时间复制错误并竞争，这些机器的设计将会得到提高。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基因或者说复制者已经渐渐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技术和技巧”来确保它们在生存竞争中得以延续。因此，一个有机体，比如人，只是一个媒介，其主要工作是复制基因，确保它们进入下一代。基因是被复制的单元，在这一过程中，小的、随机的错误会发生。这些“错误”影响成功，或者说，影响了基因的媒介应对环境。

围绕《自私的基因》的许多争论实际上关注的是书中的基因还原论。道金斯的论述带有强烈的古德（1977）所称的“假想故事”的成分，人类的进化遗传被用来解释我们行为的几乎所有方面。更近些的“进化心理学”著作也是如此。这块领域成长得很迅速，显然也很受欢迎（库里等，1996）。平克（1997）是这一思想领域最著名的阐释者。他认为心灵是

一台神经计算机，由自然选择赋予了对动植物、物体、人进行因果和概率推理的组合运算能力。这一计算机受目标状态的驱动，例如食物、性、安全、亲子关系、友情、地位、知识，这些目标状态服务于祖辈环境中生物体健康的需要。

（平克，1997：524）

平克将基因思想扩展到心理学中，这使得几乎所有行为（包括自私、无私、性别歧视、杀人甚至我们对大草原的喜欢）都被归结为我们的种类发生学、我们的进化遗传和我们通过基因遗传所得的“硬件”。平克试图通过“逆向工程”概念来避免受到“假想故事”这一批评。“逆向工程”要求识别目标，详细制订最契合这一目标的方案。方案究竟契合得多好呢？例如，人类心灵在遭遇由祖辈环境和现代环境共同设置的挑战时究竟应付得如何呢？但即使这样来修改基因还原论，仍然成问题。不仅极难识别和充分细化人类在大草原上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这一理论严重低估了人类适应生态系统和其他物种的变化、与之共同进化的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在后文中讨论。

不过，更成问题的是将自私基因这类分析带入到文化领域中。道金斯（1976：206）写道：我认为一个新的复制者最近出现在了地球上。它还处在萌芽期，还粗糙地漂浮在原始液体中，但它进化的速度已经使得老基因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喘气。

道金斯称这种新型复制者为“meme”。它更多地意谓一个文化单元而不是遗传复制单元，但遵从和基因同样的规则，“健康”meme像“健康”基因一样，是最利于复制的单元。道金斯所举的关于meme的例子是“曲调、用语、衣服款式、制作陶罐或拱形的方法”（道金斯，1996：206）。道金斯认为，Meme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复制者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复制的忠实性：复制得越忠实，在经过几

第三章 自然—文化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轮复制后就越能保持最初的样式。例如，一幅画如果是从一张影印品再影印而得的，那么原先的样式很快就变得不可辨认了。第二个特点是多产：复制的速度越快，复制者就扩散得越多。一台工业印刷机就比一台办公室的复印机能复印得更多。第三个特点是长寿：一个复制样式能存在的时间越长，它能复制出的复制品就越多。例如，一幅画在沙子上的图画很可能在得到复制之前比如复制成一幅照片之前就被擦掉了（海力根，1996）。

道金斯的著作和心理学家丹尼尔·德内特的著作有着密切联系。德内特认为，心灵或者头脑应当被视为 meme 的接收者、传递者、复制者。他认为，Meme

现在以光速在世界上传播，其复制速度甚至使果蝇和酵母细胞相形见绌。它们杂乱地从一种媒介跳到另一种媒介，几乎不受检疫。

（德内特，1990：131）

因此，道金斯和德内特给出了一幅与生物进化相类似的文化进化图景。如同道金斯（1989：192）所写：

正如基因经由精子或卵子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通过这种途径在基因液中繁殖自身，meme 通过从脑跳到脑，经由一个广义上可以被称为“模仿”的过程，在 meme 液中繁殖自身。伦西曼（1998）近

来采取了类似的观点。像道金斯一样，他提出“自然选择范式”，认为自然选择机制和观念选择有很大的相似性。他认为，“‘恐达尔文者’如果想要为他们的怀疑主义辩护，他们就必须证明不可类比之处所具有的差异足以破坏自然选择范式”。

伦西曼 (1998: 177)

但问题不在于“自然选择范式”，而在于现今所采取的这个范式的“还原论”形式，这一形式归根结底是非达尔文主义的。由于道金斯及其继承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工作，我们发现，问题被另一个关于生物和文化的类比弄得更加混乱了，这一类比进一步加剧了长期困扰西方思想的二元论。在这种观点来看文化进化不过是对 meme 的“带有错误”的复制。因此，新达尔文主义者犯了双重错误，不仅赋予生物学以一种还原主义的形式，也对理解人类文化赋予了同样错误的模式。

尽管如此，所谓的“meme 学”在今天是一个长势迅速的领地。它拥有一个兴盛的学会，有自己的《meme 学杂志》，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全球网页 (<http://www.cpm.mmu.ac.uk/jom-emit/>)。它还是一本畅销书的主题 (林奇, 1996)，在大众媒体中覆盖面很广 (表 5)。

表 5:

心灵病毒：零散的观念如何存活

看起来非常荒谬：39 个人穿上了新鞋，装好了飞行包，毒死了自己，带着神圣的信仰：一个过路的 UFO 会将他们携往极乐世界。我们这些人不会这样，对吗？但实际上，无论我们相信耶稣是为我们赎罪而死还是认为联邦政府制造了艾滋病毒，我们大多数人的信仰都缺乏坚实的依据。事实上，我们最坚信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理性地加以证明的东西。正如一位分析者所说，“存活下来的信仰并不一定是真的，存活下来的规则并不一定是公平的，存活下来的仪式并不一定是必需的。存活下来的事物是因为它们适于生存。”

一门新科学——meme 学更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说法。根据这一模型，观念很像是病毒。只要它们能有效地从一个主人跳到另一个主人，它们就能存活下去，而当这个传递链断了的时候，它们就死了。在适当的条件下，甚至一个非常有害的观念也可以像流感一样席卷一群人。流行病学家有时可以仅仅通过分析病毒结构来预测一种疾病爆发的范围和过程。Meme 学还达不到这样的精确度，但这是它的使命：解释信仰如何传播扩大，预测其衰落和流动。

（摘自《纽约周刊》，1997 年 4 月 14 日：14）

这本书对非常复杂的过程给出了简单的解释。Meme 学也

社会达尔文主义

许能描述观念的某些传播方式，但显然，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接受某些观念而不是另一些。并且，meme 学并没有去解释观念得以确立的机制。对这些复杂问题的理解需要从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心理学、社会理论、政治学借鉴洞察力。布兰科摩(1999)是 meme 学最新近的阐释者之一，她问到，为什么可口可乐广告的曲调盘旋在她脑海中，“跑不掉”。她推理说，存在一个简单的 meme，善于复制自己，而不管这一复制对她有没有用处。这也许构成解释的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是一个跨国公司，竭尽所能确保那个曲调“跑不掉”。这才是可口可乐一天能够卖掉 10 亿瓶饮料的诀窍。

同时，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的类比再次带来了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大概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meme”到底指的是什么单元。将“曲调、观念、用语、衣服样式”等等一起混在复制“meme”这一宽泛的范畴之下，使得这种类比很难发生作用。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meme 和基因是否结合、如何结合。它们被选择用于有性生殖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来解释不结婚的牧师、殉教者、神风队飞行员？最后，道金斯简单地认为，人类毕竟有用文化来克服自私基因的“暴政”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这一理论开始崩塌了。文化毕竟能够战胜自然。二元论仍然牢固存在。

最后，基因和 meme 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例如，道金斯发展出的这一理论所基于的假设是，获得特征不可遗传。并且，我们是从我们的父母而不是别人那里获得基因的。Meme 和基因之间的差异至少和相似之处一样多。于是，这一类比开始迅

速崩塌。

许多这类问题都始于以下二元论：基因和 meme 一开始就严格地分离了。早在道金斯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在进化思想中了，例如卡瓦里——斯佛扎、费尔德曼（1981）和波义得、里切森（1985）。建立一个基于 meme 和基因之间互动的理论乍看起来似乎是克服这个二元论的好办法。如果单元能够感知的话，这有可能是个好办法。但单元不能感知，特别是“meme”。这是因为 meme 学家把各种观念混合到 meme 范畴中，而不问它们是如何被它们“发展”于其中的社会所形塑、复制、确立的。类似地，德内特试图通过把人类心灵看作是 meme 复制者而将 meme 和基因联系起来，这看起来似乎是克服这个二元论的一个成功办法，但是 meme 范畴仍然非常可疑。

但是，更重要的是，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是在不同的层次上，由不同的因果机制构成（柯里亚，1994；狄肯斯，1996）。人类社会当然属于生物过程和进化过程，但不能简化为这些过程或者说不能通过这些过程得到恰当的理解。而且，观念的复制（包括可口可乐是一种好饮料这一观念）非常明显地属于社会、经济关系及过程这一范围。文化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人积极地思考这些过程，并越来越好地理解了它们。因此，进化和基因之间的类比在这个问题上深刻地、误导性地没有什么用场。此外，即便是在生物学中基因是否应该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也决不是清楚无疑的。有更好的前进办法。

因此，生物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一样，在自说自话。但这个问题决不都是由自然科学造成的。社会科学家们在很大程度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上完全忽视了生物学。他们忽视生物学的一个理由是，相对来说如今生物进化对文化进化已经意义不大了。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经发展出适应几乎一切环境的能力的时候（特别是沟通能力），生物进化可以被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了。

例如，这就是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看法，相当讽刺的是，他对生物学理论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为敏感（埃利亚斯，1994；门奈尔，1989）。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他把社会变迁视为是由一些小的、相互依赖的、为权力而竞争的单元的发展所构成。“有些胜利了，有些失败了”（埃利亚斯，1994：347）。然而，竞争却日益“优雅化或精致化”了。例如，在欧洲宫廷时代，专制是通过一个文明化的进程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上等阶层稳步地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避免对外展示身体的功能，来藐视下等阶层并统治他们。

埃利亚斯认为，“标准”就在施加社会控制的日渐复杂的方式中。文化进化被认为是取代了生物学，虽然和生物进化不同的是，文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倒退发展”。在《文明化的进程》中，埃利亚斯的分析带有强烈的方向意味，认为这是一个所有社会在适当时候都要遵从的过程。埃利亚斯认为（埃利亚斯，1994：445），“文明化的进程是人类行为和感情在一个相当明确的方向上的改变”。但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他坚持认为西欧宫廷社会的出现只是文明化进程的形式之一（门奈尔，1989）。大概是他想拒绝任何认为某种特定的文化进化是惟一可能的进化形式的观点。

生物学是如何进入埃利亚斯的分析的呢？埃利亚斯认为，

第三章 自然—文化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人类是一个高度可塑的物种。人类有能力适应许多不同的条件。他们有学习、沟通、改变社会关系以及驯化自己的潜能。而且，他们有能力抵制一时的满足感。例如，他们发现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而不是立刻就去吃。例如，抵制这种即刻的冲动意味着他们能够进行长远思考，发明技术大规模地生产食物，并储存它们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简而言之，他们已经发展出抽象思考的能力，这使得他们高出了其他动物，它们不会长远考虑，记不住过去，不会计划。

埃利亚斯的观点中有许多东西增进了我们对文化变迁和生物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克服我们前面提出的二元论。另一方面，他的方法中也存在一些危险和困难。首先，存在完全避开生物学的危险——例如，埃利亚斯暗示，既然假定人类具有文化可塑性，生物进化实际上就无足轻重了。其次，人类的可塑性，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诸如此类的东西需要得到解释，需要被问题化。第三，完全不清楚为什么这种文明化的进程会发生。在埃利亚斯那里目的论有些明显：提出了“文明化”这一设想，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过程要发生。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当然决不只是埃利亚斯才有的问题，如果从个体发生学而不是种类发生学来看待，就可以得到解决。

前进之路：个体发生学和自我认同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转向另一种集中关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生物学，那么很多困难都可以被解决掉。从这一视角看

来，有机体由（基因遗传来的）生长力和发展力构成。有机体积极地参与构建自己的环境（特别参见莱文汀，1982；罗斯等，1984；狄肯斯，1992；古德文，1994），而不只是盲目地应对环境。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视角比后来的“新达尔文主义”更符合达尔文本人的思想。

然而，重要的是这一视角并不导致自然同文化的分离。人类事实上是自然的一种，不过——这是本章的关键——人类从幼年开始发展起，就是一种创造文化的自然物。在他们幼年发展过程的后期，他们开始在环境背景中形成自我认同。因此，将文化和自然连接起来的关键路径是个体发生学，即人类从胚胎到刚刚成年的那段发展过程。这一自我认同是通过人和其社会环境、物质环境的磨合而形成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影响全人类的基因编码生长过程和经历确立生长过程（伍兹和格兰特，1995；罗斯，1997）。在个体生命的早期阶段，受精卵变形为两个挨着的空细胞球，这就是神经沟。18天内会长出一种增稠剂，两个细胞球就在这里会合，然后长成前脑、中脑、后脑。从这个阶段开始，中枢神经就开始迅速生长。细胞开始分裂，长成非常接近于成年期的生理结构。经过9个月的孕期，生命的本质已经形成，虽然进一步的发展还在出生之后。6个月的时候脑重量已经是成年期的一半了，一年之后达到60%，6年之后达到90%，10年之后达到95%。

如果说这就是影响全人类的潜在的基因编码生长过程，同样需要了解的是，脑生理结构（它的生物化学、细胞结构、电

第三章 自然—文化二元论以及对它的超越

流电路)随着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会发生改变。罗斯(1992)认为,一种自然选择过程发生在人生命早期阶段所生成的神经键联结有着大量剩余之处,多余的神经键就被经验舍弃了。概念和回忆就通过神经系统中的这种复杂变化而编码在脑中,人在和环境互动时也发生类似情形。这种解释方法开始严重瓦解那些把基因置于理解人身和环境关系的基础的解释方法。成长不仅仅是由基因编码的。大的倾向是由基因刻画的但并非由基因决定。这是由于,人成长过程中应对外部环境并实际上改变了外部环境时,以基因为基础的基本过程如何形成,社会和物质环境对此有着关键的影响。

这把我们带到了讨论的第二个要素,也是中心要素。人在工作、实践或者和外部世界的磨合中成长。脑和意识的生长也通过这些活动。如皮亚杰和其他人所指出的,生长中的儿童最早的反应之一就是吮吸。就像伍兹和格兰特(1995:300)所说,“对新生儿来说,世界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吮吸的东西”。婴儿在早期试图把世界“吮吸”到自己这里,引到自己嘴里。但随着进一步成长,婴儿开始“适应”现实,适应外部环境,慢慢地区分、观察、记忆。智力就通过和外部世界的磨合、通过实践而成长起来。类似地,一个约18个月大的孩子就知道使用手段来获取目的了,例如,用棍子来取得一件东西。逻辑要素、因果关系开始确立,但这一确立过程也是通过人和外部世界的实践互动。

后文将会更详细地讨论,在生命早期可以观察到婴儿发展其潜能来构造和理解抽象观念。也可以观察到语言的发展。语

社会达尔文主义

言是人类很发达的抽象过程之一。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在和他人的互动中，过去的行动可被重构；未来的行动及其结果可被预期。正是语言使得人得以为人。语言使得人可以超越当下的限制，使得人可以学习过去，筹划将来。当然，语言还是文化和传统得以存在、传承、交流的工具。因此，语言是人形成社会和形成自身的工具。它是人抽象思考这一显著能力的出现的一部分，虽然这一能力是由基因激活的。这种看待语言和文化的方式显然比那个贫瘠的“meme”概念要丰富的多。

这把我们带到了消除文化——自然分割的个体发生学方法的第三个要素。抽象思考的能力——和人类活动相连的抽象思考——不仅赋予了成长中的人理解遥远事件、已经发生的事件或还在发生的事件的能力，也使得成长中的活跃儿童能够看到自己和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自己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发展自我认同的能力也是含在基因中的。人类似乎有特别强的自我感。这种自我认同感在儿童的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成为人心理结构的一个主要部分。近来对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揭示了人脑中产生这些自我感的区域（高达德，1998；弗斯和哈帕，1999）。某些自我意识因素似乎是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的一个特征。但这一潜能由于人类创造、形成、交流抽象思想的能力而得到了远为充分的表现。因此，人的发生学成长过程是人发展自我意识能力的关键。自我意识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中心环节。这是理解“文化”和“生物”如何能被连接起来的关键路径。这一点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 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城市居民对孩子抚养得太精细了，太像他自己的夸张版本了，敏感、痛苦地早熟、神经质、消化不良、苍白、在成年期身材不够大，如果还能够成年的话……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融入，这种城市类型在第三代第四代就会越来越夸张……可能性很大，即第四代纯种伦敦人将没有能力生存。

（弗里曼-威廉姆斯医生，写于 1890 年，引自斯提德曼·琼斯，1971）

弗里曼-威廉姆斯医生是 19 世纪末伦敦相信本城居民正经历着遗传衰退的许多职业医生之一。位于大英帝国心脏的大量人口将会迅速地衰落。这部分是由于本城的劳动者在和乡下来

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天生健康强壮的移民的竞争中能够获胜而造成的（适者生存的法则在乡下还是适用的）。这也是下等阶层自我复制的结果，上一代人的机能缺陷传给了下一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这些机能失调包括：“不知何为得体，何为闲适，几乎不知何为完整的家庭生活，也无法触及宗教”（引自马克尼可，1987：297）。

这一思考产生了“都市衰退”理论，这一理论整个儿强调，人们自身的和遗传而得的特征不能胜任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的的心理和生理遗传。这一理论给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不仅是他们的城市在衰落，而且迅速繁衍的下等阶层的特性只会导致白种人的不断衰落。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今天还存在吗？这个词意味着很多东西，不过它特别广为人知的含义是，人的成功依赖于其天生特性。更明确地说，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暗示着一种社会理论，认为社会的下等阶层由基因低下的人构成，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衰落下去。并且，在这一观点看来，这种状况无可改变，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社会工程师还没有找到控制基因特性的办法，因此也就无法改变下等阶层的命运。

在很多观察家和评论员看来，弗里曼-威廉姆斯医生的观点一个世纪后在《钟形曲线》（赫恩斯塔因和穆瑞，1994）一书中得到了回应。这本书卖了数十万本，是总统记者招待会的主题，是许多新闻和热点杂志的封面故事。无论其影响如何，它都引发了广泛的有时甚至是尖刻的争论。本章将回顾一下这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的一些观点，并概括对它提出的主要批评反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对意见。另一方面，参加这些争论的一些参与者意见完全相左。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极为强调基因遗传决定智力这一观念。与此对照，他们的批评者几乎完全否定这种基因遗传的可能性。一种前进的路径是，承认基因对人类智力和进步的重要性，但不赋予基因本身以很大的重要性。社会环境如何，人们如何积极应对环境，这些也必须成为任何合理解释的关键部分。我们将会看到，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最新研究开始支持上述观点。而且，有一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精细、更复杂的理解。

《钟形曲线》一书的重点常常遭到误解或者误传。特别是，它曾被认为其主要观点是黑人的 IQ 较低。它的中心论题是关于现代美国的阶层结构变迁。这一阶层结构基于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所称的“认知能力”，那些拥有这种能力的“认知精英”才容易得到高报酬的精英类工作。

20 世纪渐渐成为一个由金钱、权力、地位来划分社会阶层的世纪。古代用世袭头衔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办法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复杂的、相互交叠的办法。社会身份固然还很重要（不过已经不再伴随着剑或头冠），但赤裸裸的财富、教育证书、才干也一样重要（才干的重要性日趋明显）。我们认为 20 世纪持续进行了这一转变，因此 21 世纪将开启一个认知能力成为决定性分化力量的世界。这一转变比前一个转变更奥妙、更重要。社会阶层是社会生活的

火车头，但现在是智力在拉动它。

(赫恩斯塔因和穆瑞，1994：25)

因此，其核心观点是，美国是一个能人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成功、拥有高薪工作的决定因素是智力，于是渐渐地，人们所得到的就是他们天生适合做的工作。任何阶层的知识人都被选择出来（知识人之间进行婚配就是自我选择），成为认知精英——例如进入管理或教育的高层。但同时，与认知精英的出现相应的是，据说下等阶层不断扩增。下等阶层由IQ水平低、繁衍迅速的人们构成。诸如开动脑筋、肯定行动之类的社会项目或福利项目不是被视为无用就被视为是起反作用。现在的干预形式不像能产生什么效果。既然没什么能改变认知精英和认知能力弱的下等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那么惟一可行的就是“让人们在社会中各得其所”。

赫恩斯塔因和穆瑞认为，IQ是人们在使用诸如“智力”或“聪明”之类的词时所意谓的东西。但是如何测量IQ呢？显然，这是他们论点的核心部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有许多不同的因子分析可用来分析IQ。这仍然是一块很有争议的领域（胡恩特，1997）。赫恩斯塔因和穆瑞认为可以用标准智力测试来准确分析IQ。这两位作者认为自己是“古典主义者”，继承的是斯皮尔曼的工作。古典主义者的观点是，可以用一个单个的、总体性的智力测试即“g”来测量智力。“g”被定义为一个人进行复杂精神工作的能力，是“理解人的重要社会差异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赫恩斯塔因和穆瑞，1994：

14)。斯皮尔曼的测量被称为“结构的”，因为这一测量遗传性地嵌入了被测试的人。其他测量方法也在考虑之列，但最终都被舍弃了。这些被舍弃的方法中就有“修正主义者”的测量方法。这一思想学派最著名的一个成员就是斯特恩博格（1985）。他强调的是过程。要发现的不是智力的组成因素而是人们在运用智力时是如何表现的。斯特恩博格以及这一思想阵营中的其他人质问一个总体性的测试到底能揭示多少东西。例如，一个人可能对空间图像有很好的视觉能力，但却不会遣词造句。另一个人可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却没什么空间视觉能力。这引向了被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拒绝了的第三种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所称的“激进派”所提出的。这一学派以郝华德·加得纳为首，拒绝任何总体性的“g”观念。认为存在多种不同形式的智力，包括语言智力、音乐智力、数学智力、空间智力以及两种基于建构人际关系能力的“人格智力”。

赫恩斯塔因和穆瑞坚持古典定义，认为（无视一切争议）大多数研究工作者都会认同古典理论得出的六个结论。第一，确实存在认知能力这种东西，人和人在这一点上有差异。第二，所有关于学术能力或者成就的标准化测试都或多或少在测量“g”因子，而IQ测试对此测量得最准确。第三，IQ分数和大众说法相一致。IQ分数确实是对人们在用“智力”或“聪明”这样的词时所表达的意思的一种度量。第四，IQ分数在人的一生中保持得相当稳定（虽然赫恩斯塔因和穆瑞也承认并不完全稳定）。第五，如果正确操作，IQ测试不会因阶层、民族或种族的差异而显得不公。最后，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

可以遗传。根据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的说法，这一遗传程度不小于40%，不大于80%。总之，赫恩斯塔因和穆瑞认为，总体性的IQ测试可能存在问题，但它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尽管粗糙却有效的测试方法，能研究重要社会趋势，比如一个基于认知能力的新阶层结构的成长。

利用始于1979年、针对年青人进行的国家跟踪调查的资料，赫恩斯塔因和穆瑞向人们展示说，IQ测试所测出的认知能力可靠地预测了（但有时相关水平很低）人们在职业、学术和财富上的成功。前面已经提到过，《钟形曲线》最广为人知的（也许这有些不公平）大概就是不同的种族和民族IQ水平不等这一论断。这本书认为非洲—美洲人的IQ比高加索人大约低15，而后者又低于东亚人（大约低5）。和本章开篇时19世纪城市衰落论者一样，它还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是由于人们通常和IQ相近的人结婚。穷人将他们的低IQ传给了后代，因此也就把贫穷传给了后代。他们的高生育率正导致总人口在IQ方面的基因潜能有衰退的危险。而且，低IQ的单身母亲较少能够给孩子提供帮助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顺便说一句，《钟形曲线》在从民族差异中考虑性别差异时，就显得不那么富于冒险精神了。只是概括地认为男性和女性平均IQ水平接近相同，但男性在钟形曲线的两端分布较多。因此，对男性来说钟形较为平坦，即男性中有更多的聪明人和更多的笨人，但平均值几乎和女性一样。

高生育率和福利投入的结合意味着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必然面临自我膨胀、认知不足、易于犯罪的下等阶层出现的可能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性，这会对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持续进步带来无休止的问题。性革命、政府对家庭支持的下滑，以及“要一个认知能力弱的人理解婚姻为什么好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赫恩斯塔因和穆瑞，1994：544）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下等阶层的持续膨胀。赫恩斯塔因和穆瑞认为，这个过程具有空间涵义。最能干的黑人的迁出“已经导致城内没有了先前的领导者和模范”（赫恩斯塔因和穆瑞，1994：522）。建议仍然是，要认识到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人们必须找到自己天生就适合的位置，鼓励自己产生满足感，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在这些位置上可能没有好报酬。这又回到了穆瑞（1988）早期的观点，幸福和自尊要成为真正的幸福和自尊，就必须是自生的。

对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的反对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很强，但在提供理解上却很弱。这是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相关性却不去探求潜藏在这些相关性之下的机制和过程。因此，低 IQ 的人只能得到薪水微薄的工作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这一事实最终就用他们的 IQ 水平来解释。这意味着其他因素，比如工作场所各种各样的歧视政策，不被引到分析中来。索维尔（1995：77）就持此观点：

从知识的立场来看，《钟形曲线》最麻烦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其作者未加批判地使用了统计相关性。统计学导论所教的第一条就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另一个反对意见认为，赫恩斯塔因和穆瑞强烈地暗示基因是不变的、注定了的。而其他过程和关系对

人们的工作和社会地位的配置可能也很重要。如果确实能够证明某些人是“天然”留在了社会的底部，社会福利好像没有什么用处，那么就可以认为美国社会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提高 IQ 低的人和黑人的生活条件。这种分析使美国社会对困难不需负责，暗示着其他社会也可以如此。

第三种意见认为这本书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虽然这本书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民族和种族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这部分显然已经招致了最多的抨击。有许多反对意见对之进行谴责。谴责它只选取有利于其政治观点的证据（罗森和莱因 1995），而任意曲解反面证据（尼斯伯特，1995；拉摩斯，1995），谴责它臆造可敬的研究结果，明知这些结果将获宠于当前的经济政治气候（林德，1995），谴责它一再发掘老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德，1995），对假想的低等种族给出纳粹式的解决方案（朱狄斯，1995）。

最后一个观点虽然出奇地少见，但却关乎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的中心论题（沃尔法，1995）。

在何种意义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珍视知识？这些著者对“认知精英”的兴起的理解有多充分？当这些发展是社会斗争的焦点时，赫恩斯塔因和穆瑞就把这些发展视为上帝的行事。精英们正是通过创造出一个与基于实际日常生活的理解相分离的知识领域来保持住自己的地位的。精英们长期以来正是通过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这一方式使自己成为精英的。而且，《钟形曲线》的作者似乎不了解美国以及其他地方（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关系。“认知精英”丰裕舒适的生活关键依赖于低收入、低教育水平阶层的劳作。

显然，此处有一些极有争议的问题，需要仔细剖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钟形曲线》被当成政治足球的方式。一方面，它显然被踢起来了，可能是受到了强大的保守力量的支持。对《钟形曲线》的批评指出，它得到了布拉得利基金会的资助，这是个政治上保守的组织，有2.4亿美元的资产。这一基金会对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的研究的支持是建立一个极右的智囊团和媒体出口这一更大图谋的一部分。有观点认为，其目标是为了建立“另一种学术环境”。但同时，对《钟形曲线》的反驳在很大程度上受左翼自由派学者和媒体资源的引领。他们倾向于把不平等和社会差别归结于社会而不是归结于通过遗传而得的能力。因此，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即拒绝承认基因对社会分层和社会变迁有任何影响。“和我们的基因无关”，这是一篇攻击智力的生物学解释的文章的标题（罗斯等，1984）。

所有这些倾向都存在危险，政治左派也是如此。为什么基于生物学的解释是右派的专权而左派使自己退入了死角——认为生物学毫无影响？也许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难道我们是在认为科学只是由围绕着政治转的社会科学家们（还有一些科学家）针锋相对的观点所构成？汉克是少数能够更全面地评论《钟形曲线》的人之一，他认识到这本书有许多错误。但也许

社会达尔文主义

它的主要贡献是动摇了不同科学在理解上的自信。

理查德·赫恩斯塔因和查尔斯·穆瑞写了一本值得尊敬和反思的书。一个严肃研究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引发读者的争论，而在于敦促他们去反思自己的假设。

(汉克, 1995: 97)

智力：“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现在，这场争论已经开始跨越意见相左的不同人和不同学科之间过于简单的较劲阶段。对这些复杂问题的一个可论证的、更为冷静的观点来自美国心理学会（APA）科学事务委员会对这场智力争论所作的评论——内瑟尔等（1996）。这一智力争论领域正在迅速成长，但是，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而且，几乎不可能将政治和意识形态排除在外。

APA 的报告至少认识到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智力。例如，有些人在测验语言能力时表现出色，另一些人则在测试空间能力时表现出色（例如，他们能毫无困难地画出所面对的图形的相反图形）。尽管如此，在不同类型的智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正如作者所说，“用来测试不同能力的子测试倾向于正相关：在一项子测试上得分高的人在其他子测试上有希望高于平均水平”（内瑟尔等，1996: 78）。这也是斯皮尔曼（1927）的发现，他首当其冲要对“g”负责，他用它来测试人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从事复杂精神工作的总体性能力。如何准确地定义“g”仍然是件困难的事，不过它似乎是评估总体性智力能力的第一个合理办法。

不过，同样显然的是，在许多方面这个报告所给出的图景远没有《钟形曲线》一书所描绘的图景清晰。首先，APA 报告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测试成绩的稳定与否。报告认为，智力测试成绩在人成长过程中相当稳定。但是这个报告也承认很难测量年幼儿童的智力。儿童心理学（比如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认为，人在生命的早年能力迅速增长，特别是语言技术和推理能力。但这很难用 IQ 测试来评估。而且，传统的智力测验对婴儿后来的测试成绩预测得很不准，即便这些测验很好地提前指示了儿童的注意力范围和记忆力。智力测试成绩在人的早年“相当稳定”，不过，这是说在同龄人之间测试成绩相当一致。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变化，成绩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内瑟尔等人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12 岁到 17 岁之间 IQ 平均变化 7.1，有些人的 IQ 变化则高达 18。

其次，报告检验了 IQ 和获得好教育、好工作之间的关系。IQ 水平最高的人在学校的成绩最好，这意味着儿童越善于接受教育，就越有可能得到教师的鼓励。大概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报告发现一个人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不只和 IQ 相关，而且也和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相关（虽然在这两项之间有高度重叠）。可能更让人惊讶的是，尽管从事后看来要好一点，报告认为 IQ 成绩可能并不绝对保证职业成功。我们已经知道，对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的一个批评就是，他们很少提供证据证明

社会达尔文主义

“认知精英”从所有阶层中被挑选出来获得最好的工作。雇主并不只看高 IQ 水平。人际技巧以及人格的某些方面可能同样重要。APA 认为，这种素质也能补充预测人的成功。而且，工作本身也并不只是一些空位，用来放已经打造好了的人。正如 APA 报告指出的，一项工作可以帮助人实现其到目前为止尚未实现的才能。内瑟尔等人引用的一项研究（考恩和斯库勒，1973）认为，工作要求人具有高度适应性，这实际上就锻炼了人，使之产生更大的“智力可塑性”。

这把我们带到了重要的环境问题上——物质环境、生物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例如，生物环境和生理发展之间有密切关系。营养失调、被有毒物质侵染、胎儿期以及产期前后所受的压力，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测得的智力水平低下。但是可以预见，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会对个体的能力和 IQ 水平产生较大影响。智力不能只归结于基因。内瑟尔等人（1996：86-7）给出了一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利比里亚的稻农擅长估计稻米的质量；博茨瓦纳的儿童习惯于讲故事，对故事有很好的记忆力。这些群体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上远高于美国人。另一方面，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群体在心理测试方面则优于传统社会的人，即便是那些设计得“文化公平”的测试。

总之，不能将 IQ 水平简单地归结于基因。这一点对黑人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和白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智力差别的争论很重要。内瑟尔等人认识到，黑人和白人的 IQ 水平不同。但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智力差别是由基因造成的。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所谓的“种族”多样性。可观察的生理特征比如肤色，显示基因的同质性并不存在（参见表 6 的讨论）。最后，这一报告赞成将“环境”原因（特别是低报酬工作、营养不良、受教育差，等等）与非洲—美洲社会和居于主宰地位的白人社会之间在文化优势和文化实践上持续存在的差异结合起来。

至于性别差异，内瑟尔等人认为大多数 IQ 测试都设计得男性和女性不会有总体差别。另一方面，近来的研究确实显示出有重要差别。例如，男性似乎更擅长空间视觉，而女性则更加口齿流利。不过，不像所谓的“种族”差别，这一差别似乎既涉及生物学过程也涉及社会过程。一方面年青女孩在早年就被社会化，举止行为都要遵从一些定式。另一方面，据认为，男女性之间在神经系统结构上确实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荷尔蒙的影响。

表 6：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

“种族”为何？达尔文本人相信所有的人种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都属于同一物种。但他也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认为“低等”种族智力较低，（因为他们的脑袋比白人

小)不太聪明。他认为,这是导致这些种族在和白人殖民者竞争时最终濒于灭绝的因素(布勒,1990)。

现代的“种族”观否定了上述观点。人们指出以下事实:“种族”内的基因差异和地域性人群内的基因差异一样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例如,“亚裔美国人”除了来自中国和日本,也可能来自韩国、老挝、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现在很少有人认为种族是一个生物学范畴或者一个有用的理论范畴了。实际上,它更常被视为一种话语,强权群体用它来对“他者”进行分类,剥削“他者”,并把自身定义为统治者(例如,参见邦得和基里亚姆,1994)。

近来的观点回到了达尔文的坚持认为存在共同祖先这一原初想法。种族一开始可能是生物学实体,但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追溯种族在时间中分裂成独立的繁殖种群时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安朱尔森(1998)用“分化枝”这一概念来描述同源的亚种。然而,诸如此类的“分化枝”分类法和大众的“种族”概念还相去甚远。大众的“亚洲”范畴可不是一个分化枝种族。

特别地,当我们开始考虑社会环境时,可能涉及到复杂的相互关系。例如,IQ高的儿童可能更会被吸引到中学教育或者更高层次的教育中来。某种工作类型会吸引具有某种技能的人。(例如,教师这种工作可能会吸引语言技巧高的人,特别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是女性)。学校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比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例如，APA 报告认为，政府试图提高智力水平的干预措施可能比人们有时所认为的要更有效。“开动脑筋”计划确实好像提高了 IQ 水平，至少在施教过程中是这样。和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相一致的是，这种提高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下滑，在教育结束时 IQ 水平几乎没什么变化。另一方面，追踪研究显示，接受了这一计划的儿童后来进入专门教育的可能性较小，终止中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西尔瓦，1997）。因此，很难说该不该以高 IQ 儿童总是赢家、低 IQ 儿童总是输家为理由撤掉这样的计划。

内瑟尔等人的概要中还有两个特征。这些特征极为重要，应当成为任何一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心部分。其中一个所谓的“福林效应”。这指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智力测验成绩稳步提高，这有文献记录可以作证。平均每十年 IQ 上升值大约为 3。荷兰的研究指出，这一增长速度可能还在提高。为什么会发生福林效应？这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原因至今还不清楚。

第一种可能性是，定义问题依然存在。福林本人认为 IQ 测验是可疑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抽象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不过，我们要记住 IQ 水平可用来简单衡量一系列不同的能力）。第二种可能性是，测验成绩的提升是由于营养更好了。因此，我们通过更好的饮食除了提高了生理特性（比如身高）以外，也还提高了我们的心智能力。第三种可能性是，人类成长的处境变了。和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在社会世界里进行着

社会达尔文主义

更多样化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内瑟尔等人（1996：90）所说：“这些生活复杂性的变化可能导致了在心智复杂性上的相应变化，因此在某些心理测试能力上也就产生了变化。”

后两个解释强调的依然是基因组（由基因构成的个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在和生物、社会环境磨合，并控制利用它。同时，这种控制利用本身可能也导致人的一种自我进化。因此，人类可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自己的成长。科学家们的著作，例如罗伯特·普罗民的著作（他是赫恩斯塔因和穆瑞著作的积极支持者），被一些人认为没有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报纸上的文章说他已经发现了影响 IQ 水平的第一个基因（表 7）

表 7：

科学家们发现了产生人类智力的基因

（罗格·哈依费德，科学编辑）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影响人类智力的第一个基因，这一发现有着巨大的社会和教育意义。这一研究将使基因测试可以瞄准高智力的人，使 IQ 增长药物的出现变得可能，也将使人们担心缺乏聪明基因的胎儿会被流产掉。这个基因据说是普通智力起决定作用的若干基因中的第一个，是由伦敦精神病学学院罗伯特·普罗民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长达六年的研究之后发现的……“我的确相信这是一个突破”，

他说。神经系统科学家们从现在起将研究这个基因如何影响脑功能，结束关于基因是否影响智力的长年争论。“要和一片 DNA 争论很难”，他说……

这一发现标志着基因对人类智力有无影响（和教育、抚养之类的影响相比）这一难题跨出了第一步。“这将改变我们思考人类的方式，”牛津大学哲学教授乔纳坦·格娄尔说。他说很多人并不想相信存在基因成分。

“这有着巨大的社会和教育意义，”他说，“我们是应该在更有潜力的人身上投资，还是应当补偿那些基因潜力可能较上的人？”不过，《遗传伦理新闻》的编辑大卫·肯德博士反对普罗民教授的研究，认为这项发现将会加深公众对基因决定论的信仰，即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一切有优生学涵义的东西都感到“恐怖”，比如用仪器查看未出生的婴儿。

（电报日报，1997 年 10 月 31 日）

但是，经过更仔细的核查，普罗民和他的同事们的科学声明谦虚了许多（普罗民等，1994；乔尼等，1998）。他们宣称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个和高“g”智力水平相关的基因（IGF2R）。不过他们承认，这只能解释基因对“g”的影响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数“g”水平高的人甚至在这个基因（“等位基因”）的形态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这是令人怀疑的”，普罗民等人

(1994: 116) 说, “是否等足够的等位基因联系被发现了, 将它们组合起来, 所达到的预测水平就能够超过目前以父母的 IQ 为基础的预测水平”。

这又引发了整个环境问题。例如, 关注“母体环境”的研究认为像普罗民、赫恩斯塔因和穆瑞的著作夸大了遗传对于 IQ 的重要性。他们估计遗传能解释 IQ 的 60%。丹尼尔斯等人指出一个事实, 脑的发育大部分发生在儿童生命的最早阶段, 包括在子宫里的生活, 他们对双胞胎的成长做了统计分析, 认为诸如母亲的食物、饮酒、服药和抽烟这些因素都有特别的影响, 这一分析显然降低了基因的相对重要性 (方便进一步讨论, 参见麦规, 1997; 罗伯特森, 1999)。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一复杂和富有争议的领域中的著作之前, 我们需要注意内瑟尔等人的报告中最有吸引力的观点, 也是我们在后文还将提到的观点, 即基因对 IQ 的影响随着人年龄渐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基因对个体智力测验成绩的差异有充分影响……

从婴儿期到成年期基因的作用似乎在递增……个体特有环境的变化是重要的, ……家庭内的变化对儿童的 IQ 测试成绩有明显影响, 虽然这一影响后来会渐渐减弱。

从弗洛伊德、皮亚杰以来的心理学家认为孩童期对我们后来的人生有关键的定型作用 (当然, 在弗洛伊德那里, 还包括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孩童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一研究基因和 IQ 之间关系的著作指出了支持这些理论的某些生物学机制。

社会流动性和个体特征

最近的研究

另一个关于生物性遗传差异的重要性的新近观点（不过并不是想要把种族和智力联系起来）来自桑德斯（1996，1997）。这一观点考虑了影响当代英国社会流动性的因素。桑德斯利用了英国大范围国家儿童成长调查的结果作为他的经验依据，认为个体的能力和努力合在一起对社会能力起着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对个体最终将处于什么社会阶层有很大影响。个体倾向于找到最适合他的工作，为这个工作而努力。会计师和律师 IQ 水平很高（IQ 测量的是一些相关潜能诸如语言推理能力和空间能力），但矿工和农民在 IQ 等级上就处于最底层。因此，那些天赋智力更高的人，那些通过努力实现了天赋潜能的人，更有望获得成功。因此，一个人所面临的社会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的重要性也就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小得多。桑德斯（1996：72）总结说：

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决定我们最终处于什么社会阶层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就应该更注意个体自身的因素——特别是个体的能力和动机——我们应当不那么

担忧我们生在其中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而且，桑德斯认为，这种情况会自我强化，因为高 IQ 的中产阶级倾向于和其他高 IQ 的中产阶级婚配，而工人阶级父母生出的孩子 IQ 水平则倾向于比中产阶级的孩子低。但是，无论是桑德斯的著作还是《钟形曲线》，意思都不是说（尽管人们预计它们可能要表达这个意思），富裕的、聪明的人日益集中在一边，智力水平低的穷人则在另一边。这是由于这些著作所说的“归于平均值”。“聪明”父母的某些孩子不怎么“聪明”，“智力一般的父母”的某些孩子“聪明”，等等。

桑德斯的著作引发了大量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是，一些批评者认为他过分强调了内在能力或者说基因遗传而得的能力，而低估了阶层、教育、居住条件等方面在压制或提高生存机会方面的作用。批评者们抨击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是否真能对“努力”加以测量？如何测量？（布林和古德索普，1998；马歇尔和斯维福特，1996；萨维治和艾格顿，1997）。《钟形曲线》引起了更多的争论。“IQ”究竟测量的是什麼？这样一种测量能够总括人类的一切能力（思考能力，象征能力，应对环境的能力）吗？潘特森（1995：196）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IQ 测试究竟在测量什麼？g 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理想？或者，g 是一个鬼魂？赖尔在他的《心灵概念》一书中认为所有事情都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是“机器中的鬼魂”时可能不是有意用了这一双关——IQ可能和我们至关重要的行为素质无关，而正是这些行为素质从广义的进化论角度和狭义的社会学角度有意义地解释了我们的生存。

不过，这些论点及其反驳还是有忽视生物和社会之间本质关系的危险。危险在于这又复制了古老的生物——社会二元论。右派支持生物学解释，左派支持社会学解释。如何克服这种贫瘠的二分法？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生物性能力可以被社会系统和社会制度提升或拒斥。

前进之路

坚持把有机体（包括人类）放在其背景中来看待，这几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幅更复杂的、不确定的图景。但是，现代发展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正对这一方法的价值提供某些重要线索，这一点会在后文详细交代。

一方面很清楚，一个年幼的、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所受到的影响看来的确非常重要（戴弗林等，1997）。例如，我们前面提过，婴儿的大脑并不是在出生时就已经发育完全了。它的生理成长、神经成长、认知成长都发生在它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几年里，在这些早期阶段，它所处的环境确实特别重要。

另一方面，尽管一些损伤不会轻易得到改变，但也不会在基因上编码或者永久性地固定下来。这种修补在人后来的生命阶段中似乎经常发生，实际上其他物种也是如此。成长如何和

自然选择的进化相联系，这是当今生物学思考的一个核心主题。“各进化阶段再现”理论曾经有过影响，它假设有机体的成长是对它的进化史的再现。如今这一理论已经被抛弃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已经发现有亲缘关系的动物在成长的最早阶段比之后来的阶段显示了更多的差异。同时，如今已经认识到，成长和进化实际上以复杂的方式勾连在一起。如梅纳德·史密斯（1998：3）所说：“成长依赖于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所搜集起来的基因信息，而成年形态的进化依赖于连续数代的成长变化。”

因此，成长并不由进化所驱动，而是依赖于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基因信息。另一方面，进化依赖于基因信息和连续数代的成长变化。这两个过程之间的精确关系现在仍不清楚。不过，有机体在所谓的“种族主题”成长阶段（有机体的基本分化特征开始定型的最早阶段）并不发生基因变化这一观点现在似乎非常站不住脚。几乎可以肯定，这一阶段的基因变化是非常大的。自然选择的进化通过细微的变化得以发生，在种族主题阶段所发生的改变将会带来巨大的、突然的变化。成长和自然选择的进化之间的关系似乎更有可能是，进化将有机体生命后来阶段所发生的基因变化吸收了。稍后，有机体的不同部分开始相对自主了，分化成了相对独立的模块。这些模块的成长和发展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得以发生，但不会造成有机体大规模的改变，也不会对未来世代造成很大的危险（梅纳德·史密斯，1998）。

现在就完全确信人类成长和进化之间的关系无疑太早了。

第四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形式：钟形曲线及其含义

本章的回顾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诲是：把人类机体的成长放在背景中来看。然而，问题是如何精确地描述这一关系。也许最让人满意的前进办法是把人类有机体（以及任何有机体）视作是由一系列潜能、才能和发展倾向所构成。这些都可以遗传。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能否展现出来依赖于社会和物质环境。在这样的办法中，有机体——环境、自然——文化、基因——环境这种种二分法就消去了。二者中每一个都严格地关系着另一个。

第五章 人性是演化的吗？

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包含大量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假设。我们的本性是什么？什么是马克思所谓的“类存在”？这种本性如何与我们的社会类型相连？我们在本性上是竞争型的还是团结型的动物？对于这些问题有很多的猜测，而这些猜测仍留有一些不确定和争论的余地。最近动物行为学和进化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假设。本章认为有关人类本性的一些观点一直过分简单化了。本章将给出连接达尔文主义与社会思想的新路径。

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出发点。第一种认为人类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特种人猿，天生有侵略、嗜血和暴力的倾向。这是一幅阿德雷（1961）和查格农（1992）所描绘的图景。这一观点认为，长期狩猎——采集的生活历史将这些倾向遗传给了我们。最近这一图景更是被进一步发展，试图去理解男性暴力。因此，兰格汉姆和彼得森（1977：173）这样呼应达尔文理论：“猛士易拥有更多的后代，这就是简单、愚蠢、

自私的性选择逻辑。”因此，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战争、奴隶制、殖民主义和性别歧视就是我们进化遗传的直接产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天生是互助、合作和集体主义的。

因此，这一观点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个人主义的和等级化的社会是与我们的人性相背离的。许多作家都可以被归属为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本章认为马林斯基和特纳是第一种观点的代表，而无政府主义著者克鲁泡特金和布金则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本章所涵盖的问题都非常复杂和富有争议，但是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即这两种立场都不正确。一方面，人类以及其他物种，都不是只有惟一一套行为倾向，他们遗传了大量的可选择的行爲倾向，很难事先预测哪一种倾向将会处于支配地位。谈论与人类相关联的某种约束和潜能则会比较简单，这些包括吃、住和繁殖的需要。这些需要当然可能以多种方式来满足，实际上也可能根本得不到满足。另外，人类还具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化、沟通和把抽象概念与经验知识相联系的能力。这些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类生活”的一个特征，是进化的产物，当我们与其他物种一同进化并努力生存和繁衍的时候，这些能力遗传到了我们身上。

这里存在种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天生是竞争性的和个人主义的，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自由主义和保守的思想家，而那些认为我们本质上是互惠的（现代社会削弱了这种互惠主义）的观点则来自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然而本章将要讨论的是，这两种政治视角对于理解人性都没有帮助。实际的图景远比这个更为复杂，“竞争性

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个人主义”和“互惠主义”这样的二分法是被夸大了的。

马林斯基和特纳可以被视作“人类在本质上遗传了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本能”这一观点的当代代表人物（马林斯基和特纳，1992；马林斯基，1992）。他们的观点可以被简要概括为两个要点。他们认为人类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他们是从一项研究现在的旧大陆猴子和类人猿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试验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从这项研究中，他们推论出了被他们称之为“最近的共同祖先”的社会结构，由此也推出了人类的本性。猴子有高密度的关系网，而类人猿的关系网则密度较低。距离我们最近的类人祖先被构想为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在这一部落中，母子关系是其中惟一稳定的关系。”（马林斯基，1992：21）因此低社会性水平、高个人主义水平是我们遥远祖先的本质特征，而这些特征在现代人身上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有趣的是，马林斯基和特纳为了表明人类本性是个人主义，他们以狩猎——采集社会为例来做解释。像其他著作者一样，他们强调这种社会中正规法律和正规教育权威的相对缺乏。他们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接近于人人平等的社会体系”（马林斯基和特纳，1992：85），这一社会较少有社会差别，仅有的差别也是基于年龄和性别而非所拥有的资源。像其他著作者一样，马林斯基和特纳简要地谈到了这一社会鼓励共享与合作的规范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着重强调，这样的社会非常强调并将继续“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立’”（马林斯基和特纳，1992：84）。

尽管马林斯基和特纳认为人类在遗传学上是个人主义的，但这却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人类是非社会性的。他们认为这种社会性是现代文化强加给我们的。这便是马林斯基和特纳的观点的第二个方面。他们认为，如果说人类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那么在现代社会，在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和我们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便会有剧烈的冲突。婚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君主制、公司和国家科层制都是马林斯基和特纳的书名所暗指的“社会牢笼”的一部分。我们所清楚意识到的紧张、侵略还有地区竞争都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它们本身并不是任何侵略本能和地域本能的产物，而是现代制度压抑下人类本性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的未来就是黯淡的，在马林斯基和特纳看来，现代社会仍然是解放的。因为公民权、民主以及市场都承认个人主义。公民权和民主驱逐了强加的权威，而市场允许人们实现他们天生但被忽视了的选择和个性表达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能够得出以下结论：“所有早期社会学家都非常关注‘共同体的消亡’，而实际上普通人就能够生活、参与在一个与他们的遗传本性相对协调一致的社会体系当中”（马林斯基和特纳，1992：162）。

因此，马林斯基和特纳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使社会理论颠倒过来。“失范”、“异化”、“疏离”等是经典社会学著作的共同特征。或显或隐，意思是指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与自己所创造的社会的发展不协调。在后来的社会理论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表述。比如说弗洛伊德（1987），他以主张我们的生物性被现代文明的需求所压制而著称，而再早一些的埃利亚斯也

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如果说马林斯基和特纳是正确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和人类本性的关系之间就并不存在基本问题。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正趋于实现他们天生的个人主义倾向，而不是发展亲密的共同体。

然而，这一论断和来自相反的政治观点的结论一样，包含了很多武断和痴心妄想的成分。现代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性本质上是合作的。比如说克鲁泡特金就认为“互助”是人类生物天性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克鲁泡特金，1987）。他认为合作而非竞争是所有动物天性中的一个基本部分，纵观整个人类历史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适用于整个自然界的也适用于人类：

那些知道怎样更好地联合起来、避免竞争的物种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能够兴旺繁荣，而那些非社会性的物种则会衰亡。认为人类例外于自然界的这一普遍法则，这明显与我们关于自然的全部知识相悖。

（克鲁泡特金，1987：74）

因此，竞争被克鲁泡特金看作是例外而非惯例。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照顾后代的需要，合作和照料相比于竞争对生存而言更为重要。克鲁泡特金认为，这种集体行为是我们刚刚演变为人类的那个时期的“野蛮人”的重要特征。

相似的观点来自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穆瑞·布金（1982，1989），虽然他较少强调“人性进化”这一概念。他认为合作

是人类社会内在固有的特征，它起源于亲子关系（布金，1989：27）。他也关注于探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人类本性，只是不像克鲁泡特金那么热衷。比如说，他关于性别分工的论述认为，一开始是建立在母子喂养关系基础之上的生物学关系，后来在早期的狩猎社会中被制度化为了男性统治的阶层关系。随着狩猎——采集社会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加，男性越来越具有保护他们社区所需要的易流动性和勇敢。这种自发形成的劳动分工是把家庭生活与公民的社会生活相分离的更为永久的统治形式的开始，这一开始被布金称之为“自然的”开始。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家庭生活、女性的哺育能力以及那些被假定的女性特征都变得居于次要地位了，而那些男性的天生能力也被扭曲、误用和制度化了。

女性的哺育能力被降格为弃权；她的柔弱被降格为顺从。男性的“男子”特征也被转变了。他的勇气变成了侵略性；他的力量被用于统治；他的自我决断变成了自高自大；他的决定能力变成了压制性的理性。他对于运动的崇尚也被直接演化为战争和抢劫的艺术。

（布金，1982：80）

对于任何源于进化的人类本性或倾向性这类概念，布金的论述都是非常谨慎的。尽管如此，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社会中可以发现等级和统治性的社会关系，在其他非人类社会根本

社会达尔文主义

看不到这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脱节了，人类拥有对妇女、儿童和整个自然的制度化了的统治关系。布金虽然承认人类是进化的产物，但他把人类视为“第二自然”（比艾尔，1997）。人类是自然界中有自觉意识的部分，显然是进化的产物，但却是能够提前计划并积极规划自己发展的一类物种。

布金的分析已经超出对人性的分析，而涉及到了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缓慢发展紧紧伴随着人类与自然界的日益分离，以及不仅朝向人类同时也朝向非人自然界的统治气质的发展。一种人群驾驭另一种人群的制度化力量 and 环境的退化直接相关。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需要注意，布金的著作的一个要点是他对于“互惠主义”这一范畴的着重强调和对掠夺行为与“个人主义”的拒斥。然而，正像鲁笛（1998：83）指出的那样，物种间的“互惠主义”和“共生”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范畴，是一个很大的实践范围：

布金没有说清楚与“互惠主义”和“共生关系”概念相关联的生态学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变化多样的形式。互惠主义，是物种之间有益的互动，共生关系，是种间生活形式的紧密联合，这两方面都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举例来讲，互惠关系既包括直接有利的互动，也包括间接有利的互动；直接互惠关系可以是

共生的、紧密地直接联合的，也可以是非共生的、疏远地偶然联合的。

更为重要的是，布金对自然界中存在的大部分关系不够了解。这些包括互惠关系，但是也包括共栖（不同的物种分享同一个资源）关系，掠夺关系和赤裸的竞争关系。对于布金的批评提醒我们注意这一明显的可能性，即“个人主义 VS 互惠主义”二分法被远远夸大了。

演化的人性？近期研究

许多有关人性的争论都缺乏经验证据。最近在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医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表明，这些著者所描绘的图景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这一图景还存有相当大的争议空间。任何这类争论都会从对人类从“前人类祖先”进化为人的那个时期的评价开始。人类在这一时期发展了与众不同的精神能力和潜能。

现在一般都认为人类是从狩猎——采集者进化而来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在脑容量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关于这一时期的确切长度仍有大量的争论（细节参见怀顿，1999）。一些人根据石器的发现猜测狩猎——采集时代始于两百万年前。但那些石器可能是用于清扫而不是用于真正的狩猎。更近来的、或许更为可靠的推测（这一推测的基础是：发现了一些矛，其和谐比例和今天的标枪很像）认为狩猎——采集时代可

社会达尔文主义

以追溯到大约 40 万年前。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时期人们是如何生存的？最近，一项对于四大洲的 24 个现存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种学详细研究，对那些反映了最基本的适应模式的普遍行为方式进行了探究，这些适应模式是人类在祖先的狩猎环境中演化而出的（厄达尔和怀顿，1996）。这一研究认为人类是以狩猎——采集者的形式进化为人类的。我们从现代人群推论进化史上的同类人群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大脑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受到了更发达的农业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于了解前现代社会中的习惯和社会关系可能会很有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表明人人平等的行为或者是原始共产主义形式确实是那些社会的一个最主要和最稳定的特征。

正如前述马林斯基和特纳的观点所说，在这样的群体中没有永久的特权阶级，也没有超出亲属之间的分配和简单交换范围之外的资源分配。但是，我们很难认同马林斯基和特纳的结论：这些社会以及其中的人们都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在这些社会中也有积极的措施来限制个人试图获得额外的资源和权力。人人平等得以实现或实施的确切方式在不同文化下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杀死那些涉嫌的人）。但是马林斯基和特纳的著作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现存狩猎——采集社会的经验研究确实表明资源和权力的集体共享是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这是进化的人类本性的一个普遍特征还是马克思称之为“类存在”

的一个普遍特征？

如果（“如果”这个词一直都非常重要）说前现代社会是以公有、共享为特征的话，那么就有了“平等之谜”这一问题（纳夫特，1991）。非洲黑猩猩是现存的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它们是灵长类，我们与它们所共有的最近的祖先生活在六百万年前。考虑到黑猩猩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等级统治的特征，那么原始人类为什么能发展出平等的倾向呢？这部著作（有时会被归类为“认知行为学”）提供的答案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答案更多地是在生物进化倾向的这一方面，而非马林斯基和特纳所认为的文化这一方面。这一观点认为，我们早期祖先所发展出来的精神、肉体 and 行为的倾向性使他们能够成为有效的狩猎——采集者。因此，人类以降低冲突，使社会和谐最大化从而有利于生存的方式来适应生活。食物共享降低了所有个体的风险，它克服了狩猎所带来的结果不稳定的缺点。动物在任何时间都会杀死远多于它们食量的猎物，与此相对照，一群在食物分配方面存在计划和合作的动物则能增加每一个个体拥有充足食物的机会。因此，按照这一观点，那些早期的人类都是原始共产主义者。但是没有必要把这样的行为浪漫化，这种在资源利用方面进化出来的合作行为可以被视为仅仅是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抵制永久性支配的倾向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进化优势。这样的社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这些分工建立在技艺的基础之上，包括狩猎技术在内。但是，一个猎人不会仅仅因为是一个

好猎手而占据永久性的统治地位。在狩猎——采集社会，一个比个体间的完全竞争更好的进化策略是，允许那些最擅长狩猎的人能够成为最好的猎手。正如厄达尔和怀顿（1996：147）所说：

那些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反抗他人的支配而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支配他人的人，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生产性的劳动和社会行为中，而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做支配他人的徒劳的努力。与此相反，那些一直陷于陈旧的“支配—服从”关系下的人则会浪费时间。

在这些著者看来，脑形成和智能的极大发展（由一些其他的过程所导致，比如说是狩猎技术的增加）慢慢地成为了一种优势。它们被用于取代那些以身体优势为基础的原始竞争行为，而代之以社会专家、合作、政治联盟和被那些研究猴子和类人猿的专家们称之为“马基雅弗利才智”的形式（见哈穆弗瑞，1976；比尔纳，1995；比尔纳和怀顿，1988；怀顿和比尔纳，1997；厄达尔和怀顿，1996；怀顿，1999）。然而，智力和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不仅被个体用于思考和评估可替代的行为过程，它们也被用于思考他人的思想以及把他们的自我意识投射到他人身上。因此它们不仅被用于解决问题，也会被用于记住其他个体的相似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被用来欺骗他人，也可以被用来发现欺骗行为、理解他人的动机和操纵他人。正如

瑞得里（1994：22）所说：

有一个关于哲学家的古老故事，故事讲述的是，
当一个狗熊追赶这个哲学家和他的朋友的时候，他拼命地跑。“这没用，你永远也不会比熊跑得快”，他的朋友说。“我不用跑得比熊快”，这个哲学家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简而言之，这种与众不同的能力是在社会环境下演化出来的。这种对自我和他人的意识的发展赋予我们的祖先以很重要的适应性优势。虽然这一点没有被前面所介绍的著作所强调，但是仍可以被用于建立和强化与其他物种的联系。

因此哈穆弗瑞、比尔纳、怀顿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最近的祖先发展出的技能和适应性的形式在向人类进化出的技能和适应形式迈进。他们认为，“马基雅弗利才智”在我们的祖先身上进一步发展了技艺和智能，这一过程后来进化出了与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和现代人类都相关的平等主义。坦白地讲，统治是不合算的。合作成功地保证了生存、长寿和繁殖。用怀顿的话来讲就是“马基雅弗利才智产生了平等主义，尽管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私人交流的话）。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这一著作对进化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某些意义。或许它的意思是说，人类已经对群体需要而非个体自身的需要建立了无意识的认识。同样的，它的意思也可能是说人类天生具有合作的动机以及满足群体而非个体需求的动机。

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点，即那种认为选择影响群体差异而非个体差异的并不流行的观点应该受到更严肃地对待（维纳-爱德华兹，1986；本达尔，1998；扫伯，1999）。

厄达尔和怀顿的整个论题可以被概括为图表 1。它表明了整个进化时期等级制社会结构和平等式社会结构的变动情况。A 点是距今六百万年以前，那是原始人与黑猩猩的分界时期。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早期社会明显具有等级特征。C 点是距今一万年前的现代复杂社会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人类又陷入了等级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这一时期是田园主义的上升时期，而非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B 点是平等社会的开始，就像前面讨论过的一样，B 点开始的确切时间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B 点到 C 点这一时期已经长到足够使我们发展出较高的进化水平，进化为拥有高度发达大脑的人类。正如厄达尔和怀顿（1996：141）所说：“如果说人类具有社会行为的遗传倾向的话，它必定是在这一时期由进化过程形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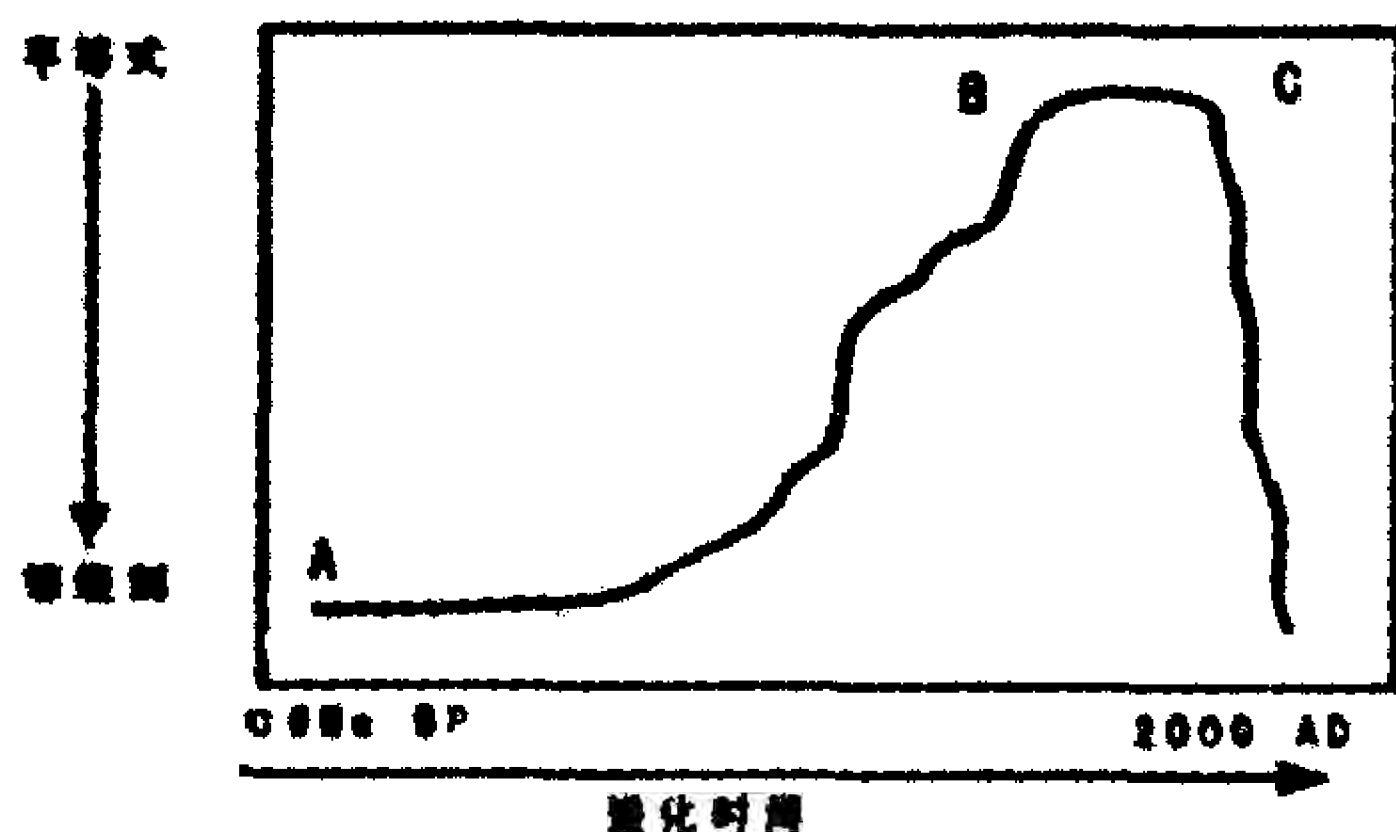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结构和人类进化（摘自厄达尔和怀顿，1996）

因此，如果最近的这项研究以及厄达尔和怀顿对它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现代人类就是产生于一个漫长的进化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和他们早期的祖先适应了游牧社会的简单生活方式（在有关环境保护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观点，见若赫，1997）。发展到后来，我们就进入了等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完全脱节了（因为没有时间来使重要的生物进化得以发生）。

这是一个观点的另一种版本，我们在本书中已经遭遇过它的多个版本，它认为，进化后的人类已经与他们的社会不同步了。如果怀顿和他的同事的研究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克鲁泡特金所描述的社会之中，而且还在不断再生产着这样的社会。这一情况与马林斯基和特纳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和公有性的，但是却生活在一个系统地破坏和削弱这种倾向的社会中。在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厄达尔和怀顿以及其他得出类似结论的著者都没有问过，那就是为什么一个本质上是平等的物种，却构建了一个与他们的需要和倾向完全不同的社会。难道仅仅是因为某个特殊统治群体成功地把这样的社会强加于整个人类吗？或者是说明在这个理论中存在着错误？

等级社会中的人类是集体主义的吗？一个评价

在这一部分我们必须涉及一些更加谨慎严肃的词语。首先，做出前现代社会是“黄金时代”的假设时必须非常小心。

比如说，厄达尔和怀顿并没有对早期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进行详细地论述。然而他们却顺便提到，大量有关现存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表明，成功的猎手以肉作为贺礼可以帮助他们赢得最能干的妇女作妻子，但是这却增加了通奸的几率。很难解释这样的现象。这仍然有可能符合这样一幅狩猎——采集社会的图景，即在这样的社会里，本质上的平等主义导致了妇女生产和再生产角色被高度评价成生存所必需的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真实情况确实如此。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厄达尔和怀顿所说的权力的分散和波动只特别适用于男性，而女性则被迫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女性在经济上通常更重要，因为一年中采集往往比狩猎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最近有关狩猎——采集社会的平等主义的研究文献主要研究的是男权的缺乏。布金认为以共享为基础的重要的劳动分工在适当的时候被发展成了较为永久和压制性的统治方式，但上述研究文献并没有采取布金这种更理论化但也许是更加精确和辩证的论断。

第二，现代人类的心理状况或者行为倾向显然是非常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在现代人类身上有强烈且非常明显的倾向去反抗支配、要求共享、尊重他人的卓越技艺，并且对自己所拥有的技艺保持信心。这些正是维尔金森（1997）所说的“保证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通过储藏、甚至是偷窃和杀戮达到关心自己、保护自己目的的倾向。考虑到现代人和有着“尽可能支配他者”倾向的黑猩猩、类人猿拥有共同的祖先，那这一倾向就有可能从祖先那里遗传

给我们，我们有可能还留存有进化的大脑中那些古老的部分。对于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猩猩的研究提醒着这一遗传的存在。像人类一样，一般来说它们过着一种和平、和睦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有清楚的记录表明，它们有时也会攻击和杀死自己种族的成员。兰格汉姆和彼得森（1997）在“恶魔般的男性”的论述中重点强调了这一行为。

简而言之，把我們不喜欢的人类行为归咎于社会，而把我們喜欢的行为归咎于人类本性的做法并不好。有关人性的更加复杂的观点，即认识到人性中包含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倾向，被前文中批评过的马林斯基和特纳简略提及过。实际上，马克林（1983，1990）甚至认为人类的大脑是“三位一体”的模式，由三个再现了我们进化过程的部分所组成。在他看来，人类大脑的核心部分是一个“爬虫动物”大脑，由自私的生存本能构成。在这部分大脑的周围，是被称之为“古哺乳动物”的大脑，这部分大脑赋予我们以一种新的行为倾向，比如对于子孙后代的感情。最后，马克林还拟想了一个“新哺乳动物”式的大脑，这一部分大脑产生了推理、语言和对于家庭之外的他人的感情。因此，人类大脑可以被视为我们进化轨迹的复杂产物。按照这种观点，人类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共享性、社会性的物种而进化的。但是，与此同时在我们身上也同时保存着比较弱的类人猿的成分（“老亚当”）和狩猎——采集者的成分（“堕落之前的人类”）。

马克林三位一体的理论太过简单和机械。更重要的是，它把太多的东西归结于进化遗传了。但是它至少表明了现代人类

可以是个人主义的，也可以是平等主义的，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正在进行的关于平等主义论题的讨论中，波义姆（1997）新近提出的观点暗示着一个更为复杂的立场。他认为，人类本质是平等主义这一观点无疑是可商榷的。他认为来自下层的平等主义和来自上层的专制统治之间无法有稳定的和解：

我并不认为给人类本性冠之以“平等主义的”、“专制的”、“和平的”和“好战的”特点有什么好处，即便这些标签引发了积极的争论。人类本性更有可能
是多面性的和有内在矛盾的，而政治行为则通常是视不同情形在对立的倾向之间轮流选择。

（波义姆，1997：359）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波义姆与马林斯基和特纳之间有趣的分歧。波义姆把民主看作控制或压制紧张与冲突的办法。因此，正像《社会牢笼》所说，民主不允许我们潜在的个人主义得以实现。与此相反，统治阶级则试图控制那些想要理解和控制自己生活的人。因此，在继续存在阶级、种族、性别压迫的情况下，民主（以类似于公民权、选举权等形式）只允许个人主义得到部分实现。此种有关民主的更加偏激的观点与这里集中讨论的另两位学者的立场相近，他们是马克思和布金。

波义姆的更为一般性的批评认为，有关我们的生物遗传本性是原始平等主义的论述过分简单化了。他认为在人类的遗传

中存在着复合的和矛盾的倾向，这些倾向可以共存于动态的张力之中。或许，确实存在一套共享、共产的倾向，这些倾向在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它们毕竟只是我们的进化史在 50 万到 200 万年之间的产物。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从人类潜在的相似倾向中长出了许多种不同的行为结果。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讨论的。

前进之路？马克思有关人类本性的论述

虽然马克思在有关人类本性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从未发展出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他却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越来越有影响的思考。至少，他的某些分析是走出人类本性要么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么是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的这一僵局的一种路径。

首先，马克思讨论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人类是一种自然物。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进化的产物，他们的倾向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能够自我发展，并且能够创造自己的本性、未来和社会。不过，这种融合在他著作中的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接近于克鲁泡特金式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接近于论述人类的“马基雅弗利才智”的著作中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社会实际上拒斥为人类的解放提供条件。劳动分工、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和错误的意识都导向了现代异化，而非解放。马克思将

社会达尔文主义

辩证思想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种本质的社会性是他们“类存在”的一部分，是使他们成为人类的主要标志（还有他们的创造力和语言能力）。身份和倾向在它们存在的不同的社会里被发展、被实现和被拒绝。人类想要充分理解自己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潜能（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潜能），在人类缔造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得不到实现。

因此，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关人类本性的非常标准化的概念，这一概念以高度的乐观主义为特征（马克思，1975a）。在这里，人类本性不仅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和集体主义取向的，而且被认为有很强的内在能力比如审美能力。这种潜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值得被释放或者“展现”**：

只有通过人类本性财富的客观展开，才能创造和培养出人类的主观感觉财富——善听的耳朵，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简而言之就是使人类满足的感觉。

（马克思，1975a：353）

但是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着私有财产制度、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国家统治和许多错误的意识形态）没有实现人类本性的解放，却把人类变成了自私自利的、无情的、破坏性的怪物。而换句话说，一旦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时，这些消极的特征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在同期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1975b）写道“人类的本性不是每一个单独个体身上的抽象存在，而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观点和米德的观点有些相似，他认为人的自我产生于与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乍看起来，它似乎更像是一种描述，不过是一个萨特式的观点，即人类根本不存在什么本性（坡斯塔，1979）。这是一个人类本性“证据不足”的观点。另一方面，它暗示着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总和”下会有不同的人类本质。人类通过创造和生活于一个特定社会的过程再造着自己。相似的，考虑改变一个社会就必然意味着考虑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一关于人类本性的、明显更加中立的观点也强烈地意味着，马克思所谓的“人类本性”可以适应人类给自己创造的不同的社会以及不同生态环境。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说，这种可塑性使人类相比于其它物种有了极大的优势。

最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一个观点。这一观点可以被看作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结合，它看起来更有生命力。一方面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不变的。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了这种不变的本性得以实现和无法实现的情形取决于它所遇到的和它制造的情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所写：

如果一个人想要通过效用原理来判断所有的人类行为、运动、关系等，他就必须首先要涉及人类的一般本性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人性。

(马克思, 1976, 引自马克维克, 1991: 246)

本章所回顾的这些著作集中于一个事实, 即人类具有显著发达的抽象能力, 具有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动机以及感情的独立思考能力。反省, 即个体对自我的认识, 是这种抽象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明确地表达目标和向他人传递复杂的概念也是这种能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能力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普遍本性”。但是, 这些能力实际如何(比如说人们所发展出来的实际的抽象形式, 以及他们所采取、所认识到的认同形式)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时期”(赫斯特, 1994)。而且, 也没有理由认为人类所持有和传递的思想要么是个体主义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的。正像下一章中将会详细讨论的一样, 这些与人类实践活动相关的、自然遗传下来的抽象能力和思考能力, 决不会被社会中所有的成员同等程度地意识到。更加明确的是, 这些人类天生的能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既会被发展也会被压制。某些阶层充分实现了他们的能力, 而其余的人由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统治则没有实现其能力。如我所希望表明的那样,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一个替代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可以被构造出来。这是一种“来自下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它把现代进化思想的成分和对阶层以及构成现代社会的其他力量关系的理解结合起来。

第六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 朝向一种新的综合

最后一章将简述一下关于进化思想与社会思想之间可能会有新型关系，这种关系避免了上一章所讨论过的那种二元论和还原主义，避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早期形式中所暗含的偏见。它也避免了各种各样的类比，这些类比曾在社会科学的进化思想中占据很大的部分。本章将利用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健康心理学的近期发展，讨论对资本主义和人类进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的未来可能发展方向。

本章有三个要素。首先要再次强调更关注于有机体本身而不是遗传的发展生物学的一些形式。其次，关注资本主义对人类有机体的影响。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概念活动和理性知识，它们被高度赞誉，被一些人所拥有，而实践活动和实践知识则被鄙视，为另一部分人所拥有。但是现代社会的权力和控制的集中化并非毫无问题。它带来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第

三，利用生命科学的一些近期进展，思考资本主义、个体发生学和人类进化之间可能的长期关系。这便对未来的政治形态给出了一些重要暗示。资本在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建人类吗？

人类发展的有机体中心观点

此处提到的生物学传统主要关注有机体用来和环境进行灵活互动方面的遗传倾向。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倾向增加了有机体长期自我进化和组织的可能性。这种立场吸收了，实际上融合了长期生成的生物学和生物心理学，这一学科是由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学者共同提出的。我们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曾接触过这样的观点（也可见鲍德温，1902；瓦丁顿，1957，1975；皮亚杰，1971；莱文汀，1982，1991；高特里，1992；比代尔和费舍尔，1997；罗伯特森，1999）。

这些替代性观点有几个共同点。遗传基因被降格为因果机制，它被认为是复制、实际是改变了维护有机体成长和稳定的真实的因果力和潜能。基因以许多复杂的方式与其他基因、细胞甚至是外在环境相互作用。行为和成长确实不能被简化为基因和遗传结构（霍尔，1998）。明确把进化思想与社会关系、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皮亚杰的著作，他的著作部分基于瓦丁顿著作。在皮亚杰看来，人由生物学编码的早期成长包含着儿童期的一系列阶段，这些阶段是从“前运算”阶段到“具体运算”阶段，大约需要8年时间——说“具体”是因为这一阶段仍与实物相联系（把物体归类、排列、注意联系、理解数

字) (皮亚杰, 1971: 17)。大约从 11 岁左右开始, 人们逐渐拥有能力去整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复杂的信息中得出一般的结论、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致力于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可逆性”——即围绕一个问题思考并且采取办法加以解决。

在皮亚杰看来,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出生到大约 2 岁左右。这是“感觉运动”阶段, 在这个阶段, 儿童通过感觉来学习, 即触摸、感觉物体和身体力行地探索他们所处的环境。“前运算”阶段大约从 2 岁到 7 岁, 在这一阶段, 儿童学会了语言, 而且开始通过符号方式运用词语去表现物体和形象。但是, 他们仍然缺乏理解一般性概念的能力, 他们推理的能力是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水从一个高而细的容器里面被倒到了另一个矮而宽的容器里面的话, 即使水平面降低了, 但是水的体积仍然是一样的, 这一点他们并不理解 (这就是所谓的“守恒测验”)。当儿童发展到了“具体运算阶段”的时候 (大约在 7 岁到 11 岁之间), 他/她就能够理解抽象的、逻辑的概念了, 也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关于水和容器的错误的推论方法被克服了。数学运算, 比如说乘法和除法运算也成为了可能。在“形式运算阶段”, 大约是从 11 岁到 16 岁, 掌握抽象假设的能力被进一步发展出来。

结果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是, 仅仅以本能和应急反应为基础的逻辑通过一系列阶段逐步发展出关于世界的知识, 最终发展出掌握、使用和交流抽象、理性观念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能力和理解力都是和有机体结合在一起的, 和活生生的人结合在一起的。皮亚杰努力指出, 已长成的大脑是不断

区分和整合的。他认为其他动物也拥有学习的能力，并且拥有那种可以协调、集中化运作的大脑，他试图以此克服前面所说的那种二元论。

现在强调整个有机体而不是遗传基因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赋予早期成长以特殊的重要性。但是这一流派中的近期研究表明，个体的精神成长（更具体的说，是神经细胞的组织）部分依赖于基因遗传，但是也依赖于成长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正像理查德森（1998：70）所说：“大脑皮层的微型电路（哺乳动物大脑最后进化出来的部分）在出生时只具有一个初步形态，它的功能发展取决于实践经验。”

这就质疑了皮亚杰的个体的发展是普遍的和硬件式的这一假设。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谈到。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大脑“发展的可塑性”。这又指向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心理结构是“经验预期”性的——设计用来发展或展示和经验有关的神经机制。另一方面，大脑是“经验依赖”性的——存储个体所独有的信息，保存它们，直到有外部事件来引发它们（格林豪等，1993；也可见于费施巴哈，1992；沙兹，1992；罗伯特森，1999）。可以推测，那些对发展的可塑性有用的基因和其他基因一样是通过标准化的进化过程被挑选出来的。

这类著作便指向了发展着的人类的进化潜能。当我们再次讨论皮亚杰的时候，我们将会回到这种观点。然而，问题是，人类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如何发展出他们强大的智能的，这一实际过程并没有被充分解释。韦尔斯赞成一种“反馈环”，在

这个反馈环里，有发达大脑的人和他的物质环境和语言环境相互作用，使环境进一步复杂化。韦尔斯认为，更为复杂的环境又会选择出更发达的大脑：“大而聪明的大脑产生更加复杂的文化和身体，它们能够更好的利用大脑。而这些身体和文化反过来又产生更大、更聪明的大脑。”（韦尔斯，1993：xxii）然而大量的古生物学著作认为，我们的祖先——早期类人猿并非是仅仅通过思考更新更好的观念来发展它们复杂的心理结构的（伍兹和格兰特，1995）。而是通过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改造它、制造工具、交流对它的认识，更一般地说，既在环境中适应又在环境中进化，而发展了自己发达的智能。我们所说的“环境”其涵义有很大的讨论余地。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资本主义及其与人类智能的相互作用。

权力、资本主义、人类心智的断裂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社会的核心是生产方式，即人类社会组织起来作用于自然并且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方式（柯恩，1978）。人类通过各种方式与生态系统和其他有机体相互作用。但是生产方式，运用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的方式，仍然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论述中占据中心位置（马提内兹·阿里尔，1987；欧考纳，1994；本顿，1996b）。生产方式，尤其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支配了整个社会结构与自然——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皮亚杰认为人类拥有抽象推理能力，并能

够把这一能力与其早年获得的更为直觉的理解结合起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这种能力处于什么境况呢？皮亚杰的研究由于没有充分涉及到人类与环境、人类与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发展而遭到了批评（布塔沃斯等，1998）。这一批评与本文所提出的批评是一样的，即皮亚杰忽略了社会情境，过分强调了那些由儿童的天赋能力所决定的时长固定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命题并不合理。在上学之前，儿童已经发展出了发达的技能，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是在他们成长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被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一些可以获得认同并且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意图都非常明显的环境中，他们更容易发展自己的思维。多纳德森（1978：121）认为，“这些人类意图，是儿童思想得以嵌入的矩阵。”因此人的成长需要放在他（她）与他人思想以及客观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背景下来看。

相似的是，布克——毛斯（1982）也指出了情境的重要性。她认为，皮亚杰的心理学“贯穿着或显或隐的从西方观点出发的关于人类本性（包括认知机能）的假设”（布克——毛斯，1982：276）。她在其中发现了一种价值判断，即形式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具体思维。因此，她认为这种心理学有意或无意地肯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中抽象知识可以被买卖。从布克——毛斯的论述可以得到很多教益。她还认为皮亚杰的理论尽管重要，但低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天赋能力的结合，尤其是低估了资本主义对抽象思维能力的推动。比如说，她引用了一个研究，该研究表明西方工业社会中的孩子在掌握那些从背景中分离出来的抽象逻辑结

构方面非常快，而非西方社会中的孩子则更容易处理“守恒测验”，如果那些器皿是他们的家庭所制作出来的。因此，理解个人成长的潜在原因和类型需要结合特殊社会关系的偶然性（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米勒，1997；西尔瓦，1997）。

这把我们带到了将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相结合的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以及这一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变种，就是将抽象思维与更加直观、经验性的思维形式相分离这一长期倾向。而且，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往往被分配以不同类型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专门群体去发展和交流抽象思维，这种情况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比如说在古埃及，就有专门研究数学的僧侣阶级）。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资本主义下，这一过程已成为管理社会关系和劳动过程的重要因素。而嵌入在实践经验和环境中的知识则容易被进一步低估和诋毁（海尔斯，1980）。由于缺乏与更抽象知识形式的联系，黑格尔所谓的“直接的”思想是残缺的。

知识之争很长时间以来都是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发展非常重要（卓林和本萨德——文森特，1996；奥特兰姆，1996；西考德，1996；施泰尔，1996）。正是在这一时期，大众科学知识开始与实验室研究或者是田野研究急剧分离。大众科学知识越来越被置于次要地位。在谈到 19 世纪初的时候，施泰尔举例说：

从业者、“科学绅士”、爱好者、作家和公开演说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了科学文化的日益分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 19 世纪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在一般性知识和专门性知识、大众与学术、城市学术团体的“高级”科学与传播实用科学知识的“低级”科学之间的分离在日益加深。

这样的分离也伴随着对另一些知识的忽视，如对妇女、艺术家、以及其他具有献身精神的业余者，比如说牧师，所获得知识的忽视。这排斥了以非专业人员所收集的事实为基础的抽象知识的发展。达尔文被认为是最后一个把观察、经验生活和理论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人（奥特兰姆，1996）。然而，实践性知识也很容易被浪漫化。要知道，早期自然主义是与神秘主义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在孔德的术语中，这一时期仍然属于社会进化中的“神学”阶段。就像巴勃（1980：25）所写：

与宗教相比，科学没有任何价值。在大众手册中，我们一再地发现，作者总是询问“为什么某某事情能够发生？”然后便以一种虔诚的口吻自我回答说“是上帝的安排。”

但是这种分离过程的潜在机制是（实际上依然是）什么？抽象性知识的力量兴起可以部分归因为“商品抽象”的成长及其幅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围绕抽象而组织起来的。特别是，买卖商品意味着人们不得不一直以“价值”这样的抽象物来进行思考。由于这一非常重要的原因，几乎每个

人每天的生活都需要不断的抽象（扫恩-赖特赫尔，1975）。这便忽略了具体的细节，包括实际制造出商品的环境细节。这便涉及到潜在于抽象之下的第二个关键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者特别强调了围绕生产过程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伴随阶级力量的实践而产生的知识边缘化。这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在付酬工作过程中的去技术化的方式。另一方面，正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写，“知识、技能以及社会知识生产力的积累，被吸收进和劳动对立的资本中”（引自麦克莱伦，1977：377）。与此同时，劳动分工“使劳动者变成畸形”，因为它只利用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而忽略他们的其他能力，“正像在拉普拉塔市，人们仅仅为了皮毛和油脂就杀死整个动物”（引自麦克莱伦，1977：477）一样。

更一般地，我们应当回到《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给出了关于劳动力资本的形式归属和真实归属的理论。“形式”归属指的是“劳动直接从属于资本，与技术的发展状况无关”（马克思，1976：1034）。“真实”归属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下，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化。这一真实归属意味着工人失去了他们的自主权，他们的工作沦落为听命于资本家的机器。

马克思关于“去技术化”过程的原初分析现在已经被极大地发展了（例如，参见布莱瓦曼，1974；海尔斯，1980）。在有酬劳动领域中，最好这样来理解去技术化，即把知识从既定劳动过程中剥离出来，为一群本质上不同的、有时被称做“脑

社会达尔文主义

力”劳动者的人所拥有。一旦这种转变发生，知识就可以转化、具体化为新的劳动过程。机械化是这一过程的经典形式。尽管后来马克思的理论做了一些修正，但是“形式”归属和“真实”归属仍然被视为现代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

最近，女性主义者和受女性主义者启发的一些分析特别引人瞩目，他们研究有偿劳动之外的其他领域中现代科学如何不断地分离和贬低实践的、业余的、局部的知识。比如说，兰波特和罗斯（1996）就简单论述了在现代医学实践中实体性知识和非实体性知识之间的艰难关系。相似的观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在这些国家，强权的既得利益者越来越拒绝和轻视本土的生态知识和妇女的技能。玛艾斯和西尔瓦（1993）显示了某些类型的工作和知识的被分离、被从属化开始延伸到了家庭和社区当中。某些类型的知识和劳动再次被认为是被动的和无创造性的。教给成长中的儿童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学习“真正的”知识的前奏，即和有偿工作领域相关的知识，这一领域被假定为是更真实的领域。同时，这一从属关系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者长期忽视了人们（尤其是妇女）养育子女和从事其他家务劳动的技能，这些劳动是没有报酬的。

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和一些著者（比如说皮亚杰）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表明，“知识政治”并不仅仅因为排斥人类将实体性知识和更加抽象化的观念相联系的天生能力而意味着“政治”。知识政治对支配某些人群也很重要。但是人类潜能的细分既适用于统治阶级也适用于被统治阶级吗？远非如此，因为

统治阶级处在更优越的领会和操纵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关系的位上。因此，社会精英能够清楚全面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处境，当然也包括其他人的处境。

资本主义：第三个矛盾

然而，权力的运用（通过知识的管理以及比较明显和强迫的形式）决不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不断增加的特殊利益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最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近观点强调了第二个矛盾，也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其“外在物质条件”之间的矛盾——对生态系统、臭氧层和其他物种的破坏，诸如此类（本顿，1996a）。第三个矛盾是资本和人的内在本性——人类保持健康和有效工作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正像马克思所写（引自麦克莱伦，1977：478）：“除非有来自社会的强制，否则资本便会无视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与寿命。”

发达工业社会人们的健康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840年在利物浦，专业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5岁，商人及其亲属是22岁，劳工是15岁。现在，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4岁。这是真正的增长。但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仍然是不计后果的。由于大量复合化合物而导致的人类健康的轻微下降就是一个例子（考波恩等，1996）。另一个就是詹姆斯（1997）所谓的“低复合氮社会”的产生，这样的社会充斥着过度的个人主义、对地位的忧虑、不稳定的社会关系，所有的人都时刻储备

抑郁药。

另一个更加微妙但更普遍的不计后果的情况是关于不平等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平等并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因此，并不清楚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质上导致了不健康。但是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及其所带有的不平等水平，会恶化或者提高人们的健康。

在医学社会学中，众所周知在社会不平等和低健康水平之间有着普遍的联系。这成为许多现代公共健康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唐森德和戴维森，1980；怀特海德，1987）。在非洲、印度和南美的数百万人身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低健康水平和绝对贫困之间的关系，那里的人们吃的很差，饮用不干净的水，住在肮脏而简陋的市镇。在非洲的次撒哈拉沙漠地区，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52 岁，在印度是 58 岁，与此相对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则是 75 岁。

然而，关于西方社会收入与健康关系的现代研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扭转。它认为是权力关系和相对不平等真正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因此它认为，在那些权力不平等采取极端形式的社会当中，健康更容易恶化。在那些高平等水平的国家里，比如瑞典、挪威和荷兰，人们的预期寿命比英国和美国要高（维尔金森，1996，1997）。正如维尔金森（1997：128）所说：

发达世界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
这一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绝对的物质水平是限制健康

第六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朝向一种新的综合

的主要因素。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收入将把你置于何种社会阶层。

但是，为什么相对富裕社会里的不平等能够导致预期寿命的下降，引发更普遍的健康问题呢？那些明显的因素，比如说吃的差、居住条件差等仍然是重要原因，但看来还有其他机制在其作用。本质上，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权力关系差别非常极端的社会里，健康会恶化。

那么，这其中涉及的生物学机制是什么？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动物一样在面对身体、精神和感情上的威胁时，已经进化出了强大的反应能力。他们的身体会自动地反应出是留下来反抗还是逃跑认输。现在对这些过程的认识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一过程包括向血流中释放糖和脂肪，为快速产生能量提供燃料；血红细胞向血流中汇集从而输送更多的氧气给四肢的肌肉和大脑；面临即将到来的伤害，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血液开始凝集（例如，潘特尔，1996）。

更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持续地暴露在压力环境之下会严重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被称为抗体的保护性物质产生出来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外界物质即抗原的伤害。另外，正常细胞会挑选并破坏那些已经带有外界特征的细胞，比如说被感染的细胞和癌细胞。“压力”是一个包含多重涵义的词（塞里，1984）。一方面，它包括了兴趣、交战、涉入和决定的成分，另一方面它又包括了不满意、厌烦、不确定、焦虑、疏远并最终超出忍耐限度的成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们发现如果人们重复地暴露

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压力环境之下，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就会受到伤害（赛里格曼，1975）。

这些研究还表明，在西方社会，不平等导致低健康水平的关键原因是社会权力的缺乏。如果人们对他们的生活缺乏控制力的话，他们的健康就会恶化。这一点在现代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确认（如见布拉纳，1997；马丁，1997；罗瓦罗，1997）。正如这一领域中的另一个研究者潘特尔所说：

如果这些适应性反应是被延长的、高强度的或者不时被重复的，它们就会增加磨损和消耗，穷竭身体的适应力，并且最终可能破坏身体内一个或者更多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疾病，甚至死亡。

一项有关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那些拥有最少的组织权力和最不能控制自己工作的人，有着最差的健康水平（布拉纳等，1996；波斯玛等，1997），其中包括心血管问题的产生。其中一个研究者这样陈述这一事实：

有证据表明在富裕社会，心血管疾病的上升与职业地位的下降有关，即使在那些办公室底层人员身上也是，尽管以传统观点看来他们并不贫穷也没有物质危险。

（布拉纳，1996：296）

因此，尽管人类的健康水平在提高，但是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还是会生病。这是极端权力关系结果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另外，最近的研究在分析不健康是如何在家庭里传播时提供了很好的解释。问题的重点又一次从基因本质转到了人类的遗传倾向方面。这些倾向是怎样被各种各样的社会所影响的？

流行病学的近期发展认为，怀孕的母亲给予她未出世的孩子一个他（她）所不知道的“天气预报”，告知他（她）将会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巴克，1998；贝特森和马丁，1999）。从较差的背景出来的孩子将尽力对付不利形势。他们的血液流动、新陈代谢、荷尔蒙的生产等导致了身体结构和功能的改变。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说，他们将很好地适应环境，即使这个环境明显是人为的。相似的适应过程也可以在其他物种如羊、猪和老鼠身上发现。对人类来讲，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更容易遭受一些譬如慢性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病。此外，他们的寿命也容易比平均寿命短。非常重要的是，“天气预报”似乎是一代一代向下传的，妇女养育胎儿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她们自己在子宫内的经历。因此我们可以设想造成“不适应的”下层阶级不断再生产的生物学机制：人类不仅出生于一个较差的环境中而且构造了这样的环境，并且进一步把这种生物学上的不幸遗传给他们的子女。然而，矛盾的是，如果孩子们出生在一个他们无法很好适应的环境中，他们也会容易遭遇困难。比如说，一个饥饿的母亲把孩子生在一个高糖食物的世界中，那么结果就是会增加孩子患糖尿病的可能。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说，我们正在目击那些最不“适应”环境的人的失败。

然而，早期成长对于后来健康的重要性现在已被认为远远超出了胎儿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孩子在其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年期被如何对待强烈地影响他（她）以后生活的发展（例如，参见蒙特古玛瑞等，1996，1997；玛摩特和瓦兹华斯，1997；基汀和赫兹曼，1999）。因此，情绪的稳定、教育成绩、认知能力和社会流动性都显示出与儿童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成长方式紧密相关。这对认为这些能力的有无是通过基因遗传给人的观点，显然提出了强烈地质疑。

这一研究推翻了那些试图以“基因”和“环境”原因来解释健康和智能的研究。现在争论主要集中于在背景环境中的成长。早期生活中的非连续事件是造成成年期问题的原因吗？这些问题是生命过程中事件不断累积的产物吗？或者像我们期望的那样，这些事件是以上两个过程的结合（帕瓦尔和赫兹曼，1999）？

我们现在是在这一重要的经验研究和进化思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触及这一点了）以及有点丧失活力的社会理论之间建立初步的联系。后一方面指的是马克思的归属理论。这两个领域的结合使我们能够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资本主义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构造了人类吗？

生物—社会进化：人类生物学的归属

那么，社会与漫长的人类进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社会变迁是如何与以基因遗传为基础的人类成长结合在一起的？我们

对这一过程还是所知甚少，但是至少有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即个体成长中的经验会产生长期的进化影响。

与瓦丁顿的研究一样，现在有大量的研究强调有机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强调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潜在而未被表达的基因潜能，以及复杂性的增长，尤其是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为适应环境的变化，那些一直未被实现的能力和潜能被实现了。环境挑选基因，反之亦然。最为明显的是，经过长期过程被挑选出来的往往是适应性最强的。这包含着韦尔斯(1989)所谓的“基因的智慧”和理查德森所谓的动物和人类大脑中“惊人的发展可塑性”(也可见于罗伯特森，1999)。这可以被看作是目的论的，因为一直有一些潜在的进化目的在里面。但是“基因的智慧”的论点仅仅指的是由于长期进化历史而导致的有机体（尤其是人体）的可塑性和耐力。

瓦丁顿使用“外成表现”这一隐喻来表示成长中的有机体是在一系列由遗传所决定的山坡和山谷中成长的（图2）。山谷代表他所谓的“必经路线”或“必经道路”，这些道路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同的。成长中的有机体经过这些道路，并且像这一隐喻所暗示的一样，不会轻易地被推到另一条路上去。有机体是相对有弹性的，而且只要基因和环境上的改变不是很大，它就会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去。因此，小小的偏离并不会导致孩子们成长为完全不同的人。贝特森参考了瓦丁顿的图景，(1982: 394)也谈到了“成长系统在经历动摇之后恢复平稳回到其原来轨迹的令人吃惊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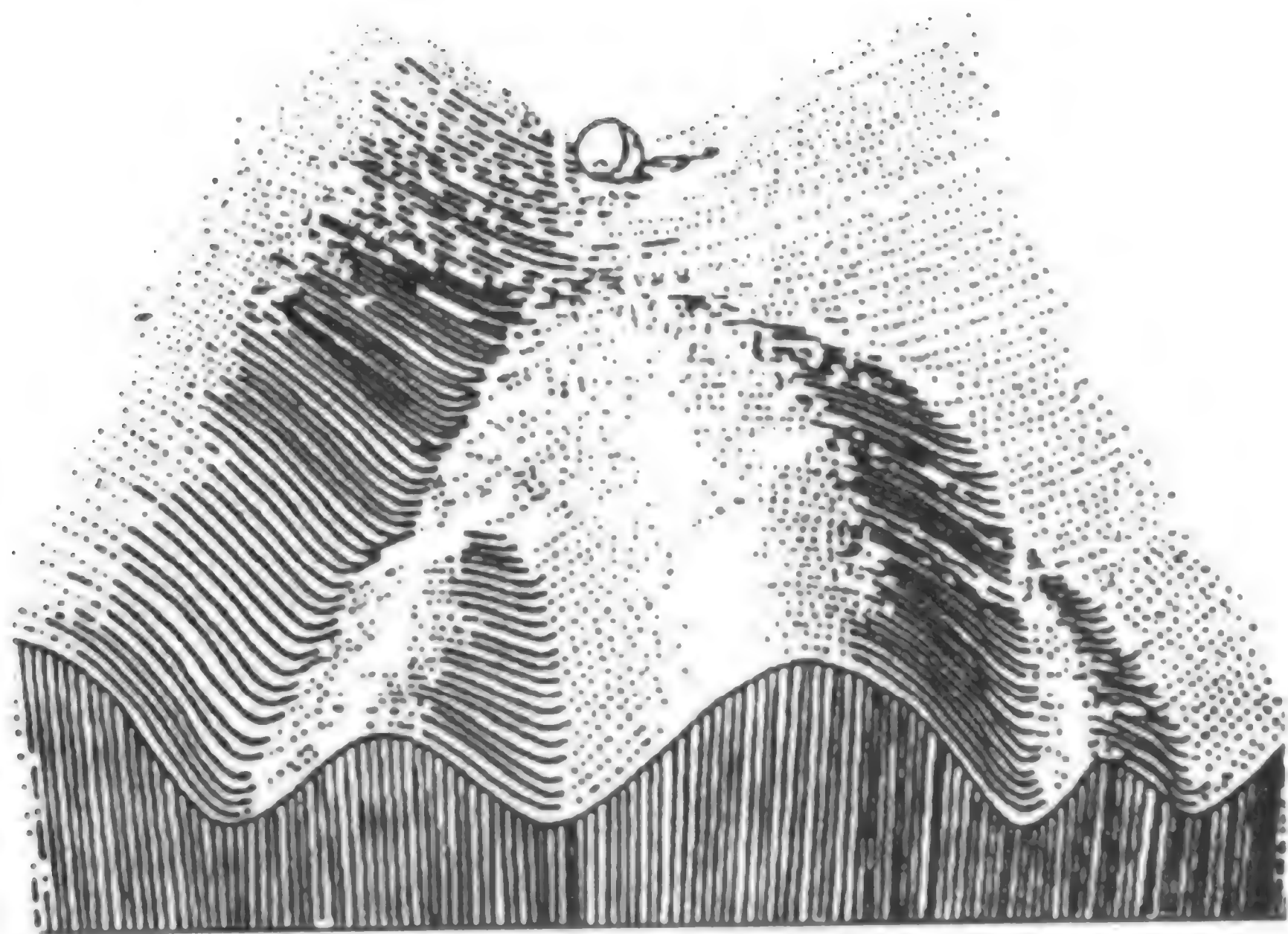


图2 外成表现

资料来源：瓦丁顿，1975。经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慨然应允得以复印

然而，虽然稳定性和可塑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环境和基因结构的改变仍然可以产生转向另一条发展道路或者另一种成长后果的实质性变化。对 Waddington（也是对我们的论断）而言，个体发生学的成长会带来长期的进化效果。那些拥有合适发展道路的个体就能够适应环境、生存下来并留下后代。他认为，长期来看，种群会朝这个趋势发展，即大量成员都将掌握一套更好的、更能适应新条件的“必经路线”。因此，整个种群的“外成表现”在种群与环境的关系中被改变了。（表8）

表 8:

有机体的遗传性和适应性：瓦丁顿关于果蝇的实验

Waddington 使用果蝇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表明环境的改变是如何导致种群产生大量新的变异。这种变异只是有机体早已存在的大量遗传变异潜能的显现，而不是产生了新的遗传变异。如果不对环境变化进行控制的话，经过少数几代后，果蝇便会具有新的特征。这样，由于环境而产生的特征就会遗传给下一代。长期来看（适用于种群而不是个体），已获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这表明有机体的基因结构是可变动的——也即是允许大量在身体和行为上明显不同的形式、行为以及变异的产生，这些变异部分或大部分取决于环境的改变。这又一次印证了“基因的智慧”的观点，强调了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拒斥了还原论者认为有机体仅仅是基因的“表达”的观点。

但是，要发展和应用这样的思想，仍然存在很多未知的问题。首先，瓦丁顿的结论中有很多问题。在他的研究中，环境的重要性并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如果果蝇有两种必经路线，一种是朝向白色果蝇，一种是朝向黑色果蝇，而环境的改变是推动大部分果蝇向白色方向发展的，那么这一发展就并不是有益于果蝇的选择，因为向白色发展的道路只是更占优势而已。问题应取决于环境的改变是否给予白色果蝇以一种选择优势。

或许，瓦丁顿得出他的结论是因为他的环境变化恰好也带来了选择优势。但是，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环境的改变导致第一代产生出 X 特征，并且，经过几代的变化产生出向 X 特征发展的遗传倾向，这种情况将只是巧合。换言之，已获得的特征向后代遗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瓦丁顿的研究中一个可能的含义是，分群人口能够以更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方式发展他们潜存的遗传倾向。前面所提到的社会统治形式毕竟还是能带来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的发展吗？我们一直在目睹内部婚配的、排外的社会精英的缓慢进化吗？这些社会精英们已经发展出了特别强大的处理、交流抽象观念的能力。以更加理论化的术语来说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归属是否包括以生物性为基础的能力甚至是基因库？此时必须要说的是，没有证据表明统治阶级天生就具有更大的智力潜能。正像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早年的成长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个人母亲所在的社会阶层是预测他成年后的智商水平的关键。与一个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新贵阶层数目的增长紧密相关的高异族通婚水平几乎明确意味着那些统治阶层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基因库。与此同时，那些被统治阶层之间的通婚就意味着会生育出大量智能不发达的人吗？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眼下这还只能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这些遗传形式在理论上仍然是可能的，即使它们在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所说的范围内没有发生（麦规，1997）。

我们必须清楚瓦丁顿讨论的是什麼。把遗传特征传递给下一代看起来像是一个拉马克式的进化过程。但“看起来”这个

词非常重要。瓦丁顿（1975）认为，这是拉马克主义的一个版本，通常和拉马克本人无关。那些具有某种特征包括心智结构的人，得到了发展，并把他们的显著特征遗传给自己的后代。然而，现代的一些生物学家在这个观点上走的更远，他们甚至认为有机体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特征都可以遗传给后代。魏斯曼教条（断言遗传物质的连续性及其与体细胞的明确区别）变得比较可疑（亚布伦斯卡和兰姆，1995）。越来越明显的是，在体细胞中所发生的遗传事件对于基因链有直接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下一代的遗传特征。霍尔（1998:120）在最近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获得性特征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遗传，这已无可置疑。”举例来说，所获得的对外来抗原的容忍似乎可以通过雄性链条遗传下去。霍尔（1998:120—1）认为存在一些细胞机制，它们可以“有效地向生殖细胞反馈报告，改变基因，或者按照体细胞的经验稳固基因”（也可见斯蒂勒等，1998）。

必须要重点强调的是前面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进化思想的融合（把成长中的有机体和它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并不依赖于上面所讨论的拉马克原理和遗传机制。尽管如此，霍尔等人的研究暗示获得性特征确实有某种长期的进化影响，信息除了通过常见的DNA碱基序列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递给后代。近年来，拉马克主义已经被划入了文化再生产过程。它的适用范围几乎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思想领域（如见卡瓦里——斯佛扎和费尔德曼，1981；巴卡乌等，1992）。但是，霍尔及其他人所描绘的那种生物学认为，拉马克生物学或许本不应该被如此迅速地扩散。

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是，这些观点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某些特征可以从一代遗传给下一代是毫无疑问的。考虑到进化过程的随机性，类似“IQ”这样的特征是否会遗传给下一代根本没有保证。但是近期自然科学方面的这一研究再次指出，在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进化中存在着可想象的反馈。

这些“生物—社会学”的非传统形式不仅使我们想起了《钟行曲线》这本书，也让我们记起了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拉马克式的观点，即社会通过传递获得性特征和习得性特征而进化。但是即使某些遗传潜能有在不同阶层之间以拉马克方式传递的倾向，环境的作用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些潜能是被实现还是被压抑取决于环境——家庭支持、学校教育、福利和大量的其他社会文化影响。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前面所介绍的一些研究，其中有一些认为，儿童在其出生之前可以很好地“获得”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将遗传给后代。然而，这决不是说这些特征是直接由基因所决定的。

这里所提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与本章第一部分的批评完全不同。在那里，资本主义被认为会抑制某些人创造能力和反思能力的发展，同时，下等阶层的人们会陷入低健康水平。但此处的观点是，抽象思维和具体思维的分化有可能逐渐嵌入人们的生物结构。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归属理论的激进发展。

再过几十年，对于胎儿的直接修正几乎肯定会发生。首先就是清除那些容易导致人类产生某些疾病的基因。后来就有可能发展成改善智力、容貌、运动能力以及任何人们想要他们后代发生改变的东西。即使在现在的美国，一些富有的父母就已

第六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朝向一种新的综合

经热衷于自助优生，他们登广告寻求卵子捐献者，这些卵子能够产生高智商的孩子。与此同时，在供应的一方，时尚摄影师肯·哈里斯在网络上刊登模特的卵子广告。他宣称：“每一个有机体都是向它的最佳理想状态进化的，找到能够修正你的遗传缺陷的特性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里弗斯，1999）。这种发展有很严肃的社会、政治和健康含义。但是，这些发展或许是“真实归属”这一更加普遍和长期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按照它自己的形象修正人类的生物结构。马克思（1976：360）认为工人的技术在不断地消失，他们的劳动也越来越从属于资本家的机器，以至于他们已经变得“生来就不会独立地生产东西”了。这一论断或许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更加真实。

这里勾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钟形曲线》中的观点向前发展了。社会两级分化可能有生物学基础，但是如果资本已经开始捕捉并修正人类的生物结构甚至是遗传结构的话，人类生物学的变异就决不是完全偶然的。这种发展所具有的长期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以及对社会理论和进化理论本身的意义）与赫伯特·斯宾塞或者赫恩斯塔因和穆瑞所构造的理论一样非常重要。由不断发展的科技知识和对利润的寻求所共同驱动的资金，正在积极地重建非人类物种的生物结构。资本是否会重建人类的生物结构、如何重建（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结合是否有效）将会成为 21 世纪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焦点。

参考书目

Alchia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June, 211 – 22.

Andreasen, R. (1998) "A new perspective on rac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9 (4), 199 – 225.

Ardriy, R. (1961) *African Genesis: A Pers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nimal Origins and Nature of Man*. New York: Atheneum.

Aron, R. (1969) *Eighteen Lectures o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Baldwin, J. (1902)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Bannister, R. (1979)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 –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arber, L. (1980) *The Heyday of Natural History 1820 – 1870*. London: Cape.

Barkan, E. (1992)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ker, D. (1998) *Mothers, Babies and Health in Later Life*. Lond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Barkow, J. Cosmides, L. and Tooby, J. (1992)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teson, P. (1982) "Rules and reciprocity in behavioural development", in H. Plotkin (ed.)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ichester: Wiley.

Bateson, P. and Martin, P. (1999) *Design For a Life: How Behaviour Develops*. London: Cape.

Beck, U. (1992) *The Risk Society*. London: Sage.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dall, K. (1998) "For goodness sake, it's survival", *Financial Times*, 12 September.

Benton, T. (1991)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Wh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should be given a (cautious) welcome", *Sociology*, 25 (1): 1 - 29.

Benton, T. (1996b) *The Greening of Marx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Benton, T. (1996b)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社会达尔文主义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in T. Benton (ed.) *The Greening of Marx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Bidell, T. and Fischer, K. (1997) "Between nature: The role of human agency in the epigenesis of intelligence", in R. Sternberg and T. Grigorenko (eds) *Intelligence,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dess, T. and Fischer, K. (1997) *The Murray Bookchin Reader*. London: Cassell.

Blackmore, S. (1999)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nd, L. and Doan, L. (1998) *Sexology Uncensored: The Documents of Sexual Sci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Boehm, C. (1997) "Ega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A. Whiten and R. Byrne (eds)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II: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chin, M. (1982)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alo Alto, CA: Cheshire Books.

Bookchin, M. (1989) *Remaking Society*. Montreal: Black Rose.

Bond, G. and Gilliam, A. (1994)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Representation as Power*. London: Routledge.

Bosma, H. Marmot, M. Hemingway, H. et al. (1997) "Low job control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hitehall II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22 February: 558

- 65.

Bowler, P. (1983) *En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wler, P. (1988) *The Non - Darwinian Revolution: Reinterpreting a His - torical Myth*.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owler, P. (1990) *Charles Darwin: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yd, R. and Richerson, J. (1985) *Crlture and the Cn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aver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intieth Cintury*. New York: Monthly Press.

Breen, R. and Goldthorpe. J. (1998) "Class inequality and meritocracy: Aeritique of Saunders and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1), 1 - 27.

Brunner, E. (1996) "The social and biological ba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office workers", in E. Brunner, D. Blane and R. Wilkinson (eds) *Heslth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Brunner, E. (1997) "Stress and the biology of inequalit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1472 - 6.

Brunner, E. Davey - Smith, G.. Marmot, M. et al. (1996) "Childhood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psychosocial and behavioural factors as determinants of plasma fibrinogen", *The Lancet*, 347, 13

社会达尔文主义

April: 1008 – 13.

Buck – Morss, S. (1982) "Socio – economic bias in Piaget's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oss – cultural studies", in S. Modgil and C. Modgil (eds) *Jean Piaget: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eprint of article in *Human Development*, 18, 1975.)

Burkhardt, F. (ed.) (1996) *Charles Darwin's Letters: A Selection 1825 – 18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tterworth, G., Siegal, M., Newcombe, P. and Dorfmann, M. (1998) "Young children's knowledge of the shape of the earth in Australia and Englan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1997.

Byrne, R. (1995) *The Thinking Ap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rne, R. and Whiten, A. (1988)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Social Expertis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llect in Monkeys, Apes and Hu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pra, F. (1983) *The Turning Point*. London: Fontana.

Carraher, T., Carraher, D. and Schliemann, A. (1985) "Mathematics in the streets and in the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 21 – 9.

Catton, W. (1998) "Darwin, Durkheim and mutualism", *Advances in Human Ecology*, 7: 89 – 113.

Cavalli – Sforza, L. and Feldman, M. (1981) *Cultural Frans*

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gnon, N. (1992) *The Last Days of Ed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itty, A. (1994) "Marx, moral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C. Bertram and A. Chitty (eds) *Has History Ended?* Aldershot: Avebury.

Chorney, M., Chorney, K., Seese, N. et al. (1998) "A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associated with cognition ability in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 (3): 159 - 66.

Cohen, G.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lborn, T., Myers, T. and Dumanoski, D. (1996) *Our Stolen Fu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Collier, A. (1994)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Curry, O., Cronin, C. and Ashworth, J. (1996)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the world view fro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Demos Quarterly*, 10.

Daniels, M., Devlin, B. and Roeder, K. (1997) "Of genes and IQ", in B. Devlin, S. Fienberg, D. Resnick and K. Roeder (eds) *Intelligence, Genes and Success: Scientists Respond to The Bell Curve*. New York: Copernicus.

Darwin, C. (1901)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社会达尔文主义

to Sex (2nd edn). London: Murray. (First published in 1871.)

Darwin, C. (1968)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59.)

Darwin, C. (1987a) "Notebook M", in P. Barrett, P. Gautrey, S. Herbert, D. Kohn and S. Smith (eds)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 – 1844*.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rst written in 1838.)

Darwin, C. (1987b) "Notebook N", in P. Barrett, P. Gautrey, S. Herbert, D. Kohn and S. Smith (eds)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 – 18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written in 1838 and 1839.)

Darwin, C. (1987c) "Old and useless notes", in P. Barrett, P. Gautrey, S. Herbert, D. Kohn and S. Smith (eds)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 – 18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written between 1838 and 1840.)

Darwin, C. (1998)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London: HarperCollins. (First published in 1872.)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nnett, D. (1990) "Meme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imagination",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8 (2): 127 – 35.

Desmond, A. (1989) *The Politics of Evolution: Morphology, Medicine and Reform in Radical Lond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evlin, B., Daniels, M. and Roeder, K. (1997) "The heritability of IQ", *Nature*, 388 (6641): 31 July.

Dickens, P. (1992) *Society and Nature: 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Dickens, P. (1996) *Reconstructing Nature: Alienation, Emancip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Routledge.

Donaldson, M. (1978) *Children's Minds*. London: Fontana.

Drouin, J. - M. and Bensaude - Vincent, B. (1996) "Nature for the people", in N. Jardine, J. Secord and E.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yhouse, C. (1976) "Social Darwinist id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in England 1880 - 1920", *History of Education*, 5 (1): 41 - 58.

Eder, K. (1984)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s: An epigenetic perspective", in M. Schmid and F. Wuketits (eds) *Evolutionary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Dordrecht: D. Reidel.

Eder, K. (1987) "On the 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tate: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n W. Wostal (ed.) *On Social Evolution: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ical Concepts*. Horn, Austria: Berger.

Eder, K. (1999) "Societies learn and yet the world is hard to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 (2): 195 - 215.

Elias, N. (1994)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First published in 1939.)

社会达尔文主义

Elson, D. (1979) "Which way "out of the ghetto"?", *Capital and Class*, 9, Autumn: 97 – 117.

Engels, E (1989)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in L.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First published in 1878).

Erdal, D. and Whiten, A. (1996) "Egalitarianism and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in human evolution", in P. Mellars and K. Gibson (eds) *Model – ling the Early Human Mind*. McDonald Institute Monographs.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ischbach, G. (1992) "Mind and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67 (3): 24 – 32,

Frank, A. (1972)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J. Cockcroft, A. Frank and D. Johnson (eds) *Dependence and Under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Freud, S. (1987) "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S. Dickson (ed.), *Civilis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 12.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930).

Frith, U. and Happ6, F. (1999) "Theory of mind and self – consciousness. What is it like to be autistic?", *Mind and Language*, 14 (1): 1 – 22.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Fukuyama, F. (1999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London: Profile.

Fukuyama, F. (1999b) "The end of history? Well, certainly the end of humans", *The Independent*, 16 June.

Gellner, E. (1988)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London: Collins Harvill.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Goddard, A. (1998) "Sense of self sets human beings apart",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1 September.

Goodwin, B. (1994) *How the Leopard Changed Its Spot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Gottlieb, G. (1992)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Genesis of Novel Behaviou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uld, S. (1977) "Eternal metaphors of palaeontology", in A. Hallam (ed.) *Patterns of Evolu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Fossil Record*. New York: Elsevier.

Gould, S. (1980) *Ever since Darwin*. Harmondsworth: Pelican.

Greenough, W., Black, J. and Wallace, C. (1993) "Brain adaptation to experience", in M. H. Johnson (ed.) *Brain Development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Gruber, H. (1974) *Darwin on Man: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New York: Dutton.

Habermas, J. (1996) "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modernity", in

社会达尔文主义

W. Outhwaite (ed.) *The Habermas Reader*. Oxford: Polity Press.

Hacker, A. (1995) "Caste, crime and precocity",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Hales, M. (1980) *Living Thinkwork: Where do Labour Processes Come From?* London: CSE Books.

Haraway, D. (1992)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Verso.

Hayward, T. (1998) *Politic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Values*. Oxford: Polity Press.

Hawkins, M. (1997)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Nature as Model and Nature as Thre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gel, G. (1975)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rnstein, R. and Murray, C.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Heylighen, F. (1996) "Evolution of memes on the network: From Chain letters to the global brain", available from the author, Center "Leo Apostel",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Pleinlaan 2, B - 1050, Brussels, Belgium.

Hirst, P. (1976) *Social Evolution and Sociological Categories*. London: Allen & Unwin.

Hirst, P. (1994)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Identity and

persona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conomy and Society*, 23 (1): 47 – 65.

Ho, M. – W. (1998) *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 Bath: Gateway Books.

Hodgson, G. (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Oxford: Polity Press.

Hofstadter, R. (1959)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Brazier.

Humphrey, N. (1976)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 in P. Bateson and R. Hinde (eds) *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t, E. (1997) "The concept and utility of intelligence", in B. Devlin, S. Fienberg, D. Resnick and K. Roeder (eds) *Intelligence, Genes" and Success*. New York: Copernicus.

Ingold, T. (1986)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Essays on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Jablonska, E. and Lamb, M. (1995) *Epigenetic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O. (1997) *Britain on the Couch*. London: Century.

Jones, G. (1980)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Brighton: Harvester.

Judis, J. (1995) "Hearts of darkness",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

社会达尔文主义

don: Basic Books.

Junge, K. (1993) "Evolutionary processes in the economy", in W. Outhwaite and T. Bottomore (eds)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20th Century Soci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Keating, D. and Hertzman, C. (eds) (1999) *Developmental Healt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ocial, Bi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Dynamic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Kerr, C., Dunlop, J., Harbison, F. and Myers, C. (1960)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London: Heinemann.

Knauff, B. (1991) "Violence and sociality in human evolu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2: 391 – 428.

Kohn, M. and Schooler, C. (1973) "Occupational experience and psycho – logical functioning: an assessment of reciprocal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97 – 118.

Kropotkin, P. (1987) *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02.)

Lambert, H. and Rose, H. (1996) "Disembodied knowledge? Making sense of medical science", in A. Irwin and B. Wynne (eds)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Lewontin, R. (1982)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in H. Plotkin (ed.)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ichester: Wi-

ley.

Lewontin, R. (1991) *The Doctrine of DNA: Biology as Ide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Lind, M. (1995) "Brave New Right",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Lovullo, W. (1997) *Stress and Health: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s*. London: Sage.

Lubbock, J. (1875)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3rd edn). London: Longmans, Green.

Luhmann, N.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 (1989)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Lumsden, C. and Wilson, E. (1981) *Genes, Mind and Culture: The Co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ynch, A. (1996) *Thought Contagion: How Belief Spreads Through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MacLean, P. (1983) "A triangular brief on the evolution of brain and law" in M. Gruter and P. Bohannon (eds) *Law, Biology and Culture*. Santa Barbara, CA: Ross - Erikson.

MacLean, P. (1990) *The Triune Brain in Evolution*. New York: Plenum.

社会达尔文主义

Macnicol, J. (1987) "In pursuit of the underclas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293 – 318.

Malik, K. (1996) *The Meaning of Race: Rac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Wester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Mallet, S. (1975) *The New Working Class*. Nottingham: Spokesman.

Mann, M. (1973) *Workers on the Move: The Sociology of Relo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ovic, M. (1991) "Human nature", in T. Botto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Marmot, M. and Wadsworth, M. (eds) (1997) "Fetal and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long – term health implications",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53 (1), January.

Marshall, G. and Swift, A. (1996) "Merit and mobility: A reply to Peter Saunders", *Sociology*, 30 (2): 375 – 86.

Martin, P. (1997) *The Sickening Mind*. London: Harper Collins.

Martinez Allier, J. (1987)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Marx, K. (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1975a)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L. Colletti (ed.)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44.).

Marx, K. (1975b) "Concerning Feuerbach", in L. Colletti

(ed.)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45.)

Marx, K. (1976) *Capital*. " Volume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and Engels, F.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 Arthu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First published in 1932.)

Maryanski, A. (1992) "The last ancestor: An ecological network model on the origins of human sociality", *Advances in Human Ecology*, 1: 1 - 32.

Maryanski, A. and Turner, J. (1992) *The Social Cage: Human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thews, F. (1991) *The Ecological Self*. London: Routledge.

Maynard Smith, J. (1998) *Shaping Life: Genes, Embryos and 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McGue, M. (1997) "The democracy of the genes", *Nature*, 38, 31 July: 417 - 18.

McLellan, D. (ed.) (1977)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nnell, S. (1989)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Human Self - Image*. Oxford: Blackwell.

Mies, M. and Shiva, V.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社会达尔文主义

Books.

Miller, J. (1997) "A cultural –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intelligence", in R. Sternberg and E. Grigorenko (eds) *Intelligence,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ntagu, A. (1997) *Man's Most Dangerous Myth: The Fallacy of Ra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42.)

Montgomery, S., Bartley, M., Cook, D. and Wadsworth, M. (1996) "Health and social precursors of unemployment in young men in Great Britai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0: 415 – 22.

Montgomery, S., Bartley, M. and Wilkinson, R. (1997) "Family conflict and slow growth", *Archives of the Diseases of Childhood*, 77: 326 – 30.

Naess, A. (1989)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isser, U., Boodoo, G., Bouchard, T. et al. (1996) "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2): 77 – 101.

Nelson, R. and Winter, S.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sse, R. and Williams, G. (1995) *Evolution and Healing: The New Science of Darwinian Medicine*. London: Phoenix.

Nesse, R. and Williams, R. (1996) "Is there an evolutionist in

the house.?", *Demos Quarterly*, 10: 25 – 7.

Nisbett, R. (1995) "Race, IQ and scientism",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O'Connor, M. (1994) *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O'Connor, M. (1996)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in T. Benton (ed.) *The Greening of Marx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Offer, J. (1999) "Spencer's future of welfare: A vision eclipsed", *Socio – logical Review*, 47 (1): 136 – 62.

Outram, D. (1996) "New spaces in natural history", in N. Jardine, J. Secord and E.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very, C. (1997) *Charles Darwin: His Life, Journeys and Discoveries*. London: English Heritage.

Parsons, T. (1966)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atel, C. (1996) *The Complete Guide to Stress Management*. London: Vermilion.

Patterson, O. (1995) "For whom the bell curves",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Peel, J. (1972) "Introduction", in J. Peel (ed.) *Herbert*

社会达尔文主义

Spencer on Social Evolution: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rrin, R. (1976) "Herbert Spencer's four theories of social 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1339 – 59.

Piaget, J. (1971) *Biology and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Organic Regulation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inker, S. (1997) *How the Mind Works*. Haworth: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Plomin, R., McClearn, G., Smith, D. et al. (1994) "DNA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high versus low IQs: The Quantitative Tract Loci (QTL) Project", *Behaviour Genetics*, 24 (2): 107 – 18.

Poster, M. (1979) *Sartre's Marxism*. London: Pluto.

Power, C. and Hertzman, C. (1999) "Health, well – being, and coping skills", in D. Keating and C. Hertzman (eds) *Developmental Healt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ocial, Bi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Dynamic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amos, D. (1995) "Paradise miscalculated",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Ramsey, H. and Haworth, N. (1984) *Prefigurative Socialism and the Strategies of Transition*. Discussion Paper 12. Glasgow: Centre for Research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Glasgow.

Reeves, J. (1999) "Models sell their eggs for "perfect" baby", *Observer*, 24 October.

Richardson, K. (1998) *The Origins of Human Potential.*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Ridley, M. (1994)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bertson, I. (1999) *Mind Sculpture: Your Brain's Untapped Potential*. London: Bantam.

Rohe, J. (1997) *A Bicentennial Malthusian Essay: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and the Indifference to Limits*. Traverse City: Rhodes and Easton.

Rose, S. (1997) *Lifelines: Biology, Freedom, Determi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se, S., Lewontin, R. and Kamin, L.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Harmondsworth: Pelican.

Rosen, J. and Lane, C. (1995) "The sources of the bell curve",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Rosto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wbotham, S., Segal, L. and Wainwright, H. (1979) *Beyond the Fragments: 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社会达尔文主义

Rudy, A. (1998)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work of Murray Bookchin: Problems of theory and evidenc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9 (2): 57 – 90.

Runciman, W. (1998) "The selectionist paradig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ology", *Sociology*, 32 (1): 163 – 88.

Ruse, M. (1996) *Monad to Man: The Concept of Progres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nderson, S. (1990) *Social Evolutionism: A Critical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Sanderson, S. (1994) "Evolutionary materialism: A theoretical strateg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evolu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7 (1): 42 – 73.

Saunders, P. (1995) *Capitalism: A Social Audit*.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Saunders, P. (1996) *Unequal But Fair? A Study of Class Barriers in Britain*. Choice in Welfare Series No. 28.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Saunders, P. (1997)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wo competing explanations", *Sociology*, 31: 161 – 88.

Savage, M. and Egerton, M. (1997) "Social mobility, individual ability and class inequality", *Sociology*, 31 (4): 645 – 72.

Schmidt, A.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Secord, A. (1996) "Artisan botany", in N. Jardine, J. Secord and E.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ligman, M. (1975) *Helplessness*. San Francisco: Freeman.

Selye, H. (1984)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 Hill.

Shatz, C. (1992) "The developing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67: 35 – 41.

Shteir, A. (1996) *Cultivating Women, Cultivating Science: Flora's Daughters and Botany in England 1760 – 186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melser, N.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ory to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1770 – 184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ober, E. (1999) "Altruism, bi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view with Elliott Sober", *Imprints*, 3 (3): 197 – 213.

Sohn – Rethel, A. (1975) "Science as alienated consciousness", *Radical Science*, 213: 65 – 101.

Sowell, T. (1995) "Ethnicity and IQ",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Spearman, C. (1927) *The Abilities of Man: Their Nature and Measurement*. London: Macmillan.

Spencer, H. (1857) *Principles of Biology*, Vol. 2.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社会达尔文主义

Spencer, H. (1893)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 1.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Spencer, H. (1898) *Principles of Biology*, 2 vols. New York: Appleton.

Spencer, H. (1904) *An Autobiography*, Vol. 1.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Spencer, H. (1996)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1. London: Routledge. (First published in 1857.)

Stedman Jones, G. (1971)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teele, E., Lindley, R. and Blanden, R. (1998) *Lamarck's Signature: How Retrogenes are Changing Darwin's Natural Selection Paradigm*.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Stepan, N. (1982)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 – 1960*. London: Macmillan.

Sternberg, R. (1985) "Introduction: What is an information – processing approach to human abilities?", in R. Sternberg (ed.) *Human Abilities: An Information – Processing Approach*. New York: Freeman.

Steward, J.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 – 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ylva, K. (1997) "Critical periods in childhood learning",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53 (1): 185 – 97.

Tobach, E., Gianutsos, J., Topoff, H. and Groff, C. (1974) *The Four Horsemen: Racism, Sexism, Militar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Toennies, F. (1955) *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ouraine, A., Durand, C., Pecant, D. and Willener, A. (1965) *Workers' Attitudes to Technical Change*.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wnsend, P. and Davidson, N. (1980) *The Health Divide - The Black Repo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Trigger, B. (1998)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Calculation and Contingency*. Oxford: Blackwell.

Turner, J. (1985) *Herbert Spencer: A Renewed Appreciation*. Beverley Hills, CA: Sage.

Waddington, C. (1957) *The Strategy of the Genes*. London: Allen & Unwin.

Waddington, C. (1975) *The Evolution of an Evolutioni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allace, A. R. (1869) *The Malay Archipelago*,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Whitehead, M. (1987) *The Health Divide - Inequalities in Health*. London: Health Education Council.

Whiten, A. (1999) "The evolution of deep social mind in humans", in M. Corballis and S. Lea (eds) *The Descent of Mind*. Ox-

社会达尔文主义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n, A. and Byrne, R (eds) (1997)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II: Extensions and Evalu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kinson, R. (1996)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Wilkinson, R. (1997) "What health tells us about society", *Soundings*, special issue, *The Next Ten Years*: 125 – 42.

Williams, R. (1976a) "Evolution", in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 (1976b) "Progressive", in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Wills, C. (1989) *The Wisdom of the Genes: New Pathways in 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ls, C. (1993) *The Runaway Bra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Uniqueness*. London: Flamingo.

Wolfe, A. (1995) "Has there been a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America?", in S.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London: Basic Books.

Woods, A. and Grant, T. (1995) *Reason in Revolt*. London: Welred.

World Bank (199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rangham, R. and Peterson, D. (1997) *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 London: Bloomsbury.

Wright, R. (1994) *The Moral Animal: Why We Are the Way We Are*. London: Abacus.

Wright, R. (1996) "The dissent of woman. What feminists can learn from Darwinism", *Demos Quarterly*, 10: 18 – 24.

Wynne – Edwards, V. (1986) *Evolution through Group Selection*. Oxford: Blackwell.

译名对照表

Alan Buckingham 阿兰·布金汉姆

Alchian 阿尔钦

Alfred Russell Wallace 阿尔弗雷德·卢索·华莱士

Andreasen 安朱尔森

Andrew Chitty 安朱·齐蒂

Andrew Whiten 安朱·怀顿

Anthony Giddens 安东尼·吉登斯

Ardrey 阿德雷

Aron 阿伦

Ashley Montagu 安史理·蒙太古

Bacon 培根

Baldwin 鲍德温

Barnister 班尼斯特

Barber 巴勃

Barker 巴克

Barkan	巴肯
Barkow	巴卡乌
Bateson	贝特森
Beck	贝克
Bell	贝尔
Bendall	本达尔
Bensaude - Vincent	本萨德-文森特
Benton	本顿
Bidell	比代尔
Biehl	比艾尔
Bill Catton	比尔·坎顿
Blackmore	布兰科摩
Bland	布兰德
Boehm	波义姆
Bond	邦得
Bookchin	布金
Bosma	波斯玛
Bowler	布勒
Boyd	波义得
Braverman	布莱瓦曼
Breen	布林
Brunner	布拉纳
Buck - Morss	布克-毛斯
Burkhardt	布克哈特

社会达尔文主义

Butterworth 布塔沃斯
Byrne 比尔纳
Capra 卡普拉
Catton 坎顿
Cavalli - Sforza 卡瓦里-斯佛扎
Chagnon 查格农
Charles Murray 查尔斯·穆瑞
Chitty 齐蒂
Chorney 乔尼
Cohen 柯恩
Colborn 考波恩
Collier 柯里亚
Comte 孔德
Curry 库里
Daniel Dennett 丹尼尔·德内特
Daniels 丹尼尔斯
Darwin 达尔文
David Barker 大卫·巴克
David Kind 大卫·肯德
Davidson 戴维森
Dawkins 道金斯
Descartes 笛卡儿
Desmond 戴斯蒙得
Devlin 戴弗林

Doan	都恩
Donaldson	多纳德森
Drouin	卓林
Duke	杜克
Durkheim	涂尔干
Dyhouse	狄豪斯
Eder	埃德
Edward Tylor	爱德华·泰勒
Egerton	艾格顿
Elson	艾尔森
Erdal	厄达尔
Feldman	费尔德曼
Feuerbach	费尔巴哈
Firth	弗斯
Fischbach	费施巴哈
Fischer	费舍尔
Frank	弗兰克
Freeman - Williams	弗里曼-威廉姆斯
Freud	弗洛伊德
Fukuyama	福山
Gautier	戈尔蒂耶
Gellner	戈尔纳
Geoffroy	加法洛意
G. H. Mead	米德

社会达尔文主义

Gilliam 基里亚姆
Goddard 高达德
Goldthorpe 古德索普
Goodwin 古德文
Gottlieb 高特里
Gould 古德
Grant 格兰特
Greenhough 格林豪
Hacker 汉克
Hales 海尔斯
Happe 哈帕
Haraway 哈拉微
Harbermas 哈贝马斯
Hawkins 郝金斯
Hayek 哈耶克
Hayward 海沃德
Hegel 黑格尔
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斯宾塞
Herzman 赫兹曼
Heylighen 海力根
Hirst 赫斯特
Ho 霍尔
Hodgson 郝哲森
Hofstadter 豪夫施达特

Howard Gardner 郝华德·加得纳
 Howarth 哈沃斯
 Humphrey 哈穆弗瑞
 Hunt 胡恩特
 Ingold 英古德
 Jablonska 亚布伦斯卡
 James 詹姆斯
 Jenneth Parker 吉纳斯·帕克
 John Lubbock 约翰·鲁布克
 Jonathan Glover 乔纳坦·格娄尔
 Jones 琼斯
 Judis 朱狄斯
 Julian Huxley 朱廉·赫胥黎
 Junge 江格尔
 Keating 基汀
 Ken Harris 肯·哈里斯
 Kerr 科尔
 Knauf 纳夫特
 Kohn 考恩
 Kropotkin 克鲁泡特金
 Lamarck 拉马克
 Lamb 兰姆
 Lambert 兰波特
 Lane 莱因

社会达尔文主义

Lee Freese 李·弗里斯

Lerner 勒纳

Lewontin 莱文汀

Lind 林德

Lovullo 罗瓦罗

Luhmann 卢曼

Lumsden 卢姆斯登

Lynch 林奇

Machiavelli 马基雅弗利

MacLean 马克林

Macnicol 马克尼可

Malik 马里克

Mallet 马里特

Malthus 马尔萨斯

Mann 曼

Markovic 马克维克

Marmot 玛摩特

Marshall 马歇尔

Martin 马丁

Martinez Alier 马提内兹·阿里尔

Maryanski 马林斯基

Matthews 马修斯

Maynard Smith 梅纳德·史密斯

Mennell 门奈尔

McGue 麦规
McLellan 麦克莱伦
Mies 玛艾斯
Miller 米勒
Montgomery 蒙特古玛瑞
Morgan 摩尔根
Murray 穆瑞
Murray Bookchin 穆瑞·布金
Naess 奈斯
Neisser 内瑟尔
Nelson 内尔森
Nisbett 尼斯伯特
Norbert Elias 诺伯特·埃利亚斯
O'Connor 欧考纳
Offer 奥福尔
Outram 奥特兰姆
Overy 欧弗瑞
Patel 潘特尔
Patterson 潘特森
Perrin 伯林
Pete Saunders 皮狄·桑德斯
Peter Dickens 彼得·狄肯斯
Peterson 彼得森
Piaget 皮亚杰

社会达尔文主义

Pinker 平克

Poster 坡斯塔

Power 帕瓦尔

Ramos 拉摩斯

Reeves 里弗斯

Richard Herrnstein 理查德·赫恩斯塔因

Richard Wilkinson 理查德·维尔金森

Richerson 里切森

Ridley 瑞得里

Robert Plomin 罗伯特·普罗民

Robertson 罗伯特森

Roger Highfield 罗格·哈依费德

Rohe 若赫

Rose 罗斯

Rosen 罗森

Rostow 罗斯托

Rowbotham 罗伯萨姆

Rudy 鲁笛

Runciman 伦西曼

Ruse 卢斯

Ryle 赖尔

Sanderson 桑得森

Saunders 桑德斯

Savage 萨维治

Secord	西考德
Seligman	赛里格曼
Selye	塞里
Schmidt	施密特
Schooler	斯库勒
Schumpeter	熊比特
Shatz	沙兹
Shteir	施泰尔
Smelser	斯梅瑟尔
Sober	扫伯
Sohn - Rethel	扫恩-赖特赫尔
Sowell	索维尔
Spearman	斯皮尔曼
Stedman Jones	斯提德曼·琼斯
Steele	斯蒂勒
Stepan	斯蒂潘
Sternberg	斯特恩博格
Steward	斯蒂沃德
Swift	斯维福特
Sylva	西尔瓦
Talcott Parsons	塔尔科特·帕森斯
Ted Benton	台德·本顿
Toennies	滕尼斯
Touraine	都兰

社会达尔文主义

Townsend 唐森德

Trigger 特里格

Turner 特纳

Veblen 凡布伦

Waddington 瓦丁顿

Wadsworth 瓦兹华斯

Weissman 魏斯曼

Whately 魏特里

Whitehead 怀特海德,

Whiten 怀顿

Wilkinson 维尔金森

William Sumner 威廉姆·萨姆纳

Williams 威廉姆斯

Wills 韦尔斯

Wilson 威尔森

Winter 文特

Wolfe 沃尔法

Woods 伍兹

Wrangham 兰格汉姆

Wynne - Edwards 维纳-爱德华兹

译者后记

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所以对我本人而言颇有一些意义。初试译笔的人大概会有类似的感受，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有些句子看不懂，不知所云；二、看懂了，但很难用汉语流畅地译出来，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另一方面是在句式变换上放不开手脚；三、作者引用的一些材料我们很不熟悉，如专业杂志名称、某些非英语的词汇或短语，等等。要解决前两个问题，只能是在语言能力上多下功夫，慢慢修炼，日益精进。至于第三个问题，我向大家推荐一个办法，有些从词典上查不到的词汇、术语可以到 google 上搜一搜，很容易找到一些相关的文章，也就很容易了解到它们的含意。网络资源非常有用，这是我这次做翻译的一个体会。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不多说，留待读者自己去读、去理解。作为译者，我的一个主要感受是，本书在材料上显得过于庞杂，而处理这些材料的方式又过于简省，因此有浮光掠影、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够深入之嫌。建议大家把这本书当作一份便于参考的综述性文献来读，把它当作一根藤，顺藤去摸瓜。

如前所述，我的翻译能力和经验尚浅，译文中必有许多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最后，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给我这样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机会。

涂骏

□ □ □
□ □ □
□ □ □
□ □
□ □
□ □
□ □